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仁智的山水

张元济传

 **eBOOK**  
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

## 作者简介

吴方，四十五岁，北京市人，祖籍为安徽怀宁。“文革”中高中毕业，做过矿工、司机，历十年。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做过杂志编辑，后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现为北京语言学院副教授。近年著有《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中国文化史图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香港中华书局，1993）编有《朱湘诗全编》，以及论文、随笔等。

## 引 言

在二十几年前，笔者还是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也算生“逢”其时，正值“文革”之际，停了学业，大家不得不抛书掷笔，去做工务农。古之好读书者，一别书卷，辄有“仓皇辞庙，挥泪对宫娥”的痛感，而我辈懵懵然也。这也不奇怪，因为那是处在一个整体荒诞的时代环境里。但时间一长，亦不免有各种无聊苦闷袭来。大的不说，即举一小端而言，譬如，没有书读。

据说，在“文革”中，学者钱钟书先生下放劳动，他的夫人杨绛曾指一小窝棚问，可否终老于此，钱氏想了想，说：“没有书读。”这么看，此种匠乏，亦非小事了，也许，这关系到文明的传统，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闷。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先生曾手书过一副旧对联，给我印象殊深。联语是：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这些简单的话里，似乎沉淀了许多代人的文化经验。是对历代焚书坑儒者、对企图禁闭知识和思想的权威，默默发出的回应。

然而那时我“没有书读”。勉强的情况是，碰到什么便抓起来看，恰如“拾到篮里就是菜”。有一回，偶然读到一本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读得似懂，仅可说，慰情聊胜于无。不过，黑格尔有段话令我难忘，他说：

“思相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以外，但事实上我们之年以为我们，乃是由于我们在历史……”

由此想到，举凡知识、技能、思想、学术以至人类文化许多方面的东西，无论其今天的形态和风貌是什么样子，都是有其来自的，都包涵着几番历史演变。因此企图割断或抹煞历史，“抽刀断水”，经贸部无改于“水更流”。同时，黑格尔的话，也解释了，现实中的人们何以会对了解和重新读解历史保持极大的兴趣。与那种以为我们可以创造历史传统的自信不同，事实上，在传统属于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属于传统。可以说，历史传统具有一程决定我们在生成过程中是什么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历史传统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

然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至少，一种历史意识会提示：了解或描写过去，并非单为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同时，一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实用历史”在“文革”中登峰造极，而终于破产，正如读书和思考，终究凭谁也不能禁止。这里面也就包括了一代代人必然会要求重读历史、重写历史，并且融入历史。

不过，说到“历史”，恐怕是题目太大、头绪万千，学问也甚多，恰似“一入侯门深似海”了。简单而言，在一个意义上，“历史”乃是以往时间、空间中所发生事情的总称，在另一个意义上，“历史”则是指对前述事情人们所作的记载和描写以至于阐释，是前者的所谓“节略的文本”。又，二者之间应该说自有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个分寸很不容易把握。一方面，史书是不可能完全地拷贝全部历史的，另一方面，既为史书，则须尽量地接近历史真相本身。由于有这个矛盾，也就是过去与现在、客体与主体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消除，权宜的说法便认为，历史乃是一种对话。一方面需要大史公的“实录无隐之旨”，另一方面又需要太史公的“博雅弘辨之

才”，对话，最好是逐渐加深理解的过程。这样的“历史理解”，对于今天的写史、读史最有意义。我想，这大概不错。对于“断烂朝报”或“流水账”式的历史，谁能不觉乏味而厌倦呢？至于打着“古为今用”的招牌，强作解释、妄逞臆断的历史，尽管古人九泉之下已无从置辨，又何能逃历史之检验，浪淘而去！

也许，人们更愿意读平实的、有启发性的历史。人物传记大抵也在这个意思里。

迄今为止，提供给人们阅读的历史——古人写的或今人写的，分门别类的，贯通的或断代的，教科书或小册子，正史、稗乘或人物传记——已经很多了，以一个人的精力恐怕无法卒读，但是诸如此类仍然无可避免一种不充分性。在这儿，除纂辑撰写的客观和主观局限外，也有一种习惯性定势在起作用，即由于习惯使然，历史的关注点往往在于改朝换代等一类大的社会变动以及战争和政潮等事件，关注帝王将相或显赫的政治人物、思想人物。在振动的“历史之筛”中有幸留下来“出场”的，往往是活动于社会上层、据要路津，处在“舞台”中心的人物、事情，他们在历史视野中成了中心、焦点。说来，这也大致成了惯例。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历史生活的结构，不仅有“中心”，亦有“边缘”。边缘实际上乃是中心的前提，若无边缘，中心亦无从显示了。边缘有时间上的、空间上的、社会组织结构上的，也有人的存在状态上的、思想性格上的。与“中心”相比，“边缘”有着不同的特色和命运，它同“中心”一样，交织出复杂纷坛的历史场景，具有某些既定历史解释规范所忽略不计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许多历史变动往往正是从边缘开始的。这儿有一个颇值一看的历史视域。换句话说，从边缘（边缘现象与边缘人物）去看，从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去看历史，会产生不同的意味。这正像我们有时感觉的，一本人物传记兴许比正经八百的史书更有看头，如“一叶知秋”，可感知不少历史沧桑的消息。

在以王权秩序为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中心的古代中国，历史总要围绕这个中心来“通鉴”，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了本世纪，历史思想在社会变革潮流中亦趋于变化，即开始着重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解释和撰写历史。显然，这也同传统史观有相似处，即带有浓郁的“中心论”、“决定论”色彩，无形中提供一种简化的应合意识形态需要的历史事象，将历史视野限制在某个地方。譬如将大量笔墨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并以“革命——反革命”、“进步——保守”的二元对立为诠释模式。但是我们逐渐感到，历史也许并不全是如此。譬如说，决定社会行为的，是否只是阶级关系？不妨想想：社会是一个规范化、制度化了的人际关系系统，而阶级关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文化、人格同样是影响或决定社会行为的因素。更进一步说，文化是一套符号系统，其中储备着人类的全部知识、习俗、道德、价值观、文化对于历史的作用，岂是可以忽视，可以被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所替代的么？

从文化的角度，从处于“边缘”的而又担承了文化职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角度看，也许会关于历史有另外的发现，有一番意味不同的体悟。譬如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自十九世纪末的晚清到本世纪上半叶，风云激荡，正是社会变动极大的时代。在潮流中，人的选择是艰难的，出现了许多悲欢离合、奋斗与彷徨、幻灭与执著、成功与失败，有的人虽然未曾处在“舞台”中心，

不曾为风云人物，却以其对道德精神、人格力量和文化使命的承当，留下默默努力的身影，也是格外令人萦思系念。一当多年来十丈红尘滚过，激动与浮躁静定，系念便油然而生。譬如，可系念的有张元济先生。

人海茫茫，恐怕并无多少人了解张元济的生干事略。如果说“响远不在音高”那倒也是。作为一位令人起敬的文化老人，前辈风范，却很少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作为一位长寿者，他几乎是宠辱皆以淡泊处之地穿过了九十年的历史风雨。或者说，张元济乃是一位平常人，但这种“平常”也许比某种“非常”更难做到，也许可以说是超脱流俗的一种朴素的境界。那情形，或如一句老话：“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庶几近之。

史海茫茫，知人论事，关于张元济及其时代，说到这一层，也许会想到一个问题：张元济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如何？

出自敬仰之意而褒赞，说是“高”、“重要”，以至于称之为“杰出”、“非凡”等等，圆属一种看法，但总嫌是泛泛之论。不免有拔高、牵强之痕迹。因为这未必符合、切近张元济本人的实际情况。他的平和气质以及不骛高远，安于笃实的人生选择。说来，在半个多世纪风云迭起的时代中，尤不乏种种“高调”的思想行为，不乏浮沉于“高调子”中的戏剧性历史现象和人物角色，但张元济却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另辟蹊径而不在趁逐波流中“弄潮”，张元济一直拥有他“低调”式的姿态，换句话说，他“躲避崇高”，躲避极致，也躲避进入历史旋流的“中心”或者追求声名荣耀，或者自任重大的使命。譬如：

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只有一次曾直接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是清末戊戌变法。“在昙花一现的变法初期曾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这是他能影响最高决策层的‘近日点’。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为了替变革辩护而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精神领袖。尽管他在恪守传统伦理道德时绝不狭隘保守，但没有试图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提出一种完整和有系统的激进思想，也没有为推理出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而费煞苦心……他很少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作任何解释。当康有为宣称在广州创办学堂是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梁启超在雄辩的社论和随笔中再三声言他的报纸是以现代思想唤醒民智的时候，张元济在参加商务印书馆时，却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记录以说明同样的崇高目的和意图。与此相似，几十年以后，王云五提出了数万言详细材料，说明他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追随蒋介石政府的道路，而张元济却没有直接声明或公开阐述他留在中国（大陆）的决定”。

由此可见一斑。还可以补充说到，张元济对于名位利禄，始终持守淡泊心情，早期登上仕途，即私怀戒厉戒躁之警惕。他虽然是个怀有维新思想开明意识的士子，却很少寄身于甲午至戊戌间组织的各种政治团体和派别。遭革职处分后，他转向文化出版事业，亦始终甘于寂寞，本来不乏机会可重登仕途或跻身重大的社会活动，但他或者辞官不就或者敬谢不与。张元济与严复、蔡元培均有知交，且在文化史的贡献上与严、蔡二先生有相似之处，但他在声气方面，不如严、蔡之著名。严复以译介宣传启蒙思想影响大，蔡元培以教育家著称，对新文化运动影响大。张元济虽然致力于开辟现代中国出版事业，尽其一生，但他个人的作用却很少被强调过，或者说，他始终避免披强调。张元济俭于著述，不论是关于社会生活还是关于个人思想的文字，包括自传和回忆录，他都未多致意焉：因此其人留存的思想、传记材料亦不免疏简。

这也正和其人的秉性夙习相一致了。在五十年代，张元济尚在世，桃飞李谢、故旧飘零，当年的戊戌党人，硕果仅存此老。晚辈后学向他访谈当年情况，张元济所谈有限，只是强调：“戊戌时我是外围”、这“外围”二字，非标榜语，是讲实话，其一生大旨似亦在此有意味的“实话”二字。

相对于中心，是边缘，相对于外烁，这是收敛沉潜，相对于绚烂，这是平淡，那么，相对于“进”来说，大约是“退，了罢。然而此人之“退”，非为消极的退，退隐的退，非为对彼生彼世人生价值与责任的否弃、逃避，而转现为另外一种承当、一种进境。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张元济之入世本色如此，究竟属于他对历史省鉴的结果，还是个人性格所致，已经不容易考求析论了，他自己对此也没有解释过。也许他不曾深想，只是认为重要的，莫过于，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有益于民族、国家、社会，人非圣贤，亦非蝼蚁，这也足以干滔滔器器的尘世中，觅一清凉，得一慰藉，也算起了一些实际作用罢。至今看来，这种含有几分证悟几分明智的“平常心”，可慕可风，不想起到什么大作用，却因此起到了“作用”，也是可以惠人以启发的。我感觉着，张元济的历史地位是独特的，是在平实抱素中体现出某种精神的超越。

陶渊明曾写过一篇《自祭文》，其中写道：“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籽，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无委分，以至百年。”又说：“寂寂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他老先生真是既达观、从容又不落颓废无聊。不由得由此想到张元济的素志，他在晚年写有一首《留别绝句》：

形体积成泡沫耳，一朝化去更空虚。

世人幻说辽阳鹤，魂梦可能相见无。

另有一首《别商务印书馆同人》：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诗如其人，虽不见慷慨深沉，却也是从容自咏扣心叩骨之言。

从旧式的读书人到以传播新知为己任的出版家，一生惨淡经营努力不懈，张元济以一种“耐性”坚持了他最初的目标，也不能不说有赖于他的达观与执著。过去曾国藩说过：“大抵挥霍者蒙卓声，谨守者沉散秩；生辣者鹊起，和厚者螻伏；标榜者互相授引，务实者独守岑寂……然君子之道，不汲汲于名望。”从这儿也可以看出张元济的选择。他之所以肯于不求急功，以“耐久”自矢，这要归诸于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艰难的缓慢的，决非急骤，剧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可以短期奏功——历史症结原在于：如果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和更广泛伪对变革要求的觉醒，“富强”和“现代化”终是不切实际的口号，历史的课终不免得补上才行。自然，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这条思路像是不合时宜的一厢情愿，因而张元济的努力亦遭到了许多困难挫折，效果实际上非常有限，但是，坚持仍然具有意义，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揭示了各种矛盾缠绕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所不可忽略的东西。

在把关于张元济的若干思考稍加陈述后，不妨了解一下张元济的简要经历：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父张森玉，字云仙，号德斋，历任广东知县，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歿于海

南任所。张元济幼年随宦在外，十四岁时随母回海盐老家。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入县学为生员，五年后杭州乡试中举人，越三年，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入京会试，中进士，馆选庶吉士，散馆后分发刑部主事，翌年考充总理衙门章京，接触洋务、西学。因倾向维新，主办通艺学堂招官绅子弟习英文、天算、舆地等。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诏定国是，实行变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保荐张元济，三天后张元济受到光绪召见，并奏请实行新政，另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等为变法建言。八月政变起，被“革职永不叙用”。后携家南下，至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先任编译所长，后任经理。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诏旨开复原官，然此后授职皆辞不就。宣统二年（一九一〇）曾被推举为“中国教育会”会长。民国以后，张元济致力于经营商务印书馆，曾赴欧美各国考察及联系出版事业仍一九二〇年由经理改任监理，一九三〇年当选董事长，直至逝世为止。张元济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近六十年，使商务从草创初期的简单印刷企业，转变为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及其他文化事业为一体的出版重镇，以协助教育、传播文化为经营宗旨，其贡献不为不巨。一九四九年后张元济曾担任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馆长等职，晚年病卧，一九五九年八月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由于所叙传主既非传奇性的人物，又不曾为往日的政治明星，而且也不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其经历难免更多具有平常意味。但平常也许恰恰体现了人与时代的某一种关系。这里面，张元济的人生定位与价值定位是怎样的，就不妨投以一瞥，并进而由此了解或者说较为生动地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页。这是一种历史读解，希望它不光是对一个文化人物经历的记录，还可以成为一个古今对话的渠道，一种历史思考的参照。“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也许，过去与现在总是相通的。

## 编者言

从今天起，——这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秒，我们都别无选择地朝着世纪末逼近着。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口回眸百年历史：现代中国经过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受尽磨难，至今方才徐徐拉开现代化的大幕。我们或可再问一声：这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序幕，是否延续得太久了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自今日始绕索在人们心头，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口，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发生了类似的疑问，他们急躁不安，东渡日本，西走欧美，上下求索着……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壮行程，如同一道现代中国史上的深沉凿痕。本丛书的宗旨，正是要通过这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一个世纪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下一个世纪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



## 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

## 第一章 从而方到北方

### 家世与幼年

像一代代芸芸往来的普通人，也许是莫名所以地来到世上，公历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丁卯）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二十八），张元济诞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过了八十五个年头，晚年张元济于《别自身》诗中写道：“未生以前本无有，从今以后是谁何，我非我更非非我，灰灭烟销一刹那。”似有关于生死匪夷所思之概，也如过去几句打油诗所问：“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谁我是谁，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都是说人“莫名所以来到世上”的意思。不过，也有可以确定的——人既来到世上，而且生存下去，他总之要与时代结下不解之缘了。

说张元济出身于普通家庭，因其出身并无特别足以记载之事迹。祖上世业耕读，虽然也出过进士、举人，到清嘉庆、道光时，家道已中落，景况平平，不过僻居乡里，声闻不远，算是浙江海盐地方的一般百姓之家。张家虽算不上高门大族，但数代簪缨，书香传继，到张元济这一辈，读书人的宗风还绵延着。对这种人家的子弟，入世之路，首先考虑的。

是如何应科举。科举制度自唐代确立以来，历朝历代皆为选拔官员和士子进身的定制。清代满人入关底定天下之后，大体沿袭旧制，故读书人仍以科举为正途。张元济的父亲张森玉也不例外。他在海盐家乡习举业达到的资格是“生员”，生员俗称“秀才”，即所谓“青一衿”，是经过县考，府考、院试，取得了进学的资格，有了一个求功名的基础了。但秀才在乡里虽有了一定地位，要想走上正式仕途，非在更高一级的乡试中考中举人不可，当然会有不少人落榜，蹭蹬场屋，白首不售也屡见不鲜。张森玉未曾中举，只以生员资格，选择了另一条路。

科甲正途之外的蹊径，有恩荫、保举、捐纳等。张森玉走的是捐纳的路子。捐纳，实际上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晚清，这种本不正当的做法成了公开盛行的风气，由于咸丰、同治以后外患内忧频仍，国穷财绌，而朝廷又要维持场面，拨军饷军需，支撑河工，赈灾，所需浩繁而开源节流乏术，故大开捐例，索性卖官鬻爵。捐纳也便成了做官之捷径。据说，张森玉在二十一岁时，由父亲张应辰安排，随亲戚乘海船经潮州到广州。到广州后按例交银，捐得府通判、盐提举衔。这也是一种任职资格，可以遇缺候补，府通判为知府的僚属，张森玉后来又升格为“同知直隶州知州”，相当于从正七品升为从六品，仍属于佐贰之职。实际上他补缺后做官的时间也不太长，先后署理过海南会同县、海南陵水县知县，都是很偏僻的地方。约一八六四年，张森玉娶妻完姻，娶的是谢焕之女。谢焕也是比较低的地方官员，任广东乐昌县罗家渡巡检，是以正八品的肇庆府经历，借补为从九品的巡检，负责某关隘之地的治安。谢氏原籍江苏武进。张谢结婚后，育有三子二女，张元济为次子。

所以，张元济家世和早年生活有一特别之处：籍贯为浙江海盐，出生却在广州。张家久居广州纸行街，整个童年时代，张元济是在广东度过的。他

---

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7—8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年。

《张元济年谱》第3页。

会讲粤语。直到十四岁那年才随母亲回到海盐定居。时值一八八一年（光绪六年庚辰），张家迁入海盐城年虎尾浜南岸一所旧屋，有几亩田产，雇有佣工，勤朴度日，生计尚可。至于张氏祖庐“涉园”，迭历岁月已然记废，不复为一邑之胜。张元济曾寻访旧园，只见“林木参天，颓垣欲堕，途径没蒿中，小池湮塞；旁峙坏屋数椽，族人贫苦者居焉”。作为后裔子孙，“偶于苔藓中见石刻《范忠贞诗》，摩挲读之，徘徊不忍去。”一种悄然而来的历史感触和怅思，似已隐于一个少年胸中。这大概反映了张元济秉有内向的性情。

然而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多半是平淡无奇的。关于此，毕竟未曾留下更多记载。在广东张元济七岁时入私塾读书，从师长那里接受传统的知识教育和修身熏陶，自然，传统教育主要在为科举作准备，那时新学堂尚未出现，尽管在澳门等地早已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在一八七二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幼童，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触和了解仍是非常有限的。因循既久的传统人生设计和文化风习，对于张元济的影响，仍不外“发愤读书求取功名”，尽管他是在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一带长大的。

十四岁那年，张元济随母返回老家海盐居住，原因很难说，估计是要考虑到几兄弟已长大，需要回到本籍地方准备应童生考试。但是第二年的年末，家中有了变故，在外服官的父亲忽然病歿于海南任所，年纪只有三十九岁。

不算战乱、灾害的影响，仅由于卫生医疗条件匮乏，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相当低。张元济一家，除了他本人长寿和一个妹妹活了七十岁，哥哥仅享年三十九，弟弟二十岁亡故，还有一个妹妹早殇。这其中也有张森王病故后家境渐窘的原因。

## 那时代

从出生和客居广东到返回浙江老家，张元济早年生活平常地度过，而此时中国古老土地上，从南到北，一切似乎并不平静。按照一位大诗人龚自珍的预言，清朝正由“衰世”走向“乱世”，“治世”之梦已重温无望。张元济成长的这段时光，是从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到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史称“同、光朝”的前期。一八六一年，在遭到惨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尾声里，咸丰皇帝死于热河。同治登基时才五岁，辛酉政变后那拉氏夺取政权，于是有两宫垂帘。无奈同治皇帝不甚争气，归政不久，年纪轻轻便染病而亡。光绪再继大统也不过才四岁，两宫二度垂帘。那些年仍不免国事螭蟾。

固然，清朝的统治尚未落到“抽心一烂”然后土崩瓦解的地步，相对于道光至咸丰朝的危殆处境（如丧权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和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这时朝廷拟可稍开国门的事实，被动地采取一些应变姿态。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覆亡之后，清廷一方面忙于在中原和西北用兵，所谓“剿捻”、“平回乱”以及平定新疆等，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之步步进逼，采取苟且维系之策，以退让求得苟且之局。同时晚清社会生活（一开始主要在边缘上）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中，亦不免逐渐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动。譬如，清廷的“天朝尊严”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失掉，却还有些遗迹残存，尤其是愚昧意识上的片面自大，尚能在对内的文件中发泄。及至英法联军攻

---

此屋为张元济七世祖张方湄岳父陈宋斋所建，故址为今海盐中学一部分。

《海盐张氏涉园丛刻跋》。

陷北京，“北京条约”签定，除去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之外，过去清政府最厌恶、最顽抗的某些具有直接刺激性的要求，如公使驻京，如不肯跪拜，如平等相待之类，均已被迫接受，甚至此后连“夷”字也不能见于公开的文书，而“大英国”、“大法国”的刺眼字样在条约和照会上则触目皆是了。由于无法再用传统的办法处理“夷务”（对外事务），一个新的机构，即张元济后来供职过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在一八六一年设立了。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军舰、传教士、商人的到来，他们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租界，也带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生活景象恐怕也远非往昔了。一些新事物在渐渐出现，搅动起古井之波。

面对眉睫之下失败的耻辱记录，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们尽管反应不同，但是如何自强的问题，却已引起了普遍关注。在这一问题的刺激下及反应的视野中，产生了“洋务运动”以及在许多方面求变的新趋势。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的思想为核心，是中国寻求现代化的最初努力，尽管后来被证明并不成功，却也反映了风气的转变。如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所说，如何“效法西人富强之术”？“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页我孤、彼坚而我脆……。”在满人权贵如恭亲王、文祥，汉人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在这一阶段，通过官办方式，逐渐开办了兵工厂和造船厂，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设立了学习外语的学校——同文馆、学习技术的学校——船政学堂、水师学堂以及制造局附属的翻译馆、学馆，选送学生赴美留学，第一批学员便是在一八七二年由容同等带领出洋的。当时，一些初步的采矿业、纺织业、航运、电报以及印刷业、贸易亦在进行和推进中，报馆和石印书局在上海始获建立。

当然，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在“自强”的目标下，晚清社会出现了有深度的变革。事实上这些有限变动的意义，不仅不为当时的民众所了解，也遭到守旧派强烈反对。同时，这些事业本身往往也陷入组织不力和经营困难的积弊之中，它的发展往往又与官僚体制、经济环境和人才情况产生冲突。冲突还不易克服。

然而作为历史过渡时代的标志，开放及自强趋向引起的变化，多少表明：“新知识和新看法传了进来，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提供了某些机会（虽然机会是偶然的，而且为数很少）。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不但出现在身负要职的政治家之中，而且还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之中。”此时与尔后，围绕这一历史选择如何进行的思考，晚清史呈现了各种思想取向的纠葛斗争，是非成败难以遽然定论，直至王朝的结束，问题仍是悬而待解的，即：一是为了利用西方技术，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一是在已成的制度和体制中，调整和变革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少年时代的张元济还不可能思考上述问题，他从广东回到浙江，摆在面前的仍然是读书科举之路。但也不妨说，时代生活的变化对他不会毫无影响。旧的选择与维新思想因素，对他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可以共容的，况

且历史的变动需要时间。虽然科举制度看来弊窦丛主，然而似乎一时还不可能有什么来代替这一古制。像严复那样入船政学堂并去英国学海军的人，尚属于正途之外的极少数情况。对于张元济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与一般传统读书人没什么两样，好在他是个开明的读书人。

### 科举之途

从传统的眼光看，张元济读书、仕进，乃遵循标准的正途，如果读书读得好，获得科甲出身，名登翰林，历来是极荣耀的，为天下千千万万士子所梦寐以求。不过，一百年前，读什么书，怎么读，后人则颇难想见。张元济在回到海盐后，有两年时间与兄元煦就读于查济忠先生处，所谓出外就馆，一个先生教若干个学生。查济忠为海盐廪生（已进学的生员岁科两试成绩优秀，可进入享受廪汽银的名额内，称廪生），据张元济称赞老师，是“于学无所不窥”。但先生传讲，弟子诵读，内容科目皆不出一定程式。大抵从幼时启蒙识字，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起，也读读《孝经》、《诗品》一类，然后就须照例读“四书”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至年纪稍长，从学做对对子开始，便须开笔作诗、作文；文，主要就是八股文，又曰“制艺”、“时文”，同时，“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也是必读的。待这些知识、能力有一定积累掌握后，就该考虑去考秀才了。这是第一道门槛。

十八岁那年（一八八四）春天，张元济与兄元煦一道去投考科举第一关，即“县试”。县里考试，主试者为县官。县试毕后，便是府试，由知府主试，经过一层层筛选，再进入院试，是由省里的学台来主试的。这一次考取了，方算是一名秀才，算是进学了。考试项目，主要考八股文即以四书五经中的一句话为题，按规矩作成一篇议论文字，好像是代圣贤立言，有人比喻说，作一个题目，好像是几滴牛肉汁，把它冲成一碗牛肉汤，要不咸不淡，非但适口且要有鲜味。当然也有人批评这种时文是“庸陋墨卷，剿袭捭扯，效其浮词，而全无精义。”不管怎样，这总是最要紧的考试项目，此外，还须赋五言六韵诗一首，并默写《圣谕广训》。

科举考试又名“人闹”、“观场”，入得其中，举子毕竟是紧张的，因为除了发挥文墨，竞争实在激烈，机缘也有幸与不幸。“邑聚千数百童生”，不过“擢十数人为生员”，人人“泥涂翘首望青云”。好在张元济努力未空，也不负先人期望，先在县试中名列第一，又在府考、院试时得中，兄弟双双中了秀才。

进了学，用功亦不能松懈。因为生员入学后，应按国子监坐监例，在学肄业，至下届取进新生入学为满期。出学前，按定制，不论在学久暂，月有月课，季有季考，除了忧、患病、游学等事故外，不到者有罚，重者会革去秀才资格。而且三年后，还须参加岁试、科试，以取得参加乡试（考举人）的资格。

一晃三年，业精干勤，行成于思，张元济不忘切磋学问。其间，张家出钱延请西席来家教导，所聘为同邑朱福洗（桂卿）先生。先生为科场前辈，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时请假在乡。张元济奉师请益计三年，于攻读“四书五经”之外，且研读乡邑先辈诗文，先后向业于徐用福、叶廉锷、司开先、吴仰贤诸先生，学业益进。

一八八九年为光绪十五年（己丑），值乡试大比之年。张元济于九月赴

省城杭州乡试。这一年由于光绪大婚、亲政，特开恩科，等于是增加了一次考试，否则张元济应该赶上的是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乡试。此次浙江乡试的考官是李文田、陈鼎。浙江向为文风兴盛的地方，乡试应试人数极多，竞争激烈。乡试可说科举全程最不易过的一关，因为参加乡试之前，先要经过科考录科，录科是有限额的，限额多少大致相应于额定录取人数的八十倍，即八十人中出一个举人。再加上副榜，譬如说这一科共取了一五五名（十八名副榜），应试者大约有一万二千之数。所谓“皆期虎榜之先登，岂料龙门之难上”。如许之多士子应试，局促于号舍矮檐，辛苦周章，几场考下来，几如大病一场。张元济参加的这次乡试，时天气炎热，就有不少考生中暑，甚至有一考生死于考棚。

乡试三场，历时一周。按清代定制，“首场考四书文（八股）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经文五篇，三场策问道。这种考试功课有何用处？利弊何在？大概张元济也不能明瞭。就其内容本身而言，殆非无可取之处，或如康有为言：“迨至明与国初、人士渐陋、然抉经心而明义理，扶人伦而阐心性，当闭关之世，虽未尽足以育才兴学，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焉。”而弊端亦颇明显，如有人指弹：“士予以四书五经为于禄之具，而不知其为修己治人之方，其所为文，悉是剿说之余，而不足为躬行心得之验。仁智之性，既塞其源，恻隐羞恶是非之良，亦仅存而无几。本实拔矣，枝叶何观？”对科举考试的总体评价，随时代发展是越来越低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停废科举。张元济所参加的乙巳乡试，为倒数第八次。

话说回来，十月九日发榜，榜上有名，张元济中式第十名举人，同科登名，有他后来的朋友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徐珂、汪大燮等。捷报传回，合家喜慰。光宗耀祖无过于此。下一步，即为人京会试，要准备踏上北行之途了。这一年冬天，张元济与吾氏在海盐结婚。

转过年来，光绪亲政，举办庚寅恩科会试。张元济未能参加，在乡教书和读书。越一年，他二十五岁，曾应广东学政徐琪（字花农，光绪庚辰进士）之聘请，有广东一行。徐琪曾为翰林院编修，是朱福洗先生的同年。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壬辰）年初，值三年一科的王辰会试期到来，张元济束装进京赶考。不幸的是，抵达京城不久，吾氏夫人忽然因病去世的消息便传来了。

四月初头场入闱，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祁世长等，同考官大多是翰林院编修，张元济的老师朱福洗也名列其中。会试取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再经殿试成进士，取中的机会约为一与三十之比。三场考试项目与乡试相同，而所重在头场，即主要看四书文作得如何，卷面书法也颇有关系。张元济应考顺利，五月七日榜发，中式第四十七名贡士。接着是复试和保和殿殿试，贡士就比较轻松了。做完策论（此次殿试策论题为“西藏地理”），按格式抄录，就等着考官荐卷，皇帝钦定名次。

四日后胪传，张元济得中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同科进士有吴士鉴、蔡元培、汤寿潜、叶德辉、庸文治等。一甲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

该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浙闻述事》。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第二册，2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齐召南《进呈经史说》，《经世文编》卷十，《治体》。

是为“鼎甲”，榜下受职为翰林院修撰和编修。如果中在二甲、三甲，须再应一次朝考，成绩好的派到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称作庶吉士，考取庶吉士，叫做点翰林。张元济即在他二十六岁这年点了翰林，成为庶吉士，入馆学习。据说，“国朝士路，以科目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非翰林不与，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他官叙资，开必先翰林。”翰林既为清贵之职，换句话说，之后的仕途是不错的，张元济稳健地走上了仕途。但此时家中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他的弟弟元瀛病死在家乡，年仅二十岁。

## 第二章 冠盖京华

### “甲午”前后

有清一代，满人以北方少数族入主中国，定都北京，已有数百年，但朝廷的供给多依赖南方。自隋唐以来，东南开发，久为膏腴之地，漕粮通过运河北调（晚清改海运），习为故事。同时，东南各省文化亦较发达隆盛，士子多循科举之途，捷声北上为官立朝者亦不绝于道。自道、咸以来海禁大开，沿海地区每得天下风气之先。所以，迄至近代，中国历史重心不免有由西北向东南的转移趋势，即以科名盛衰而言，会试获中会元、三鼎甲和传胪（二甲头名）的人数，清代以江苏、浙江为最多，内计江苏得一八四人、浙江一三七人。由此可想，张元济之入翰苑，既非浅学薄植侥幸戈获，也有人文地理上的因缘。张元济入翰林院后的几年，有好几位浙江人作了军机大臣，如仁和许庚身、海盐徐用仪、仁和王文韶、嘉兴钱应溥。许庚身为同治元年进士，官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又是王辰进上朝阅卷官，曾阅张元济考卷，深赏之，即拟以幼女许配张元济为妻。但许庚身于一八九四年初病卒，张元济与许夫人结缡已在第二年四月。此时既已“奉母入京供职”，便迁入西皇城根许宅，在京定居。

之前，按规定于翰林院庶常馆学习，光绪二十年甲午春散馆，张元济彼分发刑部，任贵州司主事，身列部曹，犹如“科长”。庶吉士散馆例须大考，成绩较优者“国馆”，授编修、检讨等职，次者改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前者有蔡元培，后者有张元济。看来，张元济不能成为儒雅的文学侍从之臣了，新职位对他意味着什么，也还是个疑问。这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

晚清时世，四海兵戈不息。战争，有内战、外战，内战是否内行就不去说它，“外战外行”则不能看成单纯的讽刺。自一八四〇年后，对西方侵略者屡次失败屈辱的记录，无不反映中国之落伍与朝廷的腐败颓预。强寇逼门，有句话说得近于事实，叫做“和不能，战亦不能”，常常是进退失据，自取其败，几十年列强环伺。还不仅如此，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发展起来，摆脱落后命运，逐渐开始向外侵略扩张。甲午战争即是日本以求一逞的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的直接触发在于朝鲜内乱和日本的干涉，而中国作为原来的宗主国，在保护方面措置失宜，使日本得寸进尺。一旦战火燃眉，中国却又无准备，指挥混乱，军无斗志。在陆上，从朝鲜退到辽东，李鸿章节制下的清军屡战屡败，屡战屡退。当时有歌谣讽刺：“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文官多一只手，大概是用来贪污或裹乱，武官多两只脚，则是形容逃跑之速了。在海上，虽然经过洋务之多年经营，已有了南、北洋水师，但南洋已在中法战争时的马尾一役折羽，此次北洋的舰队总吨位尚超过日本，唯因指挥失当陋弊尽现，在九月的黄海海战中覆败。这场战争的失败，又给中国带来一个丧权辱国的记录——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中国人的反应十分强烈。如此事实出现在二十余年大声疾呼“自强”之后，似乎特别令人震惊和难堪。况且中国历来认为日本是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蕞尔小国”，因此，屈辱之感既特别具有辛辣意味且引起对自身的迫切反省。于是有种种意见丛集朝野，舆论沸然。



一八九五年五月，一千三百名进京会试的举子“公车上书”，向朝廷请愿要求拒和、变法。当时张元济固然未尝有所参与，感觉却是一样的震动。他后来曾追述：“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

处于危局，朝中主战一派固然讲道理义正辞严，却不免空言浮议不切实际。问题在于凭什么去打，这似乎很靠不住。正基于此，封疆重臣如李鸿章便一味苟且，主张“和”，然百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迫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又是为什么？

所以，甲午战败的意义，关键不在于主和主战孰是孰非，而在于它不过暴露了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在体制等方面的危机，它无法有效地回应近代历史之挑战。在旧的体制内寻求自强的梦破产了。就连日本舰队司令在致北洋海军提督了汝昌书中也说：“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诸通变之所由致也。”

忧国忧时，这正是张元济由六品京官循规蹈矩转而倾向维新、学习西学，以图救亡的开始。

### 维新进境

正像“忧患”成为晚清历史的主题，“经世致用”成为其时思想学术的主要祈求，“维新”，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明显要求与趋向。狭义地说，“维新运动”指戊戌年（一八九八）的变法，光绪帝诏行新政，广义地说，则是一个在二十多年间逐渐推展、风气演变的过程。譬如所谓“洋务”、“自强”过程中包含的一些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外交、教育、国防、出版等方面有限度的近代化尝试。维新趋向的一个基本点首先在于，从“师夷长技”的原则出发，了解西方，了解西方之所以富强的原因。换句话说，为了适应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化，必须促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和学习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后来成了张元济一生的主要事业。

需要了解和学习西学，这在传统读书人特别是像张元济那样由科学入仕的人，以前会觉得不可思议。因而有些人会本能地排斥它，譬如当朝的大学士倭仁便反对国家招考学习天文、算学的人员，他的理由是：凡学问都以中国为最好，根本用不着向外国去学习。他以病伤为借口，坚辞派他担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另外一位大巨徐桐也对西学极为仇视。他住在东交民巷，府宅与使馆相邻，作一副对联说他“与鬼为邻，望洋兴叹”。然而毕竟情况变了，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仍它又被称为“新学”。

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西学被了解的规模、程度明显扩大了。其实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已出版了不少关于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书籍，例如江南制造局译馆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九年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但直到九十年

---

《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诗文》232页。

张謇弹劾李鸿章之奏折，见《张元济九录》。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196页。

代中期，译局卖出约一万三千部译著。“中国公众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自一八六六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二十五万册（包括私印本）。”再者，在维新的努力中，利用报纸、学堂、学会等工具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也还很有限。直到一八九五年左右，似乎出现了更广泛动势的契机。多少有些野火春风的情景。

后来因戊戌变法大政潮而播名海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积极推进变法维新，在京沪和外省开始创立新的组织和新的宣传工具，意在“广联人才，创通风气”，扩大影响。譬如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不久又汇聚同志成立北京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汪大燮主笔，“载格致有用之书”，探讨“万国强弱之原”。这年十一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出版了《强学报》。然而由于御史杨崇伊的弹劾，学会及其报纸被朝廷封禁，旋转为“官书局”。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另办《时务报》。《时务报》因其思想新颖、言论犀利，一时风靡，海内观听为之耸动。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维新活动特别开展的时候，张元济的思想显然倾向维新。按其自述，当时他与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聚会的人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这些人几乎全是列名强学会的主要人物。文廷式（道希）当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当过珍妃、瑾妃的老师，很为光绪所器重，同时也最为那拉氏一派后党朝臣所攻击。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初。被后党奏劾，革职驱逐回籍。这是维新派的一大挫折。不知什么原因，张元济虽与不少维新派官员接近，却没有列名于团体之中。也就是说，虽然同气相求，却比较谨慎地避免介入政治漩涡。他只是与几位不太知名的官员朋好合组一“健社”，“约为有用之学”，“以自强不息相勉”，并以此为基础，后来筹办了一所“通艺学堂”。

倾向维新的士人中间，情况也很不一样，有比较激进的，有比较保守的，也有投机的或缘附于权贵的，而权力斗争的夹缠于人事亦不免造成改良之局的种种牵掣。除开政治参与意向上的差别，张元济的想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民智”的主张是相近的，其致汪康年信（丙申四月廿七日）云：

书局之开，是吾华一大喜事。浮云蔽日，旋即消散。寿州闻尚有心。弟曾有书上之，后屡谒而不得一见。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气习。所刊局报，多系芜词，阁抄格言，最为可笑。洋报偶有微词，译署原文咨送，均被删削。其人如此，概可知矣。昨晤伯唐（即汪大燮），谓尊处报局粗有章程，并云译印在即，必能出此间万万倍也。鄙意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弟此意颇为卓如所许。兄固具大慈悲者，尤望有以教我也，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才智大短，进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断不中止。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前月业以从师，拟即日迁寓馆

---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315 页。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三章。

《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诗文》232 页。

《年谱》16 页。

中矣。这封信颇能反映他当时的愿望。收信者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人，为张元济己丑乡试同年，曾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揽，一八九五年赴沪主持上海强学会，翌年经理《时务报》。信中提到的书局即强学书局，强学会被查禁后改为朝廷控制的官书局，由孙家鼐（寿州）管理。张元济开始对官书局还抱有希望，故上书孙家鼐，孙不理。张元济才发现转变积习之不易。此信反映了张元济的“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也是他维新思想的核心。

自己先从学习做起。这一年（一八九六）他三十岁，开始努力读英文，读西方法律书籍，并拟购阅日文报纸。对于梁启超（任公）主笔的《时务报》，搜求备览，以为“崇论宏议，以激士气，以挽颓波”，“令人奋发”。他自己虽不是那种“一笔能当十万军”的开风气的人物，对于讲求时务西学的维新派却有同志之感：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 总理衙门与西学堂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张元济以部院司员身份参加了总理衙门考试，获选充总理衙门章京，同批进署的还有唐文治、汪大燮等。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译署。此衙门于一八六一年由恭亲王奕訢等奏请设立，专门处理与外国交涉的事务，相当于清末的外务部。实际上它与军机处的性质仿佛，区别在于一个管“洋务”，一个管“政务”。因而在编制上主要也分为大臣和章京两级，另有一些佐理人员。章京这个名称自清代始用，除了称都统、副都统为固山章京、梅勒章京外，一般是指专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章京又分为总办、帮办章京和一般章京，张元济为一般章京。他担任此职，是想“于外交上稍效绵薄”。不过他恐怕也意识到官府衙门之弊陋多端，因而在致友人书中称：“弟本无聊，姑应译署之试，今竟记名，深恐一入樊笼，将来必成废朽。远游夙志，至此益坚。凡鸟固不可与为伍，而择木亦不可不慎。”当时张元济似有随同出使外国之意，所谓“远游”当指此。因其适与黄遵宪（公度）相晤，黄适驻外多年后归国入觐，有可能再奉旨使外，后未果。

在总理衙门的工作，可以说“浮沉郎署”，用张元济自己的话说：“惟译署办事总以清净寂灭为主，其奈之何哉！”“弟在总署，无可进言之处。”张元济还曾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致汪康年书中提到两件外交上的“小事”，“一，德使之事虽是无礼，然其咎仍当归之译署。盖事前并未送仪汪单。田贝为领班，向译署索之，乃仅覆以照旧一言，一署数十人不知所办何事也。现诸使并欲于东华门栅栏内下轿，向译署力争。而恭邸乃曰此吾

---

《张元济书札》9页。

《张元济书札》10页。

《追述戊戌政变杂咏》，《诗文》56页。

《挽唐蔚芝同年》，《诗文》71页。

《书札》10页。

张元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汪康年书：“公度事忽中变，令虽已白，终不复行，弟有成约，亦只可作罢论，《书札》10页。

济下轿之地，彼辈何能至此。人之待我若此，而我之自待又若此，何夜之长而梦之沉乎。一，日本来询彼国太后之丧，我皇持服否，事诚有之。浅见者引为百世之耻矣。然彼正非礼。去年醇亲王福晋薨，各使臣以何日下旗询诸译署，而各堂日此必须出奏，然奏则东朝必不乐，不如拒之。则人固未尝无礼于我也，今日已为列国之世界，而在朝诸人胸梗一统二字，宜其措置之乖也。”<sup>1</sup>张元济对昏聩的官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即此充分表达出来。他还不无忧虑他说：“都中无甚新闻，惟内庭召集百人，日钞戏本进呈乙览。外城气象已复太平，团拜演戏日有所闻，若深恐其不可多得而故纵其欲者。事变之来，盖不远矣。”

张元济的不满及其在总理衙门的无所作为，为正派的在朝之士所不免。晚清有句描述官场的谚语说：“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也就是说，资格浅的要装作呆子，指望着慢慢熬上去，资格老的终是滑头，关键是坐住位子。像做了几十年总署大臣的庆亲王奕訢，除了滑头之外，一是热衷于逢迎慈禧太后及大太监李莲英，二是热衷于贪贿。因其日以纳贿为事，言官弹劾，报章讥嘲，谤书可以充栋。在这样的人领导下，内政、外交之敷衍苟且难以振作，自然也不奇怪。

贪鄙昏昧、种种不理想的状况仍然包围着人们，影响着人们，但是变动仍在缓缓到来，维新也正在成为趋势。张元济在而立之年踽踽京华，大约既不愿为一“石呆子”，又不可能如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成为活动家、宣传家，于是他的维新思想便落到一些具体的努力上。如其所谓“自强之道，以兴学为先”，“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作为倾向维新的人物，他更注意的是知识意义上的启蒙以及为此而开辟有效的“渠道”。在晚清之混浊时世，“佞谀者进，朴勤者退”，这种有所不为中的有所为，未尝不被视为有些“呆气”的。

简单说，在总理衙门供职期间，张元济的“有所为”体现于三方面：进书、分报、办学堂。

尽管已到了九十年代，普遍的读书人特别是已有功名的朝廷官员，肯于了解西学接受新知的人还不多，张元济在其间可谓好读书者，他了解得较多一些，因而对已翻译过来的西书做了开风气的引导推介工作。

“天禄石渠非所眷，喜从海客听流谈，丹毫不厌频挥翰，诏进新书日再三。”张元济自注此诗：“德宗喜读新书，尝以朱笔开列书单，交总署购进，署中均以委余。时都中书店新书极缺。余因以筐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假，凑集进呈，寒俭可哂。”由于新书缺乏，他还向在上海的友人了解上海售书的情况，函索书目，并尽量订购书刊及天文地理图表，甚至订购关于政事的英文书，拟自己尝试翻译。

当时，维新舆论及传播中心在上海，由梁启超、江康年主持的《时务报》亦在上海编发，成为一时翘楚，张元济与汪、梁羽书频递，互通声息，对维新活动中出版事业的重要性多有探讨。张元济还承担了在京中分派报纸，扩大其影响的事务。从现存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张元济致汪康年数通信札的内容看，有许多关于上述事情的叙述。值得稍加注意的是，张元济对守旧派阻遏维新抱何种态度，兹略摘数语：

---

<sup>1</sup>《书札》14页。

<sup>2</sup>《诗文》57页。

“今日之事，苟欲稍异庸俗，彼苍必乡遏之。天变盖可知矣。……强学复辙不远，一切概从静晦，想不致有意外也”。（丙申十二月十四日）

“吾辈今日所当办之事，无论其成否，惟尽吾之心力可耳……今天下未尝无有心人，苦于隔而不通，散而不聚耳。今渐通矣，聚矣。凡有同志，或至馆相访者，或以文字相赠者，吾兄宜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贵报似宜多论西人有益之事，以敌动群论”。（丁酉三月二十五日）

“守旧之徒，方目吾辈为无成，果无成，为彼类所笑，患犹浅；使外人所笑，其害不尤深乎甚愿公与卓（指梁启超）之一雪此言也……然阻力之来。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夫欲成一事，阻境愈多，而进境亦愈广。西人知之，故日进。中人一遇便缩，故一事无成。”（丁酉七月二十七日）

“凡作一事，必有许多魔障，吾兄千万以坚忍持之，一雪黄人之耻。过此以往，未始无坦途也。”（丁酉八月初九）

未必具有深刻的思想，但耐心和坚持乃是张元济从事维新事业时所自勉和期于同志的。确实，在中国，做事很难，也难免有许多磨折，也正因为如此，“耐”和“坚持”的历史意义才更为显示其价值。同时还有另一面的问题，即改革的进程，急变与渐变，何为可取？张元济感觉还是谨慎渐进比较策略：“吾辈今日做事，摘瑕伺隙者，不计其数。少一不慎，即为所毁矣。岂惟仇我者有然，即自谓趋时者，方其半明半昧时，于此等事，亦必致触发其旧毒也。”（丁酉三月二十五日）这也正有轰轰烈烈为之不若兢兢业业为之的意思，也鉴于强学会被禁之前车，恐蹈覆辙。

既抱有上述的想法，当汪康年与梁启超在《时务报》的言论和控制权上面发生冲突时，张元济写信给他们，作两面的劝解，提出：“处今之世，即合此十百有志之士通力合作，犹恐未必有得，况复显分畛域，同室操戈！济处局外且深悲愤。”处于局外的张元济确实也无能为力，调解是无效的，梁启超终于去职。过了不久，在戊戌百日维新期间，《时务报》由光绪帝下谕改为官报，委康有为主持，迨后政变发作，未再出版。

据说，由思想气质的不同去分别，有两种人：一种人常认为可以找出些简单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另一种人却常感到事物通常是复杂的，因而对所遇到的情况有多种考虑。在晚清整个维新变法的进程中，守旧而顽固者不论，在具有维新思想的人中，诚然有上述所分别的两类，前者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以政治变革推动近代化，后者则寄望于自下而上逐步地改良教育、传播新知、转变风气来促成社会之近代化转型。前者视后者为“缓不济急”，后者视前者为“欲速不达”，而晚清中国之社会变革环境对二者都有阻遏。这是一个难解开来的历史疙瘩，也是后来产生辛亥革命的原因。张元济的倾向接近于后者，他的性格也偏于沉稳柔韧，不是能够发扬蹈厉，跻身于政治风云的人。这很自然，这使他的维新努力仅仅主要落在了办教育上。如此，不须外露锋芒，也可以避旧党猜忌。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初，张元济与若干同道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后更名通艺学堂），参与筹办者有陈昭常、张荫棠、何

---

《书札》16—27页。

梁启超发表《知耻学会序》等文章，引起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满，汪康年被要求收敛，后汪删改梁启超及康门弟子的文章，梁启超愤而去职。《见戊戌变法史》第三章第3节。

致梁启超，《书札》56页。

藻翔、曾习经、周汝钩、夏偕复等，均系一般部曹官员。该年二月二十九日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云：

此间学馆名曰西学堂，已呈请译署备案。来学者已有二十余人，报名者尚络绎不绝。

都人士尚元异辞，但能支持一二午，有数人稍着成效，可望长久。

办一所以教授英文和数学为主的西学堂，看来好处一是可作育人才，二是可逐渐转变陷溺于八股帖括之学的风气。这一年，正是戊戌维新的前一年，各地都涌现了不少新学堂，但在都城官绅眼皮子底下，还算是新鲜事。在此之前官方也不是没有办过学堂，著者如京师同文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但格局气象不大，兴办教育的功能比较狭窄，即如刑部侍郎李端荣所言：

诸信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其未尽一也。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其未尽二也。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未尽三也。……

总之，新式教育虽然有了，但实践尚不成功，体制未备，效果亦不理想。所以必要的是尽量推广学堂，由张元济这样一些有心人加以筹划，或不无裨补。学堂本为教授西学而设，但为了得到官方认可和筹款方便，不久即定名为“通艺学堂”，并加以传统的解释说：“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这所在京城琉璃厂赁屋开办的学堂，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和皇帝的批准，张荫桓（樵野）侍郎还函情各省督抚募捐。从本年张元济致汪康年各函中可看到，张为学堂商量聘请教师，购置图书仪器及拟定章程花了不少精力，但学堂是否能“可望长久”，还在未卜。首批进馆的学生有叶景葵、林旭等。林旭即为戊戌政变死难的六君子之一。叶景葵后来则是经营兴业银行的藏书家，成了张元济的好友。转眼年历翻过，一八九八年（戊戌）来临了，这一年发生了大事，即张元济也被卷入的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政变后，新政皆被推翻，尚在草创伊始的通艺学堂随同它的创办者一道被株连，夭折。张元济办学的首次努力亦被打消了。

### 在百日维新中

甲午战败后，旧伤未愈，新疴继来，虽然庞大的清帝国仍在支撑着架子，牵补度日，但几年过去，朝野之间要求自强维新变法的呼声逐渐强烈，与此相关，思想和权力的冲突也趋于紧张，而且趋于表面化了。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间，外患日深，危机日迫。一方面因德国传教士在曹州被杀而发生山东教案，德国趁机强行扩大其在山东的势力，强占胶州湾，另一方面因战争赔款和军费之负担，清政府大举外债，俄法德英诸国提出各种扩大势力的勒索条件，形成咄咄逼人令清政府步步退让的一股瓜分狂潮。此种局面对于国中有识者，无不感刺激痛心，正如张元济写到的：“大

---

《书札》13页。

《清推广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14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张元济《通艺学堂章程》，《从翰林到出版家》26页。

德国强租胶州湾，在山东建铁路，沙俄强租旅顺、大连湾，法国强租广洲湾，英国强租威海卫、九尤半岛。

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也正是一晚晴悲落日，怕看破碎到山河。

忧患深切，不知伊于何底。此情此景，不免令许多忧患抱怀者拂衣而起，寻求拯救斯世之道。这种寻求，到一八九八年之际，在朝廷内外聚集为迫不及待变法维新的吁求。几年间，总的看，维新和要求变法图强的势头在增长，影响在扩大。譬如各地方组织学会，开办学堂、书局，发行报刊，造成一定的舆论、气候。其中像严复译介了一些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料，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提醒中国人应意识到自然界存在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法则，应面对有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的残酷历史事实。他还在《原强》、《救亡决论》等论文中指出，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国民素质，素质如何要看民力、民智、民德的水准高低。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何在？严复的答案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于是就要改革，如禁缠足，废八股，倡西学，设议院等。严复是福州人，生于一八五四年，虽然他比张元济还大十几岁，早年却未走科举入仕的路，曾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去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归国后弃武从文。由于他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学术的了解不是浮光掠影，其译著每能发人所未发，切中肯繁，《天演论》一时不腔而走，洛阳纸贵，使国人感到震动。张元济的维新思想固然不具严复那样的理论色彩，二人却从创办通艺学堂时起就有知音之交，而且维系了多年。

从政治史着眼，戊戌变法的主角并非严复与张元济，起了直接推动作用的应属康有为、梁启超。关于戊戌变法，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概括其特点：康有为的“策”、梁启超的“笔”、谭嗣同的“血”。其实，光绪帝也起了关键作用。从一八八八年起康有为曾屡次上书，“请查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一八九八年一月他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三点计划：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并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言意殷殷，几至肝脑涂地。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曾叙述：

书上工部，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奏，然京师一时传钞，海上刊刻，诸大臣士人共见之，莫不嗟悚。有给事中高燮曾者，见具书叹其忠，乃抗疏荐之，请皇上召见。皇上将如所请，恭亲王进谏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于是其书卒得达，皇上览之，肃然动容……叹息者久之。……书既上，命总理衙门王大臣会议，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彼得交政考、并进英人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计政要诸书，上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于是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龢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

---

《年谱》38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1.249页。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312页。

时康有为官工部主事——引者。

下诏定国是……

四月二十三日即公历六月十一日，由此日到公历九月二十一同，是为“百日维新”。其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为变法屡屡献策，光绪的上谕也下得不少，但短期内很难实行大政制度上的变革。因朝中守旧官僚甚多，欲变法须引进新人，亦势必有所排斥损革，这一点也恰恰触动了敏感的政治权力斗争。守旧派对康、梁及超擢提拔的“军机四卿”（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更是忌恨不容。光绪名义掌政，实权却还在西太后及掌兵权的荣禄手里，西太后正是守旧派的后台。他们搬出“祖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戊戌变法虽然是涉及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内容的一次运动，但是当变革尚处在“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时代里，政治权力斗争往往支配一切，并不惜把改造现实的热情和求真理的精神无情扼杀。政变后被杀头的谭嗣同之所以慨然认定“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绝非虚言。也正由于历史所特有的这种复杂性，原本淡泊于政治功利的张元济，亦被卷入戊戌政潮之漩涡。

尽管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变法主张不尽相同，张元济的维新思想仍十分明确，或可说大同小异。区别则大抵在于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上有不同倾向。这可以从张元济上光绪奏折（《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的内容上窥知大概。此奏折列陈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大旨为：一曰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二曰融满汉之见，三曰通上下之情，四曰定用人之格，五曰善理财之策。如能次第付诸实行，其变革的程度不为不巨，但在谙熟晚清世故者看，何尝不带几分书生气呢！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光绪下诏变法后的第五天，对于张元济一生是个关键日子。先此，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子静）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疏曰：“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画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折上，光绪帝使命康有为、张元济于六月十六日预备召见。下面是召见那天的情况，张元济自述：

二十八日（即公历六月十六日——引者）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屋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魔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大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光绪坐在上百。前面放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的了，也不便再说什么。这次难得的召见，虽然是作为低级官员而天颜咫尺，很为引人注目，但

---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1.250—251页。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1.336页。

《戊戌政变的回忆》，《诗文》233—234页。



张元济既未对变法有所建言，光绪亦未就大事决策有所垂询。可见戊戌变法开始之无头绪无计划。在张元济看来，光绪皇帝优国之心殷殷，确想励精图治，然而虽贵为天子，却无实力无经验无可依靠之组织力量形成政治权威，因而一面希望皇上能“坚定立志，勿淆异说”，“延见群臣，以宣抑滞”，“设馆储才，以备咨询”，另一面对变法的估计又是低调的，并不乐观。谈话时，“见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亦不敢多言”。此一细节亦颇可说明问题了。

毕竟，六月十六日的召见，君臣独对，使张元济直到晚年都怀有知遇之感。有意味的是，对于光绪，他虽不掩饰以明君圣主相期，却了解了皇帝近于“囚徒”的处境，对光绪的这种处境和悲剧性人格，怀有已经超出知遇之感的道德同情。对西太后及旧党的阴谋倾覆亦深怀道德上的厌恶。他后来写诗表达过这两种心情：

微官幸得覲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  
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常留涕泪痕。苦口丁宁宣国是，忧勤百日枉维新。  
为拯国危频发愤，反违慈意竟成仇，幸灾乐祸心何毒，岂是人鸣戴言头。  
何处鸡声鸣不已，风萧雨晦倍萧寥，分明阴盛阳衰像，应是司展出牝朝。

诗惟纪实而已，同时，前两首写光绪兼寄同情，后两首写西后及旧党兼致抨击。张元济并未从政治角度去评价历史，但历史之进退曲折恩恩怨怨以至于血泪斑斑，何尝不使有良心者铭心刻骨！

与张元济同日被召见的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也可以说，康有为要求维新变法计划已久，此时机遇到来，他自然有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企图一展抱负的欲望。光绪也准备重用康有为，但格于守旧大臣之反对，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职位，准其专折奏事。由此可见旧党对康有为一派始终加以防范，且结怨甚深，表面上是观点冲突实际上是利益权力上的冲突始终无法调合。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不断上递也替别人代拟了许多除旧布新的奏折，同时旧党的反攻也仍直在酝酿，并且准备发动政变。寻迨九月中旬，山雨欲来，光绪恐自身难保，于九月十五日密谕杨锐等令筹良策，十七日明谕康有为速赴沪督办官报，实际上即要他快走，以避风险。康于转圜无望莫可奈何中于改变前一日乘轮离京，侥幸出离虎口。可以说，光绪之任用康有为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变法的激进派，对维新运动的推进与失败，影响都是不小的。

正像对戊戌变法怀有矛盾的想法，张元济之于康有为，也持有并不明朗确定的矛盾看法。张与康显系两种思想性格的人，张元济亦非在思想上能树立旗帜广通声气的人。作为晚清变法进程中的稳健派，一方面其关于维新的主张同康梁的拟议极为相近（如他在《追述戊戌政变杂咏诗》跋文中提到的：“德宗下诏求言，许各部司员上书言事，余连递封奏，请满汉通婚、去发辫、除拜跪。阅者为之咋舌”），另一方面，张元济当时对形势之估计不大乐观（在七月二十七日致汪康年信中他说：“弟四月廿八日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

---

一八九八年八月二日复沈曾植中，《年谱》26页。

《追述戊戌政变杂咏》，《诗文》58—59页。

杂咏诗第九首跋语云：“德宗发愤为强，力求自立……西后谓，任其横行，彼必自食其害，我们尽可坐观。噫！此何言也。岂尚有人心者乎”。

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不过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因而对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匆匆进行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的改革——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同时，也像许多朝臣一样，张元济也不欣赏康有为在为人处事上的躁厉以及标榜、哗众取宠的表现。因而既称“康固非平正人”，又称“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既曾私下批评过康有为“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又曾称道过“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这种此一说而又彼一说的矛盾认识，反映了张元济处于人事纷坛机牙错出的史局之中亦难以洞察幽隐，识断别裁。光绪作为皇帝不能把握晚清中国这艘大船，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张元济同样也“愧无良药”，但好在他未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持有一份冷静，看到“虽日言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的现实状况因而倾向于利用变法已取得的一些变革条件做些谨慎切实的努力，以免全盘赌输。他针对康有为（号长素）说：

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撻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

戊戌时节，在维新派内部以张元济为代表的稳健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思想分野，也许正在于此。只是，无论何种选择都难以克服历史羁绊，促进中国的近代化真正走上轨道。

也正因为如此，百日维新中的张元济既不乏呼唤改革的热情，又不免对未来忧心忡忡。所谓“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恰是透彻的观察。这种观察大约影响到张元济徘徊于新政几度波澜的核心之外。

七月四日，光绪诏谕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氏便邀请张元济出任大学堂总办，这显然是由于张元济热心办学并致力于革新教育，在京中已颇著声名所引来的。然而张元济力求辞免此项任命，这也体现了他对此时官方办学的成效颇有疑虑。两年之前，当强学书局被改为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时，张元济即已略识其人之朝贵气习难除。此种观察已不幸而言中。张元济甚不愿入其藩篱，陷入与官场陋习和人事纠葛的周旋中，难以自拔。七月二十六日致汪康年书故云：“大学堂事寿州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可叹可叹。”这是张元济第一次辞官不就，紧接着，新政的一项举措——新设立的矿务铁路总局，由光绪下诏开办。这一次张元济参与了事务，因为机构的负责人为总理衙门大臣如王文韶、张荫桓等，张元济以总理衙门章京身份被荐兼任该局章京。他迅即上折，奏陈设局办事应以善用人才为先：“应清明降诏旨，凡新设额缺，令中外大员不拘资格，切实保

---

一八九八年九月廿三日致汪康年书，《书札》46页。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引语，见《汪穉卿先生师友手札》。

《上光绪奏折》，《诗文》110页。

《追述戊戌政变杂咏》第5首跋，《诗文》57页。

据该年七月《国闻报》载，大学堂总办、提调诸职皆系兼差，张元济认为各员应一概开去本衙门差使及兼差，专办学堂事务，孙中堂未予允行，故张氏决辞。

《书札》45页。

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此乃什对改革当中易于产生的“新瓶旧酒”、“新鞋老路”而言。张元济并且表示自己本无做官的私念：“臣现在矿路局当差，只因该局设立总理衙门之内，可以就近清厘案牍，将来另设衙署，巨力断难兼顾，必当辞退。”

在百日维新期间，张元济原不乏竞进的机会，然而他除了关心新政之外，仍安于做份内的事务性工作，筹办通艺学堂。他的修养和素志体现于自己的进退上面。同时“不竞进”也表明其人对变法的环境、条件持不乐观的态度，因而谨慎地避免过多介入。事实上这是明智的。一开始可能就是这样，张元济的思想并未受传统的束缚，但是在人格的平正上，他又是传统优良人格的继承者。

### “戊戌党锢子遗”

从六月十一日“诏定国是”到九月二十一日政变发作，整个的夏季，在京城里，维新变法的举措似乎在加紧进行。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反动”之力亦从匍伏到对抗，逐渐加强。这期间，慈禧太后一直住在城西北的夏宫颐和园里观变，光绪帝一共十二次赴颐和园请安驻蹕。尽管许多事情太后允光绪“自酌”，但大权未尝一刻放松。实际上从多次宫廷风波（如辛酉政变及两宫垂帘。除掉东太后及为同治、光绪主婚）看，慈禧太后的权力欲和搞阴谋的手段均不差，因而“百日维新”的失败可以说势有必然。这好像下棋，新政的棋形虽然布开、有声有色，但“势”不厚，而旧党却采守势，以逸待劳，伺机使出能置对方于死命的“杀手”。譬如，从任免官员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慈禧在新政开始时即已准备政变的布置，如明诏变法之第五日，即免去帝党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内调王文韶，而以其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到十天，荣禄由署理而真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新建各军，并加文渊阁大学士。同时又派崇礼署步军统领，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把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控制在其亲信手中。”而新派对此可说毫无经验，光绪及新政诸卿虽诏策不断，终究孤掌难鸣。

及至八月末九月初，诏旨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一批衙门，引起旧党群僚恐慌，又因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骙阻格主事王照上书条陈事而将诸人一并革职，矛盾更趋激化。而光绪皇帝变法之心益为操切，于是起用谭嗣同等四位年轻的军机章京，似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以至当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旧党怀塔布、杨崇伊等去天津荣禄处策划，光绪皇帝感觉紧张，密诏中已有“朕位且不能保”之语。于是匆忙之际召见和超摧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据说谭嗣同曾夜访袁世凯，意欲说袁勤王，除旧党。袁世凯用一番假说骗走谭嗣同，“反覆筹思，如痴如病”，“感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改良派也是书生空谈，慈禧太后却是柄政多年，根深蒂固。投靠光绪，自身不保；投靠慈禧，高位易得。就在二十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当晚，荣禄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次日（九月廿一日），慈禧太后重新临朝，把光绪皇帝幽于瀛台。”在天秤陡转，风暴即来

---

《上先绪奏折》，《诗文》120页。

《戊戌百日维新运动大事表》，《戊戌变法》 . 557页。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421页。

时，张元济的情况如何？他后来说：“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才，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说这事一定要往前进。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秘密我未参与。”

情况已发生了可悲而且难以挽救的变化，本为局中人的张元济却处于“局外”状态。一介书生，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这并不奇怪。古已有之，历史变动往往被笼罩于阴谋的迷雾之中，足以说明非政治性角色的张元济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只能处于边缘。这是一种尴尬的处境：作为维新派，他心怀责任感，至少是要为上了船的光绪皇帝划划桨，而作为维新派中的稳健派，想和缓危机的态势又做不到，权力斗争已是材欲静而风不止了。这种环境和性质，他作为“外围”不可能了解。

九月五日，张元济上了一道奏折——《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从名称宗旨上皆可看出他对变法的系统认识，骨子里也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寻找病症（现实中变法的困难）以求开新。奏折提出的一些建议应该说比较切实中肯，所谓“审脉察情”，“绘图布算”，绝非泛泛之言。然而其总纲五条，如“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定用人之格”等，非不扼要，其实又在当时条件下乃无从实践者、因为必然要触及后党守旧集团的痛处。由此也可见张元济拯危救焚之心虽颇为迫切，终究不免书生志略，按说，就思想而言仍他的主张不过是对若干年来维新思想的一次具体陈述，尽管如此，直到戊戌变法已加以实际之起时，仍难以付诸实行，由此亦可见晚清近代化进程之艰难。

奏折上达的这一天，正是光绪任命谭嗣同等四京卿参与新政的同时，党争已经激化。随后的半月内，诸多问题已难以从容讨论或试为筹划。尽管也许光绪接受了张元济的某些想法，譬如准备开懋勤殿议政以总揽“变制定宪”，皆因准备不足或力量有限而搁置，且无补于日渐恶化的处境。

政变发生，慈禧临朝。当时张元济尚不知情。他后来追述说：“八月初外间风声甚紧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因为他是日本名人，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伊藤答应接待。初六日（即公历九月二十一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当时还不知政变的事。伊藤对我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他不好明说，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

很快，政变消息便传遍都城了。紧接着是追捕康有为、梁启超，康、梁的逃亡以及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捕与遇难。被抓的人还有许多，如保荐过张元济的徐致靖、尚书李端棻、侍郎张荫桓。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一时气氛恐慌，张元济的命运吉凶亦在未卜之间。

虽然形迹、志趣各有不同，张元济总归名列新党，与百日维新有解不脱的于系。此时，六君子披诛，朝廷缇骑四出大捕党人，张元济亦有获罪可能。

---

《戊戌政变的回忆》，《诗文》235页。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在农历七月廿九日，即公历九月十四日到达北京的。

《戊戌政变的回忆》，《诗文》235页。

有人劝他逃亡避祸，他不逃，理由是：“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为？惟有顺受而已。”

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分作累囚候明诏，敢虚晨夕误衙班。

这首诗，张元济自释云，那两天仍照常到署值班，静候逮捕，是因为怕缇骑到家，惊及堂上老母。既然步军统领崇礼兼着总署的堂官，自己在署中，缚送方便，可免到家查抄。这样的安危大事，他可谓临之镇静。谭嗣同将生死置之度外，愿以流血醒世，为戊戌一幕大悲剧中最为慷慨激昂者。张元济的性格与谭嗣同并非一路，然而也可称为置安危于度外的任者。

张元济在等待中还一时冲动，赴贤良寺谒李鸿章，思图说动李鸿章对局面有所挽回。当时李为总理衙门大臣（九月七日谕免，后任两广总督）。张自述：“余既见文忠于贤良寺，直陈来意，谓强邻遣人觐国（时日本伊藤博文以聘问为名昨甫觐见），设将变法之事遽行停罢，甚或对皇上别有举动，恐非社稷之福。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剑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文忠闻言，瞠目视余者久之，默然无语。”如此“妄欲回天”，不说张元济之愿望是否可能有一点儿影子，他恐怕也是根本找错了人。甲午之后李鸿章被人指弹甚烈，因而对新党忌恨极深。旧党骨干杨崇伊是其亲家，李实际处于破坏新政的幕后地位，此时他正在幸灾乐祸，焉能对张元济之请求有所表示。这也可见张元济的书生气之一斑了。

不过，政变后的迫害确也遭到了限制。例如徐致靖、李端棻等人未被处决。赵凤昌《戊庚辛纪述》云，由于政变引起各国的专注，中外震惊，谣传有废立之谋，英领事表示将干预。盛宣怀急电荣禄，“望勿再有大举”。这大概起了作用，因清廷确实害怕外强干涉。张元济也终于未遭到逮捕。

十月四日，事情明朗了，圣旨下，张元济与王锡著、李岳瑞同被“革职永不叙用”，感到夹杂着悲酸的轻松，张元济将通艺学堂结束，校产造册，转交于京师大学堂，也准备结束他六年的京官生活了。

无官赢得一身轻，犹望孤儿作范滂，志去范滂今尚在，不闻阿母唤儿声。

此诗跋语曰：“余既褫职，晨起见邸抄，送呈吾母。母诏余曰：‘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言下抚慰再四，余不觉捧母手而泣。”张元济由自己的际遇想到了东汉范滂，范滂因建宁中钩党之祸系狱，范母镇定地与之诀别。所幸这次满朝钩党，张元济尚可放归田里，犹可奉母南旋。他原是准备对苦难有所承当的。

后来，张元济刻了一枚图章以自况，铭曰：“戊戌党锢子遗”。正如曾举荐过他的徐致靖，政变后被判“斩监候”，后于庚子年放出，遂改号“仅叟”，意谓六君子被杀，自己刀下仅存，是一样的意思。

### 余音与回想

自一八九二年初入京会试，到一八九八年十月革职离京，张元济在京城一晃已住了近七年时间。这临近世纪末的年头，越发失去了平静，添加着忧

---

《诗文》60页。

同上，61页。

《诗文》60页。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319页。

《追述戊戌政变杂咏》，《诗文》62页。

患与动荡。在张元济走向“而立之年”过程中，有两次震动，扭转了他作为传统士大夫所要走的道路。第一次震动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其投入维新的潮流。戊戌政变则是又一次更关系自身命运的震动，由此，张元济的文官生涯这然断送，落花有情，流水无意，借政治改革而推进国家近代化的愿望，成了破碎的梦。“心灰意懒”之余，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变得现实了。也就是说，没有想到，一朝之间，其人人生的传统规范、契约、束缚也松弛了，张元济亦多少可以摆脱“翅膀”的沉重感。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转折，谭嗣同等人的血惊醒了不少人，戊戌政变使许多人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这是清末反满民族民主革命转进的一个契机。不过，既然张元济从来都不具有激进的思想性格，同时又始终抱有借开发民智逐渐改良社会的素志，他离开北京离开政治中心，便意味着将走上一条教育救国、文化启蒙的漫长道路。

张元济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一日致汪康年信云：“弟事已定，即日南下，约重阳后可在沪相见。”此时他感觉国事堪忧，“祸在旦夕”，但已不能再说什么了。几天后他携家经津抵沪。

维新思想一下子转入了低潮，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逃亡国外了，有的人被关起来，有的人被驱逐，不过也有的人并没有改变其思想方向，只是将其努力转向了面对社会的思想文化场所。在这一点上，张元济与严复、蔡元培、张謇相近，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也与孙中山、黄兴不同，去从事一种较少政治色彩的改革活动。戊戌政变后，《国闻报》被参劾，严复留在了北洋水师学堂，他致张元济函云：

复自客秋以来（即戊戌政变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羸糜，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此一感怀寄托，与张元济之心情大抵是相通的。蔡元培为张元济的会试同年，一直任翰林院编修，也倾向维新，曾自书“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十个大字。政变后，以其“在北京数年的观察与体验，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京都，南下从事教育”。蔡与张之间似有共同的经历与志趣。还有另一个在戊戌年南下回乡兴办实业、教育的张謇张季直，原是甲午一科的状元、翁同龢门下之上，也远离官场，以从事启蒙教育和社会改良为职志。

应该说，这一小批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来自对戊戌变法失败的一种反省，是来自对朝廷、对康、梁激进改革的双重幻灭感。如蔡元培所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犬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约。”张春也说：“在京闻康有力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张元济之于戊戌变法，卷入程度较深，虽始终处于外围，感想则更复杂也更接近实际。譬如在当时的私人信件中，对康、梁的表现及弱点就

---

《书札》46页。

《严复致张元济函》第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原件存上海图书馆，引自《严复传》106页。

《蔡元培年谱》11页，中华书局，1980年。

同上，10页。

张謇自若《年谱》，引刘厚生《张謇传记》74页，上海书店，1985年。

有所批评：

卓如因不羁之才，然以云办事，则未见其可，亦其师承然也。

当然，无论是对光绪还是康党的性格和行为能力的评价如何，张元济都抱有充分的同情式理解，这是因为在维新的大方向上彼此是一致的。潜在的分歧则在于激进与稳健何者更可取。这种同情式的反省，尽管在几十年后历史对光绪及康梁的批评更为苛刻时，也仍然在张元济那儿保持着。还在政变发生的当口，黑云压城，张元济就敢于说出“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的话。他始终认为，投身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者：永远不因其失败而失去精神上的伟大和无可抹煞的历史价值。二十年后的一九一八年，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了《戊戌六君子遗集》一书，默思往事，虽已隔沧桑，感怀犹有不能已于然者。他在序言中写道：

六君子之遇害至惨且酷，其震撼宇宙，动荡幽愤，遏抑以万变，忽忽蹈坎阱，移陵堙谷，以祸今日；匪直前代之钩党株累，邪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已也！故晚近国政转变，运会倾圮，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独其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于天壤间，抑不得尽此区区后死者之责，循斯以往，将溷于丛残，旧文益不可辑，可胜慨哉！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刻之。生死离合，虽复割肝沥纸，感喟有不能喻者矣！

如果是从历史成败的角度去言说，情况可能另是一样，张元济所纪念所推崇的乃是一种先贤烈士的大仁大德精神，一种不惜以流血牺牲救世的浩然之风。作为一个温和的维新同路人，张元济未曾慷慨纵横过，但他的内心又何尝不潜藏着对历史中道德和人格价值的极大关切，以此为圭臬的历史观和人生意义，大概是张元济浮沉一生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当然，给历史之某页作出正确的总结，所谓盖棺论定，并不容易。后来的人们往往都认为，戊戌变法的不能成功是必然的，至于原因何在，解释却大相径庭。

譬如，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良的路走不通的，戊戌变法运动要走改良的路，所以终归于失败。因为只有革命即推翻清王朝，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但是这种貌似正确的解释，却不易解释，何以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多年历史“长痛”中，国家仍陷于内忧外患以及长期的贫困，现代化的目标总是望之如空中楼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改良是必要的，也适于中国国情，但改良非数日之功所可奏效，以晚清中国社会意识及心理的准备不足而论，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维新是过于急进了，尚不具充分的条件与适宜的环境，当然这其中也必须估计到守旧势力仍然控制着权力这一因素。因而变法运动充满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张元济便属于持有此种看法的人之一。如果这种看法隐含了一种“渐进改良”式的历史设计的话，其弱点则在于“缓不济急”。情况如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的争论：严复认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混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对严复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

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致汪康年，《书札》42页。

《戊戌六君子遗集》1—2页，商务印书馆，1918年。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也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渐进改良”很难被实践。

看来在晚清及近代中国的历史视野中，两种思想取向的矛盾冲突及其不绝的余音，反映了中国人进行现代化选择的两难处境。不论怎么看，戊戌变法仍然是有意义的前车之鉴之一。张元济的反省并非那种身处局外说来轻松的简单褒贬，也不妨说在颠扑中他的教育救国和文化启蒙的意向，更为明确起来。同时，在尔后的岁月中，他与许多开明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这种联系的纽带。尽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年的张元济回忆戊戌时承认了改良之无前途，实际上他仍然不失理性地肯定了光绪的开明意识和变法运动的积极性，并不认为维新运动的本质是反动的。而更能反映其对此一史页之观念者，则可见于他三十年代为《戊戌奏稿》所写的跋语中，他简要地说明了康有为的激进活动如何导致了政变之后，阐述了对整个运动的看法：

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欧美，变易一

切，诚非易事。然使无孝钦后之顽梗，又无庸劣守旧之大臣助长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尝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虽不能骤跻强盛，要决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祸。每一念及，为之悲愤！

虽然张元济的社会改革信念早已失去了往日的乐观，似乎此时仍不抛弃其理想主义的初衷。一种理性良知告诉他，有序的变革可以为前进付出较小的代价，但中国历史似乎不肯接受“有序”，宁愿在无序的社会改造痛苦中挣扎。

---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涉园序跋集录》127—128页。



### 第三章 在南洋公学

#### 落脚申江

戊戌年“落叶满长安”，秋风飒飒，张元济“无官一身轻”，悄然南行，来到淤滨浦畔的上海。转过年，就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年头了。

政治改革意义上的维新运动虽已夭折，但广义上的维新也如泼出去的水，纵想收回也收不回来。而且维新正在成为上海这样的开放大商埠（同时也在成为文化中心）生活的某种标志。由于清政府的政治、文化控制在此华洋杂处之地相对薄弱，上海往往与北京相匹敌，成为各种人物往来荟聚、各种思想滋长和起伏的一个活动中心。在戊戌以后，显然，维新时代的主要社会遗产，如新式学堂（西学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学会（士大夫在官僚体系之外组成学术的或文化启蒙的团体）、社会精英主办的新式报刊（影响广泛的传播媒体）仍有其继续成长的土壤。这也正是张元济所一贯感兴趣和有所投入的事业，大约也是张元济罢官后未回海盐老家的原因之一。

戊戌前后之清廷朝野，虽然思想冲突与权力争逐渐为紧张，却也仿佛一所百年老宅，不再秩序森然精神抖擞，情况是颇复杂的。譬如以官绅的分野看，固然是新旧对垒此长彼消，但再加观察，“新”中有左有右，“旧”中亦未尝不有左右之分化，恰似多色的光谱。其中固不乏冥顽不化的“满大员”或者仇视维新的政客，也有些维护旧秩序的权贵，因为搞“洋务”，接触洋人，识见不一定高，却是相信“师夷长技”的。因而对于戊戌变法他们反对的态度一如旧党，对于维新却姿态暧昧，有点儿半新不旧的样子。如当时总督两湖的张之洞、总督两广的李鸿章都与洋务（包括兴办新式学堂、译介西文书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鸿章曾长期经营北洋，通过他的亲信盛宣怀控制许多洋务设施，上海正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李鸿章与张之洞都喜欢延揽人才，不少文人学士入幕赞画为其所用或者声气相应。如张元济的朋友汪康年即与张之洞关系甚深，严复则在政变后留在北洋水师学堂。由于张元济并非政治型的人物，又比较开明温和，革职之后，李鸿章便有意表示安慰，送送人情。李特派其幕僚于式枚上门慰问，并询之以今后打算如何，张元济告以将回上海谋生。数日后于式枚复来谓：“中堂已告知盛宣怀，去沪后将由盛安排工作。”这样，生计也便有了下落。

张元济说：“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只是长官和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怎么个“另眼相看”，不知道。不过由于有这层关系罢，张元济曾在关键时刻两访中堂大人，一次在戊戌政变后，一次在庚子事变后。头一次希望李中堂出来调和政局，第二回劝他不必再为清朝效力，李的回答都是：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老于世故、宦海沉浮多为自身谋算，至于有苛评者称其为“秦桧”，这事固然不免难说功罪，但其心理秘密亦如历史内幕最难道出，岂是张元济可以了解的！

不管怎样，个人的现实是需要安顿。张元济说：“我到了上海，盛宣怀来找我，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一八

---

《年谱》28—29页。

《戊戌政变的回忆》，《诗文》237页。

《诗文》237页。

九九年三月，张元济便被聘为译书院院长。

张元济与盛宣怀本不熟悉。盛也不是一般的介绍差使。南洋公学即是他创办（以官办商捐形式）的一所新式学堂。在近代史上，盛宣怀的名声很臭，但在当时却因其人“长袖善舞”而炙手可热。盛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同治年间入李鸿章幕，得李信任，参与洋务，当过招商局会办、电报局总办、海关监督，凡淮系洋务派所办轮船、电报、纺织等主要企业，悉由一手掌握。到一八九六年时，盛宣怀亦获取芦汉铁路督办权，以上海为基地，遥控汉阳铁厂、大冶煤矿、萍乡煤矿，近制轮、电两局及新创之通商银行，“声势值赫，一时无比。”也就在这时候，南洋公学成立了。这是最早由国人自办的大学之一，即后来的交通大学。

以盛宣怀之力量为南洋公学兴学译书的奥援，事似可为。盛氏做官钻营的私心如何，不得而知，但也主张讲求新学，以“练兵、理财、育才”三事为要，而南洋公学的宗旨则在于培养学生既“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又精于“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仍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在当时，“南公”也有特点，譬如一个是首先在一八九七年四月开学时设立了“师范院”，为学校培养自己的师资。这是中国有师范教育的开端。第二个特点即是兼设译书院，由张元济来主持，译员主要为日人（稻田村六细田兼藏等），主要译述日本和西方教育、政治、经济等新学书籍。第三是公学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设小学校之法，设一外院学堂，并首先编印了《蒙学课本》以及《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等。这些都差堪人意，表明在维新潮流中新学堂的有所前进。

张元济是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到职的，显然他对职事有所设想，在此之前曾致书在天津的严复，咨询译事如何措手，诸如请严复推荐英文译者，问译书之报酬，问政、法、财、商之类如何选书，“拟先译专门字典”等等。这些事务安排，很难立竿见影，故当时所译书目均为日本的军事书籍，状况平平。比较起三十年前江南制造局译馆由傅兰雅、林乐知、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主持所译的格致之书，似乎进展不大。张元济曾感觉一切未得头绪，故盛宣怀递柬邀宴亦谢之。

应该说，在近代维新思潮中，无论是开风气，还是思想建树，影响深远者当推严复。戊戌以后，他“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致全力于翻译事业，所谓“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字字如戡子称出”，且他所译的书皆为西洋名著，并非简单地贩运工具，是以新理来开启蒙昧。作为老朋友，张元济对严复此一工作的意义十分了解，此时彼此书翰往来，商讨合作事宜。严复从一八九七年即已开译的《原富》一书（亚当·斯密所著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最后交给了张元济，由南洋译书院在一九〇一年出版，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书籍。张元济还为此书编制了综合术语表作为附录，这本书虽不如讲“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天演论》影响大，读其书却不乏解蔽之功效。因为它不仅仅是讲“理财之道”，而且阐述富强的源泉

---

汤志钧《戊戌变法变法人物传稿》（下）561页，中华书局1964年。

《交通大学四十年纪念刊》。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116页。

《年谱》31页。

见《严复致张元济函》（1899）

是同文化价值观念有关的。譬如传统的“义利之辨”，尊仁义而贬功利，向来是轻商重农，把个人利益当成恶魔，把道德建立在否定人的建设性活力之上。严复通过阐释《原富》而析论，在文明的利己和“义”之间并无鸿沟。他说：“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指经济学）之论，为之先声焉，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然使其规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君子同求焉，……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大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看来，能激发起建设性的企业家的努力并导致富强的利己，和中国贪官污吏卑劣的自私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都被利用来服务于实现国家的目标。在中国，文人学士消极的“义”和享乐主义者的自私使社会渐趋衰弱。

在《原富》的出版过程中，也许，张元济接受或者说认同了严复的上述思想，他后来之投身于出版业，去从事一种建设性的义利兼顾的活动，未尝不源于此种观念准备。

另外，译书院的工作为张元济提供了一种和编书、出书打交道的机会，也使他同出版印刷业有了接触。时间不久，他因印刷业务的关系，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主人夏瑞芳。他没有想到这种偶然的相识，竟是尔后数十年同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的开端。

夏瑞芳字粹方，上海青浦人，幼年因家贫随作小实卖的父母至上海，入教会所设小学肄业，三年后入清心堂学习。十八岁时入教会医院习医，不久，又入报馆习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报、捷报馆做排字工头，稍有积蓄，便与妻兄鲍咸恩等合资自营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正式成立时，命名为商务印书馆，时在一八九七年。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只为一规模不大的印刷所。在夏瑞芳与张元济认识时，他也未必能想到，商务印书馆后来会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重镇。

### 身在江湖

在由北方回到南方，由混乱、忧虑回复到平静的感觉中，新世纪已悄然降临古老的土地，又一个动荡不安的年头——一九〇一年（庚子）来到了。张元济这一年仍供职于南洋公学译书院，然天下多故，虽一介书生，却未可超然尘外，作四海倦归之想。

那情形或如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

事实上，戊戌风波尚未完全消歇。党祸既兴，慈禧收权，光绪只成了可怜的傀儡。慈禧三度训政，当然有她的顾虑，譬如总归年事已高，一旦死去，光绪重新掌权，为最大的顾忌。因而先谋废立，企图另立庆亲王奕劻之子，改元，但预谋未行，列强均反应强烈，地方督抚亦不以为然，事遂稍寝。后又于一九〇一年初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皇子），是为“己亥建储”。同时企图制造光绪患病不能称职之状况。

但此举阴鸷不纲，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上海绅商经元善领衔通电，有一千二百余人签名，表示抗议。使慈禧恼羞成怒，然而又不能不有所顾忌，

---

《原富 按语》，《严复集》第4册，859页。

本杰明·史华兹《寻木富强：严复与西方》118页。

主要还是怕引起外国干预，不能一逞其愿。这也就种下了庚子事变的一个祸根，同闹“扶清灭洋”的义和拳拳乱有关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整个晚清时代的对外关系，清廷均处于屈辱境地，西太后对于外国人的感觉无非是既怕又恨。外国人同情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大阿哥的计划，使太后和端亲王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本属白莲教一派，是以巫术为中心假“真命出世”为号召的民间会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于山东。因当时山东发生了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人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刺激起老百姓的仇教排外情绪。义和团的首领看到这种情绪一天天高涨，就借此题目为号召民众之幌子，并谬托神怪奇迹，自说能避枪炮，由山东而向河北、京津一带，势力扩展，到处设坛。又恐官府禁止，且扯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当时有批守旧昏聩的官员，竟以为可恃，如端亲王、刚毅等力主收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而且还伪造了英国公使的照会，内有要求那拉氏勿再干政，将政权交与光绪之语。那拉氏召开御前会议，“光绪亦在坐，侍郎许景澄见情势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陈说，向英国一国开战已无把握，向各国开战，尤无理由，又说；义和团决不可恃，如此蛮干，恐有亡国之祸。言时声泪俱下，光绪听了，不知不觉，拉了许景澄的手大哭起来。那拉氏大怒，高声喝道：这是什么样儿。遂由其他大臣将许景澄拉开，叫他出殿。那拉氏见到这种情形，愈益相信，英国公使果然有袒护光绪的证据。一不做二不休，遂决意宣战。”实际上义和团很快就在官方的默许下蛮干起来了，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生在路上被随便打死，教堂和使馆区皆被围攻。北京已陷入混乱之中。

在惶乱中，各国很快做出派遣军队干预的决定。在反对宣战的几位大臣如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被处死后不久，八国联军向北京进攻，于八月中旬占领北京，义和团被证明终属乌合之众。西太后不得已挟光绪“仓皇西狩”，逃往西安。

与北方的混乱相对照，华东和华南的疆臣大吏如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则未采取与朝廷保持一致的姿态，而是封锁“宣战”的消息，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这即是所谓“东南互保”。其中穿针引线参与谋画者即有张謇、盛宣怀及其亲信何嗣焜等，何由于同盛的关系，担任着南洋公学的总理。

一九〇〇年春夏间的动乱，未波及东南，身为布衣的张元济仍不能不以时局艰难亟亟为念。他曾约吴禄贞、陈锦涛、温宗尧等至寓所商谈国事，吴、温二人后均参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活动，是力图推翻西太后而使光绪复位的武装“勤王”的积极拥护者，后来亦都成为反满的革命党人。由此也可表示张元济戊戌以后有所转变的思想倾向。该年六月十八日，张元济读报后写信给盛宣怀，认为“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建议“似宜速兴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sup>①</sup>。六月十八日前，义和团已在京津大事焚掠，洋兵已占大沽炮台，西太后已决定宣战。确实是事急关头，张元济所谓“寻常举动”、“亟定大计”，自然也是呼吁采取独

---

① 刘厚生《张謇传记》90—91页。

立行动以保护东南，可能还暗示借此机会以策动朝廷政局的大变动。譬如驱除那拉氏，还政于光绪，这种想法当时有不少士绅怀有，张春、陈三立等亦曾暗中运动过，无奈张之洞、李鸿章不肯动作，事遂淹置，不久就开始议和了。

在庚子事变过程中，张元济既对动乱持反对之立场，亦愤慨于那拉氏一党把持国柄之荒唐昏乱。六月二十七日他母亲病歿，盛宣怀来奠祭，七月十四日张元济致谢函于盛氏，又就时局陈言：“今日之事，我公正宜破除成就，统筹全局，毋泥人臣无将之义，一守事豫则立之训，剴切为东南各帅一言而谋……”又言：“北方糜烂至此，实咎在我顽固政府。我既不能遣兵靖难，致外人受此禁毒，懊劳各国兴师动众代平内乱，返躬自思，能无愧愧？”张元济在总理衙门当过差，对外交惯例多有了解，他对事变之看法，对盲动的排外主义引起灾难的批评，对政府的反感，自有其理性依据和自认为出自事实的判断，可以说是对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举动颇不以为然。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正如那拉氏的“爱国”，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

基于此，张元济介入了一场很快就失败了自立会起义的外围活动，因为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的目标——托名“勤王”，借联络会党组织起义，去逆后权臣，恢复光绪地位——与张元济的想法合拍。自立会原名正气会，当七月二十六日唐才常联络士绅于沪上集会时，张元济也参加了。此次集会定名为“中国议会”。组会时声明大旨为：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立，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容闳、严复（此时避北方战乱来沪）被推举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

唐才常是戊戌死难之谭嗣同的同乡、同学，也是同志。唐、谭两人曾自命一个是“横人”，一个是“纵人”，均以变法维新纵横天下为志。嗣同既“前赴”临难，才常誓为“后继”，以酬故友，故戊戌后奔走海内外，组自立会，并广为联络，与秦力山、林圭、沈荃等图谋于庚子年夏武装举义。但起义事虽在策划，曾参与自立会会议的张元济却不了解。七月末稍，自立会第二次集会时，容闳提名张元济任会计事，张辞而不就，说明他对直接的政治活动始终并不热衷。这一次他仍是外围。事实上容闳、严复、张元济等人讲讲话是一回事，能否起大作用则是另一回事。

自立会起义由于基础和准备不够，很快就流产了。因事机泄漏，唐才常在汉口被张之洞捕获，旋即被杀。据说，在审讯时唐才常还讲了一番话：“我们的举动，张之洞以为是造反，实际我们是讨贼。讨的那一个？就是那拉氏，她非但是我们中国的罪人，并且是清朝列祖列宗的罪人。戊戌年造许多罪恶还不够，现在指使义和团，杀人放火，盲目排外，攻击使馆，危害国家，难道张之洞还不明白吗？”这唐才常站着说的不是口供，而是演说。满堂的胥吏，鸦雀无声，好像都被麻醉了。即使如此，唐才常仍不免一死。从戊戌到庚子，情况糟糕到好像所有变动的可能都毁了，许多人对清朝已失去希望，其中也包括张元济。

庚子事变最终以屈辱的赔款议和而告落幕，那拉氏的统治也丢尽了脸面，迫于压力，一些替罪的权贵被惩办了，昭雪错杀的五大臣，并迫于情势，不得不在一九〇一年两次发布“变法上谕”，以收络人心，略补残局。

---

《年谱》34页。

刘厚生《张謇传记》101—102页。

## 守先待后

风波甫定，清王朝摇摇晃晃地去敷衍它最后一个十年。自立军起义在长江流域夭折，激进的政治反对派远走海外，将会以“反满共和”的姿态卷土重来。在上海，曾参与自立会的士绅并未遭到株连之害。他们的心情该是复杂的，一方面国事令人沮丧，另一方面朝廷因退让而允诺的改革又多少安慰了他们的政治希望。其希望的迹象之一，即是推行新式教育的阻力减小了。

一九一一年初，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突然病故。张元济代为总理校务，代理时间约一个学期。开始是忙于筹备附属小学的开学，使其在计划、经费、课本等问题上就绪。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做过驻比利时、日本公使的汪荣宝当时都是公学师范生，帮助先生理事或任教员，这个小学顺利开学了。

张元济服务南洋公学，所做另一件重要的事为“特班的开设”，他为此呈文盛宣怀，谓：“窃维数年以内风气顿开，硕彦名流大都喜通彼学（西学），徒以学堂有限，肄习无门，浅尝辄止，良堪惋惜。兹奉钧谕增设特班，广招秀出之材，俾跻大成之域。”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对时世所需人才的迫切呼唤。章程规定：“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有无出身勿论，曾习西文否勿论。”开设特班，满足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读书人迫切学习西学的要求，也有些类似张元济当初办通艺学堂的宗旨。特班开设了一些西学的高等功课：如地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由蔡元培任特班主任，在教学上施行新式教育法。譬如，课程为：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数学，间以体操。“其指导读书之法，手写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之书目以及阅读此序。门类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文学、论理、伦理等等，每一学生自认一门或二门，依书目阅读，每日令写札记；手自批改。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手自批改。每夜招二三学生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自述对时事感想。正课之外，劝学生习日文，自行教授，并指导学生练习由日译汉。此外，鼓励学生练习演说及国语，以培养启发群众之能力。其教导重心在于灌输爱国思想。”蔡元培与张元济为科举乡会试的同年，戊戌后均南归，此次蔡氏到南洋公学任教，两人尔后的多年合作与友谊，即自办特班而始密。但特班维时不久，张元济不久即辞去公学总理兼职，专任译书院长，特班的学生中有不少著名人士，如后来成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做过北大校长的胡仁源以及民国闻人邵力子、黄炎培和文学家谢无量等。

导致张元济辞去总理职的原因，据说是同盛宣怀派至么学的督学美国人福开森意见不合，“殊难得调”。这位福开森是一八八六年来华的传教士，一八九七年被盛宣怀聘为督学，后接办上海《新闻报》。二人的意见不合，详情无从得知，但张元济在劳神于人事行政和专主译书之间，显然倦于前者。何况不久译书院又附设一所东文学堂，教习日语，张元济又兼了该学堂的主任。当时他比较注重日文翻译人才的培养，拟尽快从日文翻译国内亟需的教育及法规大全等资料。

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张元济致书盛宣怀说：“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

---

《年谱》36页。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12—13页。

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张元济对国事的认识仍落在广泛的民众教育和启蒙上。当然，教育和启蒙的内容即在于使其了解新知识、新思想，即所谓“求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张元济之所以选择译介出版西学书籍，选择为教育启蒙服务的出版业为自己的事业，答案原在于此。进而说，他为什么又离开了南洋公学，进入一家刚刚草创的出版印刷机构工作，也并非偶然。市井坊间，搞书的人向来也不少，但有这种出发点和眼光的人却不多。

尚在公学译书院期间，张元济既与蔡元培志趣相投，便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合作筹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张为董理，蔡为撰述。其宗旨为“荟我国自治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为理论家邮传，而为实际家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报》之刊行，具有救国爱国的出发点，亦与晚清自强救亡的思潮相呼应，譬如张元济的基本观点是：“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对于这个“文明排外”说，严复还写了不同意见加以辩驳，认为“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助于文明”。《外交报》自一九一二年一月创刊（旬刊），至一九一一年一月停刊，共出三百期。初由社亚泉创办之普通学书室发行，第二十九期后改归商务印书馆发行。此为商务所发行的第一份刊物。

---

《年谱》38页。

蔡元培《外交报叙例》。

《年谱》42页。

## 第四章 清季十年

### 初入商务印书馆

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张元济辞南洋公学职，应夏瑞芳邀请，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辞职后，盛宣怀照会南洋公学总办汪风藻，极意挽回，张坚辞之。这番变动的原由，据张元济自谓：“光绪戊戌政变，余被滴南旋，侨寓沪读，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细，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看来，他在公学译书院于得并不顺手顺心，譬如后来克扣严复译《原富》一书的版税即是一例。中国自兴洋务以来，官方曾兴办了不少企业、事业，但弊端甚多，如腐败、效率不高、相为掣肘、官场习气等都是。故郑观应《盛世危言》说过一句中肯的话：“中国工商业之一大阻力，即在官场矣。”办教育、办出版，亦不外乎是。想张元济定已深感为“食官俸禄”办事之不得力，欲遂己志，不若另谋出路，这个决定，于商务、于中国近代出版史都有不寻常的意义。

这儿得先交代一下商务印书馆的来历。

前面说过，夏瑞芳、鲍咸恩二位在一八九七年发起开办了一家印刷所，定名为商务印书馆，最初的资本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大股东是一位天主教徒沈伯芬先生，夏、鲍及鲍咸昌、高凤池都是股东和参与创办者。一开始，添置设备、材料，租房子，资金使几乎全部投入。赖于同人勤恳协力，生意日见起色，除了承印印件、报纸，还请一位牧师将英人所编印度的英文读本翻译为《华英初阶》出版。第二年以廉价盘进了一家日本人所开修文书馆，渐具规模，业务遂见扩充，中西文书籍均能承印，此时出版了《华英字典》等销路不坏的书。大约在一八九九年，夏瑞芳因联系为公学译书院印书的事而结识张元济。当时商务有点儿盲目地请人翻译了一批日文书，可是质量谈不上，因粗滥而无人问津。夏瑞芳就此求教于张元济，并由张约请数人修改译稿，但是修改了的稿子还是不能用，夏瑞芳这才认识到非有自己的编译所不可。先是请张元济推荐一位编译所长，张就推荐蔡元培担任。由于《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炳麟、邹容被捕，蔡因有牵连，不得不逃往青岛暂避，这时夏瑞芳就请求张担任编译所长。时在一九〇三年。

不过，在担任编译所长之前，张元济大约在一九〇一年底即已决定入股于商务。据高凤池回忆，当张元济和印锡璋愿意投资时，曾共同聚会过，讨论合资办法，并进行成立有限公司，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七倍，共计资本五万元。张元济之到馆办事当为一九〇二年初。到馆后即组织编辑教科书。高凤池认为，商务初期之发展，有两件事是关键，一是接盘修文书馆，一是编教科书。王云五也认为，张元济的加入，关系极大：“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说来，在清末维新时代，商务印书馆能干众多书坊、小印书局中脱颖而出，既赖机缘也靠条件。譬如说创办

---

《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诗文》240页。

南洋公学以经费不足为由，少报《原富》销数，克扣严复应得版税，张元济为之力争。

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5—396页。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教育年谱》，《商务印书馆大事记》。



人夏瑞芳的长处是善于识人，善于用人，眼光远大，请到张元济来主持编译所固是一例，对于富有推销能力的人才也是极力聘用，像后来任大东书局经理的吕子泉任世界书局经理的沈知方均为早期发展商务的人才。创业维艰，夏做总经理，一身兼几个职务，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夫（收帐）、买办、出店（供销）为止，一个人都做得。最初他自己月薪才二十四元，却肯于重金聘请知识文化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每月月薪是一百两银子，而夏瑞芳致送薪俸每月三百五十元，对编辑所的编辑，除月薪外，还供给膳宿，连茶叶、水烟都供给，因而进入商务的知识分子，皆肯努力工作。

时人对商务的经营风气也有好的评价：“南商习为骄情，客来落落对之，衣冠敝陋者益加白眼。独商务不然。入其肆，虽三尺童子应客，亦彬彬有礼貌，条理秩然。”

说到机缘，应是指时代环境条件对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发展展示某种机会。如自维新潮起，社会文化处在一个大变动中，人们对于传播新知的出版物需求较大，所谓新书刊应运而生，不腔而走。张元济之进馆主持编译所正有利于商务开拓视野去抓住机遇。同时，由于引进现代印刷技术工艺和新型纸张的输入，书刊的成本亦下降了，便于普及。例如一部《通鉴辑览》木版书，老书坊售价非一二十元不可，商务印的铅印本，用有光纸印，售价不过二元几角，便宜得多，所以畅销一时。

由于张元济在维新活动中曾办过学堂，略知教育与出版的直接关系，较早就体会到，没有相当的教材、参考书，教学便很困难。他进入商务，也可说就是要找一个现实性的机构，在出版方面做切实的努力，给新式教育和启蒙产主一种推动。显然，在科举尚未取消的时代，这样做，既无先例也未必保证会有良好的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好在这种新学堂新教育的推广趋势在经历了停滞以后又恢复到了戊戌维新时的水平，其标志即一九〇二年八月清政府颁布了鼓励兴学、厘定学制的“学堂章程”。这个章程虽称“上溯古制”，实乃“参考列邦”，“以期变通”，在教育制度上的现代形式看齐，来了一个大变化，尔后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格局便成定式。但章程虽有了，各种学堂或也设立开办，师资或教材之缺，往往成为问题。商务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印教科书，既为雪中送炭，又确立了自己在出版业的优势与地位。

陆费伯鸿说：“癸卯（一九〇三年）商务印书馆延聘海盐张元济、长乐高凤谦编辑最新教科书，日人长尾、加藤等以其经验助之，教科书之形式方备。”实际上，从一九〇二年初一进馆起，张元济便已就编写教科书进行筹画，先是采用“包办”方法，聘人分任，但终未编成。又曾约请杜亚泉编童蒙教科书《文学初阶》，聘夏曾佑编《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已先有所绸缪。及“学堂章程”颁定，便率先改为按学期制度编辑教科书，分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每种每学期一册，于一九〇三年编成，陆续出版。也有说一九〇二年即已出版初等小学用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就小学国文教科书而言，张元济主持的商务版教材，并非最早。譬如前有无锡三等学堂编的《蒙学读本》（吴敬恒等编），有南洋公学出版的《蒙

---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夏粹方”条，451页。

《论中国教科书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12页。

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62页。

学课本》（朱树人编），但是均不够妥当，影响亦有限。商务版一出，乃面貌一新，独步一时。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据蒋维乔（字竹庄，曾任东南大学校长）回忆：“当时之参加编辑者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略似圆桌会议，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所发明之原则，涉及儿童启蒙的特点，如何由简入繁，由少而多，循序渐进，增加兴味，综合发展等等。从一开始，高梦旦（名凤谦，后任编译所国文部长、所长）便起了很大作用，张元济亦躬与其事。诸君“合坐一室中每成一课，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张元济主持编印《最新教科书》。自己还亲自编写“修身教科书”和习字帖。此书发行后，又考虑到教师对教学法不熟悉，于是又编印教授法，每出一册课本，即有一册教授法，按照三段教式次序，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深得教师们欢迎。此一首创，为后来各书局编印教科书所仿效。由《最新教科书》闯开路予，商务编辑教科书的范围遂越来越广。到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学部第叫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一百零二种，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八十五种，其中商务占五十四种，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九，营业之盛，冠于全国。

就自己而言亦或就贡献于中国现代教育或服务于商务印书馆而言，张元济这一番努力均是有意义的。一九〇四年，汪康年转告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表示辞谢：“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同时，他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 国岂客人作冗民

中国的知识阶层分子，人生大致不外两途，不为仕进，则为退隐，亦即所谓“儒道互补”。一个国家，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结构（朝），一方面是社会组织（野），仕进，则进入政治结构，而退隐，说是回到社会组织中，但传统的社会组织则是松散的、不发达的，因而徒有“江上钓竿”、“草堂明月”那般的风味聊以自况，或者成为对社会的一种逃避。不过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城市化文明倾向的迅速加强，在许多地方已产生民间办理的公共事业，如实业、文教事业，非朝廷所能干预。在庚子以后的上海，这种情形已很明显，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像张元济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而革除官职，倒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不难做事难。官不做了，一身轻，反可以在公共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样可以安身立命。张元济投身于出版业，也正是有所不为中的有所为罢。不妨承认，与有的人去奉行革命，奉行大规模社会改造理想的情况不同，这是偏于“教育救国”的努力。

有的人的“隐”、“不当官”，常常带有假的成分，是博名沽利的一种

---

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57-58页。

庄俞《悼梦旦高公》、《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59页。

《书札》48页。

手段。隐，或者也有根消极的，但是我们看张元济的“不做官”，却已在悲怀于世事之外，还包含了对官场的透彻认识以及对自身人格的坚持。

国事艰难不忍言，倦居海上且偷闲。

小楼一角无嚣杂，静读南华秋水篇。

这还只是一般的“隐”态。下面的诗句则自具忧愤心情了：

男儿一死何当惜，栋折榱崩事可哀，

江上鸱夷曾几日，忍看麋鹿上苏台。

披君遗札墨犹新，举目山河迹已陈，

我愧偷生四十载，浮沉桑海作余民。

上二首为见林旭遗墨题记兼挽散原老，追思戊戌罹祸往迹，亦可见发自痛感的对政治的疏离心情。但是他对历史和未来又抱并不悲观的信念和信心：

天宁许我长偷活，国岂容人作冗民，

莫负残生任虚掷，试看世事正更新。

在某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张元济式的选择也许就是这样，不是高调的或富于表演性的投入，也不是随波逐流或茫然的，只要认定哪些事是意义和价值的，就去做那些事，尽管它们很有限，与做官发财不能相比，然而在这种有限里，人格却还不会丧失，道德精神也不会落在虚伪里。人们看到，从晚清到民国，不少知识精英在种种昙花一现的政治参与里浮沉，进退得失颇不易说，但历史情境之复杂、选择之艰难，理想目标之渺茫，终究是不能不承认、也令人慨然的。张元济谨慎地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既缘于他狷洁抱素的性格，又缘于一种基本的态度，即认为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达都必须依靠适于现代文明的社会文化基础。

到一九〇四年，清廷（张元济曾称之为“牝朝”）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在这一年，并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戊戌获罪人员。诏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力、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一体开释。”张元济的处分也拿掉了。按说，这是恩典有加，但张元济反应冷淡，嗣后又谢绝了军机大臣瞿鸿禨的保举。

然而尽管如此，张元济除了淡泊于仕途这一面外，是否就不关心和参与世事了呢？也不是。譬如，他作为《外交报》的主办者，常常需要对时事有所评论，只不过，他算不上社会改革问题的思想家，因而既无章太炎、邹容那样强烈的色彩，也不具备梁启超言论的力量与影响。他始终未进入那时社会上政治和思想斗争的中心。

自国门打开以后，晚清思想界的冲突很长时间纠缠在“革新”与“保守”二者的孰是孰非上。同时，“启蒙”和“救亡”的要求都十分突出。张元济本来也是旧式的读书人，但他一直倾向于维新，用他自己的话说：“元济沉溺西学，久已见摈清议。”其从事维新事业，固然是注重国民之启蒙，同时

---

《赠傅沉叔》，《诗文》34页。

《诗文》40页。

《诗文》42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205页，台北，1963年。

《书札》49页。

也是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言“救亡”，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其关心反而益为执著。所以，尽管是在野之身，张元济对民族、民生之忧患却未默然而息。换句话说，坚持自强的民族大义与开放性的世界眼光，在他身上并不矛盾地存在着。所以他在承认自己“沉溺西学”时，亦强调“然于此中外之界，利弊之分，则斤斤自持，不敢稍弛”。

譬如，新式教育自然需引进西学的内容形式，但张元济提醒国人注意设学的主体——“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他的意思又非局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在一九二二年刊载于《教育世界》（王国维主编）的一封信中，他劝人办学须注意：“勿以洋文为常课”，“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勿沿用洋人课本”，“勿滥派游学”等等，可见其主张往往不同于随波逐流者。

与初到上海的几年不同，一九一四年以后的几年，张元济增加了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以及他对时事的评论。而其出发点则是一个拥护改革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或者说，站在民众的立场去维护民众的利益。无论在甲午之后还是在庚子之后，屈辱破败的中国都面临着经济和财政破产的局面，对外赔款的数字是巨大的。同时，为维持统治秩序而进行被迫的改革，包括急于进行工业化，资金短缺力一大难题。显然，政府和大官僚们乞灵于借洋债，而许多利权便作了抵押，包括海关、矿业、铁路等，逐渐为洋人所控制。这种丧权趋势和经济侵略的阴影以及官僚们的中饱私囊，损害的是国家主权和国民的利益，因而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和舆论的反响。这种情况，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具有紧张的经济、政治冲突性质，史书上称为“保路运动”，亦即由民间产生了保护中国铁路权的运动。

如果说对于一九一四年粤汉铁路控制权问题张元济还只是提醒国人注意，而对于沪杭甬铁路（它通往张元济的故乡浙江）的借款兴办，他则表示了激烈的反对。作为浙江乡绅，在浙江建铁路，有关桑梓，他要出来讲话以尽匹夫之责。浙江铁路如何办，事情曾有几起几落。先是英国人由于把长江流域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在一八九八年与盛宣怀签订一个初步协议，包括准备建造苏杭甬铁路，但是后来并未落实仍一九一四年五月，又有德商洋行勾结浙绅沈佶斋等欲修建自上海浦东经浙江乍浦至杭州外湖墅之铁路，张元济闻讯十分气愤，连续写信和发表文章，对此数人图谋私利之举，加以阻止。他的看法是：“铁路非不可办，而在我国是彷徨内力萎缩之中国，则不可办；而民智未到，物产有限之浙西，尤不可办。洋股非不可合，而在我国主权日削，外力增进之中国，则不可合，而强权自逞，凌厉无前之德人，尤不可合。”这不失为一个较理性的看法，要点在于：修铁路须首先考虑合理的投资建设环境，以避免弊端与后患，还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经济爱国主义”，尽管它确实是从国民利益出发去估价利害的。

回头看，晚清的改革与社会近代化之所以困难，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复杂难以尽说，内因、外因都有，但条件和结构都不适应，可以说是不治之症。

---

《致沈佶斋信》，《书札》49页。

《答友人问学堂事书》，《涛文》171页。

《论粤汉铁路事》，《诗文》176页。

《致沈佶斋信》，《书札》49页。

铁路风潮即是一例。民心所在当然是要争路权，而官方又要官办，官办就要借洋款，且腐败而不得人心；民办商办（通过发行股票集资）亦因为克服不了各种管理上的矛盾冲突而不获成功。例如一度私营的粤汉铁路公司（郑观应和梁诚先后任总办）曾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其中已花的约一千万只铺设了四十五英里长的铁轨，最后又被收归国有。浙江铁路的情况与此相似。

尽管张元济对时局持谨慎看法，亦由于其所持民众立场，为抵制外人对铁路利权的攫取，转而赞成浙江铁路由民间集资自办。一九〇五年七月，浙江绅商在沪集议拒绝英美借款，决定集资自造铁路，创设浙江铁路公司，由汤寿潜任总理，张元济任董事会董事，由此而卷入浙江的“保路运动”。到一九〇七年，浙路公司正加紧进行，而英国不肯取消原来借英款的初步协议，迫使清政府妥协，于是张元济等代表浙路公司赴北京请愿、谈判，以拒英款自办为目的。在北京同奕劻、袁世凯等谈了约一个月，结果仍未达目的。

据当时《申报》载，一九〇八年八月，张元济等四代表往谒外务部各堂，磋议路事。袁世凯（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提出所谓“邦交、民心两面兼顾”之“部借部还”方案，“将此款改为邮部承借，别筹顾全商办之法”。代表虽仍力争自办，无奈苏浙铁路公司电允转目，张元济十分失望，南还后，遂不愿积极参与铁路公司事务。浙江铁路虽以折衷定议，后仍然成为官治公司，在清末“国有化”风潮中并未摆脱“官督商办”的弊端而遭厄运。四川、湖南等地继起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了加速清王朝崩溃的重要因素。

### 前进与保守（上）

自张元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清代历史落幕，约十年光景，也正是张元济的壮年时代。总的看，大的环境不如人意，清王朝的统治可谓每况愈下，覆辙不远，诸如朝廷亲贵之腐败无能，吏治日趋溃烂，财政窘迫，挖肉补疮，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排满革命呼声益张，而所谓新政改革，究是纸上空文，旧疾未去，新病亦来，种种积患皆成末世征兆。

但在这段时间内，张元济致力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促进商务的全面发展，贡献却是显著的。据统计，商务自一九〇二年正式出书，书刊出版数量逐年增长，由一九〇二年的十五种二十七册扩充为一九一一年的一百八十二种四百三十五册。而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创举，此又以商务印书馆为前驱。与徒托空言不同，张元济所默默从事的这类维新实绩，应给予文化史的特别记载。再具体看，张元济主持编译所之初，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法意》及林纾、伍光建译的泰西小说等书，都在当时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一九〇六年，还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的胡适，述说他第一次读《天演论》时“高兴得很”，据胡适说，“几年之中”，《天演论》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

---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年谱》74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1页。

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风气所及，原名胡洪骅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择取了“适”字作自己的表字与笔名。

编纂工具书字典辞书，也是商务的眼光所在。如由陆尔奎、高梦旦、方毅等主编的《辞源》，编纂始于一九〇八年，历时八载而成，行销甚广甚久。此外一九〇二年印行了《英华音韵字典集成》，一九〇四年出版了邝富灼编的《华英字典》，都是我国最早自编的外语字典。期刊方面，张元济加入商务后曾创刊《外交报》，一九〇三年又创刊《绣像小说》半月刊，一九〇四年创刊《东方杂志》，风行全国，至一九〇一年每期印数一万五千份，销路为当时全国杂志之冠。

凡此种种，反映张元济及商务经营方向顺乎时代潮流而服务社会的性质，是超出一般书商的意义了。或者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化转折过程中，肯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在清末十年这一艰难而且不无代价的转折过程中，张元济除了操劳于商务馆事，亦未尝不分心于社会事务。由于他的学识、出身和一定名望，无形中处于清末东南士绅的一定圈子之中，成为代表性的人物。加上其人肯于进取而又淡泊名利的性格，便与晚清社会变动潮流有着一定的关系。当然这种参与在近代中国往往是悲剧性的。由于张元济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那么，第一，他的参与一定属于有限的、温和的行为，不具备激进的思想意念；第二，其命运则取决于历史情境是否接受和顺应改良主义的建议和规划。

一九〇一年，庚子事变之后，清廷被迫准备实行教育、军事、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这虽然不过是流产了的戊戌维新重新提上日程，还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打算实行改革的诏书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些话说得不错，同时也意味着，能否破掉“私”、“例”二字，乃改革成败之所在，而在彼时积弊难返之中国，决非易事。

清末的改革，譬如说教育改革（主要包括改变古老的科举制度、兴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逐渐能看出来，它有着一种根本的自相矛盾。也就是说，清廷的改革仍然有它的基本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开明富强的人才，而是培养一种热爱和忠于清王朝的人。但是实际上，一旦禁锢放松，在思想趋向自由的环境里，便会产生对现实秩序的怀疑与批评，使许多人感到腐败的王朝不值得去热爱、效忠。例如政府鼓励青年人到日本去留学，于是留日的中国学生逐年增加，结果是留日学生团体出现了独立的“离经叛道”的倾向。

自从甲午以来，张元济就赞成改革，虽然对戊戌往事仍记忆犹新，对新形势的出现仍抱有希望，或者感觉难以置身事外。

一九〇五年底，由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要求效法日本实行宪政改革的

---

胡适《四十自述》。

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22页。

《大清德宗实录》476卷9页。

呼声日高，清廷一方面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另一方面设立了管理教育行政的新衙门——学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已改为外务部，后又设立邮传部，均为涉及新政的部门。一九〇六年初张元济被学部奏调开复原官，调往北京任职。去或不去，他有些犹豫。二月二十一日致汪康年书云：

“学部奏调函电络绎，敦促北上，此事究于前途关系至大，已允痔疾稍痊，即便就道，唯行期尚未定耳。到京之后，决不久留。如有人询及，乞代宣布。弟不欲与人争，不可不使人知我意也。”说穿了，他的意思仍是对做官无兴趣，且感觉改革诸事未可乐观。例如同的一封信中便谈到“本省学务，真不得了，既生此土，乌能无情。去岁东京学界同人，交相诘责，已允担任义务”，然而，“但恐官场盘踞已久，不能下手，则亦只可望洋而返耳”。在矛盾的心情中，张元济束装北上，此时已是他被革职出京后的第八个年头。

入京后，张元济初在学部参事厅任职。学部尚书为旗人荣庆，侍郎是原贵州学政后创办南开大学的教育家严修。在此期间，张元济为教育行政之规画共上条陈十二则，补缺拾遗，尽其心智。但似亦无大作为。不久又因外务部开办储才馆（为储备外交人才而设），被派充提调。是时外务部总管大臣为奕劻，协办大臣为瞿鸿禨，侍郎为唐绍仪。奕劻人极贪黩。瞿氏尚较正派，后终在同袁世凯的政争中下台。唐则为早期留美学童，后做过民国的首任总理，系一政客。张元济也为储才馆设立作了规划，却因与上级唐绍仪意见不合，不久即请假南归。年底回京，又于转年初再次请假，最终辞差。其致瞿鸿禨机书云：“去冬乞假南旋，实非得已”，“惟长官未尽融洽，同列复多猜疑，阻力丛生，必有颠覆之日，筹恩再四，宁可元济受畏事之诮，而不可使邪堂暨吾师有失知人之明。”大约久离官场，张元济已颇不适应，大凡革故鼎新之事权皆操于不学无术之官僚手，官僚之心本不在改革的兴利除弊，故进者自觉“阻力丛生”，唯有避退而已。清末改革之气象，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是倦于仕进？是淡于仕进？也许都有一些。也许，当官，在张元济想，真不过“炒冷饭”的滋味，虽然任命之事踵来，外务部和学部的职务好不容易辞掉，邮传部（岑春煊、陈璧先后任尚书）的任命又来，而且频催张元济赴京。对此，张元济一再辞却，原故正如在致林绍年（任度支部右侍郎）书中所谓：

然此中有万不得已者，非敢矫情绝俗也。外部积弊甚深，欲大加整顿，堂宪恐无此魄力。去春上电邸堂，疏通旧有人员，虽蒙嘉纳，而至今未能实行。储才馆调员之始，复有阻力，风声所播，罗致愈难，逆料贤者必不肯来。而来者志在利禄，所谓国家思想渺无所知。若辈在官，安能与之共事？既食其禄，又不能尽其职……明知干事无裨，而虚与委蛇，问世问心能不自疚？与其容言无补，有负列宪委任，何如及早引退，免致素餐之讥。至于邮传一席，尤不敢滥竽。部属所思均系新政，素未研究，吾信未能。业已电辞，部中亦不相强。今云师（按指岑春煊）出镇两粤，局面又一变矣。元济非敢自外知音，实自分无此才力。既出为国家任事，而又无事权，身在局中而坐视其日就败坏，无求挽救，则不如不在其位，心犹少安也。谏臣被黜，闻者不平，朝政清明，岂宜出此！为邸堂计，更不宜以此致兹请议。我公日夕相见，还望忠告善道，毋令天下士气为之短也。

---

《书札》51页。

《年谱》66页。

《年谱》69页。

信中所言“谏臣被黜”，指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黄缘奕助贿赂求官事（段芝贵以天津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奕助子]，并以十万金为奕助寿礼，遂得署黑龙江巡抚），赵反被革职。“邸堂”即庆王奕劻。由这封信可知张元济对清末朝政的看法如何了。

大约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当时不少士绅积极参与鼓吹的“立宪”运动，也抱有既赞成又不乐观的态度。赞成立宪，因而张元济参加了由郑孝胥、张春、汤寿潜领导的立宪公会。而问题在于什么人来组织立宪，如何立宪，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这里面就充满了种种问题、困难，特别是清朝权贵与士绅阶层在权力问题上的冲突。

然而进程一旦开始，似乎既无法逆转也难以拖滞。到一九〇八年前后，以上绅阶层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利益集团已得到鼓励并提高了说话的声音，各省的诸议局成立，并为推动立宪进行国会请愿。新息潮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似乎在涨破传统秩序的“格子”，而清廷许诺立宪的时间表也很难使高涨的新要求得到满足，总之，冲突使改良派走向清王朝的对立面，也促使社会在动荡中走向一九一一年危机。清末的政治风波难以细述，衍关系到张元济，似乎有着若即若离的情况。他显然既谨慎又投入不够，尽管他与积极参与立宪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孟森保持密切的关系。

一九〇八年七月至九月，张元济赴日本作观光考察，中间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同仁高梦旦等，谈到立宪之事，可为“谨慎”一说作注。他说，读报“知开设国会期限已定九年，议院法及选举法亦已宣布，皇上并于今日誓庙。在海外闻此消息，不觉欣喜，但不知其言果可恃否。报中又有钦定宪法字样，此事恐为将来祸根。然能力祸与否，究视吾民之如何自待。平心而论，九年之说诚不为迟，但求上下一心，实力准备，庶免为各国所嘲笑耳。国内舆论著何？鄙见此时国民不必再与政府抗争，姑且反求诸己，将应办之事一一举行。二三年后稍有端绪，著得机会再行争辩未为失时。未知诸公以为何如。预备立宪公会，现在定何方针？鄙见不宜随声附和，宜时时从高一层次落想，以为国民之向导。此意乞梦翁为苏蠡言之。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时事新报载上谕胪列应办各事，可否即就所举各事选定编译，次第先行试办。鄙意尤重在先编浅近诸书，层层解说，如何为议院，何为选举，每类一册（如条目过繁者即分数册亦可），排列次第……文字宜稍优美解释务宜明晰。理想切戒过高”。这封信表明张元济与潮流相比略见保守色彩，他更注意立宪改革的准备，因而从编印政法书籍、出版《法政杂志》等方面去尽一些力量。说来也仅此而已。事情的进程和变化当然大大超出他的愿望与估计，实际同时也超出了当权者与要求尽快立宪的人们的考虑范围。这种情况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以后，仍然可悲地继续着。也许，整个晚清史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都被历史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导演着无法避免的悲剧，其中没有胜利者。如果看一看民国初年政坛在所谓宪法和议会的名义下那种糟糕状况，便会觉得张元济的想法也有他的道理。

### 前进与保守（下）

一九〇八年考察日本后，张元济于一九一一年二月出发作环球游历，夙愿得偿，主要目的是调查欧美初等教育及贫民教育事宜，并考察各国出版文



化事业。他在马来亚之檳榔嶼曾会晤康有力，然后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大西洋至伦敦。在英国，他曾写信叙及对英国立宪制及教育的感想：“英行强迫教育仅二十余年，元济专考其初级教育之事，乃知仅言兴学，学固不能兴也，财政、警察、交通，无一事不相联者。未知何日吾国始能几及，为之浩叹。”在比利时，张元济参观世界博览会共七次，见“吾国会场凡五槛，居会地边隅，与法属越南及南非洲某部相比……出品……皆粗陋下等之物，零乱琐杂，无可动目……以视日本区区数商人之出品，殆不能比其什一”，不由大为感慨。

在德国也有一番观感：“在柏林约看学堂有三十处，实非他国所及，凡剃头、扫街、送信、卖肉之徒，均有特别补习学堂，就其所业而教之。”“柏林一区（在柏林之中心）学生有三万三千人，岁费一兆马克，能毋令人惊讶！至盲哑学堂之外，又有顽钝学堂、残废学堂，城市学堂之外又有山上学堂、林中学堂，真有观止之叹！”欧洲的湖光山色，城市文明以及意大利、法国的古迹、博物馆、图书馆，都给张元济以深刻的印象。渡过大西洋，又穿越美国，了解先进的书刊印刷技术工艺，考察这个国家的初等教育制度，后取道日本，与在那里的梁启超会晤，并与赴日考察的同事高梦旦会齐，一道返回上海。此次环游，时近一年。张元济此行获得大量有关教育制度之资料，脑中产生了回国后将推动教育改革的强烈愿望，譬如将建议至少在初等学校实行强迫教育制度，即义务教育制度。

这种念头，促使张元济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放弃了难与当局共事的想法，积极投入清末的教育改革活动。譬如本年六月由学部奏请设立中央教育会，派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与傅增湘任副会长，并筹备开会。七月，张元济与刘春霖（未科状元，曾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王克敏（北洋军阀时期曾任财政总长）同行到京莅会。对此，张元济在致梁启超书中解释说：“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其意亦欲集思广益，以谋教育之改良，而图行政之统一。维所拟章程未必尽是，而用心尚属可嘉。弟被命力副副会长。事关公益，不能不捭挡一行。”

中央教育会于七月十五日开幕，至八月十四日闭会，历时一个月。先生主持会议讨论提案，颇费周章，常常意见歧出以至争吵不休，终以通过“义务教育章程”、“变更初等教育方法”等案作结。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在迈向现代的教育制度改革上面走出了有意义的一步，也是清末改革中比较顺利的一次朝野合作，尽管涉及范围有限，却是建设性的。张元济当然抱有希望，希望这一趋向继续下去，使教育改良成为社会改良的基础。路还很长，而每走一步都不容易，但只要走一步，就会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清末鼎革之际，不妨作一简单的比方。假设把实现国家富强的现代化作为目标，有人认为通过一二十年的逐步改良，可以接近目标，这是渐进的改良主义者。有人则认为，那可等不及！必须使进程加速，办法只有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即通过民主革命运动来达到目标；这是革命派。另外。处于当权地位的人，则要维护其统治利益，维护原有的秩序格局，他们也承认

---

《致沈曾桐书》，《书札》8页。

《中国出洋赛会办法议》，《诗文》182页。

《复陶葆霖、高梦旦书》，《年谱》88页。

《书札》61页。

必须作出时代的妥协，接受有限度的改革，但改革也好，他们本身与现代化目标有些格格不入的素质也好，又在消解其控制国家的权威与能力。上述几种情况，不妨说，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各有各的出发点和道理。问题在于这不可能去讨论是非（因为历史是非也本非一时可以明了的），清末政治冲突的紧张已促成历史选择的紧张。由于宣统年间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暴露了虚伪性，连许多立宪改良派都丧失了对皇权的信心，革命遂迅速到来，尽管革命本身亦带有仓促的性质。

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在改革意义上不失为前进中的保守派的张元济，也不能不感到前途彷徨，随着辛亥十月武昌起义的枪声，他欲从教育改革着手的计划以及中央教育会也就终止了。在此之前的辛亥八月，张元济曾对挽救世局仍抱有希望，他上书庆工奕劻：

窃维我国采用立宪政体，无非为救亡图存起见。然三年以来，举行宪政，大都有名无实。为今日计，惟有速定方针，以为补救之策。

张元济在手折中提出行政宗旨五条及在理财、外交、民政、教育、实业、交通、司法、军备等方面宜斟酌改进的政策。有些意见是剀切言之。如说：

国家既许民以立宪，且参与政事矣。既与复拒，势必不能。国家艰危至此，就令上下一心，犹不知能否有济，若互相猜嫌，未有不败。资政院俗议局议员非无具有知识之人，亦非人人存一破坏之见，苟开诚布公，善为联络，正可借为推行新政之机。以欧美各国国民之程度，其议员政府且能利用之，我国又何独不然。既如举借外债、干路国有两事，倘彼时果能开一临时会，剀切宣布，议员之心气既平，或不至如近日各省之抵抗。且临时会可不开，而常会终不能避，此因为立宪所不可少之事乎！国民对于政府每办一事，无论当否，无不反对，其原因必有所在。若不速为疏通，窃恐上下暖离，必有不可收拾之一日。

对于时局前途，他不无预见，无奈智者之虑却只能落得“对牛弹琴”。这位奕劻无动于衷，原本就是臭名自甘的贪官，又何能有辅于清廷。清廷逊位后此人仍忙于捞钱，死后家属为其请溢于逊清小朝廷，宣统说：“是丧吾国者，何溢为？”悻悻不已地给他赐溢了一个“密”字。

虽然在后来的史书上，立宪派改良派往往是被贬低的，却也不妨注意和分辨一下，像张元济这样并无政治野心的贤者，确曾在大转变的时代扮演了建设性地批判清政府的角色，表现了为民族文明富强而努力的一种良知，尽管其主张未能在实际中得到有效的回应。

前进与保守，看来这一不无矛盾的双重姿态，大概可以用来描述历史困境中的张元济。虽然他并未处于历史舞台之中心，对于辛亥革命大抵有着矛盾的反应。一方面他并未像他的朋友纓堃孙、沈曾植、郑孝晋以至康有为那样，作清朝的保皇遗老，他参与了在危机时刻与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等人的会晤，以促成南北议和，避免局面之难以收拾。另一方面，他又拒绝应汤寿潜（浙江独立后任都督）之请求担任浙江军政府的赴鄂代表。民国的前途，在其心中仍属渺茫。这么说可能切合实际，因为张元济并无十分执著的党派立场和政治成见，从戊戌到辛亥，十几年风波，他一贯是保持着“前进中的保守”这一秉赋性格。他的基本思想，始终把现代化的文化准备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自然会怀疑一场革命能够简单地解决问题。但是指望通过改良而摆脱历史困境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他的岗位仍然是在商务印书馆，仍然在文化

---

《上庆亲王手折》，《诗文》163—164页。

严独鹤《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载《辛亥革命回忆录》82—85页。

启蒙的领域。别的事，即如在“万无可为之中”“思所以拯救”，正如他在民国元年八月致梁启超信中所慨叹的，“而今已矣”。对于“了兹多难”的现实，并不掩饰其悲观心情。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已任总统，张元济的科举同年、戊戌时代的同志熊希龄试组“名流内阁”，情出张春任实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又邀请张元济出任教育总长。张元济托赵凤昌代电决辞。他以为，腐败官僚“根深蒂固，抉摘为难”，与之相处，能有什么作为“以慰国民之望”呢？

### 小世界与大世界

例览《张元济年谱儿》可以发现在一九一二以后几年的记载中，张元济的社会活动明显减少了，而关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业务和访寻古籍的事情占了大多数。此时，张元济已任编译所所长多年，并从一九一七年起当选董事。同时也可以注意到，清季十年，张元济除了出国考察，数度南北奔波，却始终不离馆职，不离文化人的本份。这大概可说是他事业的重心、自己的园地。当对外部世界的参与变得难有作为时，商务印书馆却一直是实践其素志的好地方。

前面曾说过商务印书馆早期的成长。再看其清末十年的滚动发展，似乎不仅得力于适时而起及经营有术，更重要的机制则是其经济策略与立脚不低的文化性导向及素质的结合，企业同事业二者的配合，可说是成功之道。单纯的商人或单纯的书生，恐怕都难以济事。由此，董仲舒那个老说法——“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就未必合适了。也正因此，在商务内部，张元济被视为摹画出版方针和人文体制的灵魂性人物，而在外界看来，他又像个实业家。或者也可说是亦儒亦商罢。

以夏瑞芳与张元济联袂合作为主，商务将编译、印刷、发行作三位一体的结合，从一九一三年起业务起飞。粗粗看来，中国最早的广泛发行的教科书、字典，为商务奠定成功的基础，同时不可不看到资金投入和技术工艺水平的因素，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商务创立时资本为不足四千元，到一九一二年年初张元济等人加入时，资本为五万元，而到一九一三年，资本已增至二十万元。这种增长显然有特别的因素。《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一九一三年十月，“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吸收日资，改进印刷。”最初吸收的日资为十万元，商务在一九一四年前实际上是一家中外合股合办的公司，合作者为金港堂——日本一家历史悠久的出版公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高涨，这一事实确曾有讳言的情况，尤其在尔后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但这无疑需要分别看待。在一九一四年商务赎回股权之前的十年间，合资合作乃是事实，而且这种民间商业性的合作对于商务的发展十分必要，因此是不必当丑事来隐瞒的。相反，这个范例颇有启发性：不采取变通的引进的办法，幼稚的现代中国出版业就难以在装备、技术、管理上迅速成长。

高凤池说：“当时本馆鉴于中国的印刷技术非常幼稚，本馆虽说是初具规模，但是所有印刷能力，只是凸版，相差很远，万难与日人敌对竞争。权宜轻重，只有暂时利用合作的方法，慢慢的再求本身发展，可以独立。……”

---

《书札》61页。

《致熊希龄》，《书札》63页。

日方出资十万，并聘请日本教师襄助印务。我们方面有二个主要条件：一是经理及董事长都是中国人，只举日人一人作为监察人。二是聘用的日人随时可以辞退。”

双方合作的条件显然对商务有利，这其中的奥妙恐怕在于，金港堂在日本正因卷入一桩“教科书丑闻”而失去光彩。譬如后来曾帮助张元济编撰教科书的长尾帧太郎、小谷重皆因受贿和行贿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金港堂老板原亮三郎也许认为应该对他们给予安排，而安排到商务恰好合适，所以双方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回报。而这种合作的效果，确实体现在印刷工艺水平的提高全新地改进了出版物。

以合资合作形式发展商务，也符合张元济最初进入商务的目标：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而努力亦须落实于增强商务这种民营企业的实力。尽管张元济很缺乏商人气，但他在编译所长任内，仍关注着公司的经营，因而同公司的日方股东原亮、山本等常有书信往来，备为顾问。譬如当一九一一年夏瑞芳借公司款十万金作股票投机失败受损时，张元济曾与日方股东积极筹画挽救办法，并建议改进公司办事章程组织，“须更改章程，划清董事及经理权限，订立管理银钱出入规则。”

稳健而系统的发展，令张元济乐于看到清季十年中，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事业园地已具备兴旺气象。至一九一二年度，商务已拥有各种制版工艺技术，在各地设分馆或支馆二十余处，编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图书汇报》、《少年杂志》、《政法杂志》等多种期刊，还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涵芬楼”，盖了大楼，附设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师范讲习社以及幼儿园，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许多具有文化事业性质的长远措施，都是在张元济主持下进行的。

与资金、技术的引进同样重要的是人才的引进。张元济曾自述：“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子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吹箫引凤，商务的人才可谓荟革一堂。高梦旦曾作过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和留日学生监督，入馆后，张元济之于高仍倚之若左右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公献可替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彼时尚有不少学者时贤入馆任事，如编辑教科书的庄前、夏曾佑，主编《绣像小说》的作家李伯元，主编《东方杂志》的徐珂、孟森、仕亚泉。徐珂为张元济乡试同年，编过《清稗类钞》，孟森为明清史专家，杜亚泉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人物，为商务编著《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等巨帙。此外还有英文学者邮富的，辞典专家陆尔奎，主编《少年杂志》的孙毓修，主编《小说月报》的挥铁樵，编《教育杂志》的陆费逵等。由此可以看出阵容不凡以及张元济吸引和任用人才的心胸眼光。这个刊、世界”里，好像没有狭隘、封闭的气氛，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倒是显出与“大世界”、“大时代”的相通。书，便是相通的渠道。

---

《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8页。

《年谱》103页。

《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诗文》282页。

蒋维乔《高公梦旦传》。

## 第五章 出版家

### 挑战与机遇

一九一二年，张元济四十五岁已过。前面说过，他作为一个渐进的改良主义者参与社会活动，可能已告终结，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感觉，既然认为“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对于辛亥之革命，显然中怀隐忧。而此时民国已经成立，作为一个出版事业家，则不能不适应于现实，专心致志于公司之事。

现存张元济日记第一本，系记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至年底事，内容大多为编译所事务，而且颇为琐细，譬如稿本的选择，购金多少，印行一本书的成本估算，用纸多少，张元济对于事务，往往专心细致。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走，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这种情形，颇能说明张元济的为人与敬业精神，也说明主持人的勤谨作风有助于商务的成功管理。

不过，商务印书馆之大发展在清末十年，十年间确定其在出版业之牢固地位已不易摇动。而自民国时期到来，情况却已有了变化。先是经理夏瑞芳因作股票投机而蚀空一大笔资金，赖张元济等同仁勉力救持，危机得以渡过。继而挑战又来自同业的竞争加剧了。

以教科书出版为例，原来最先出版教科书的是文明书局，商务所编后来居上。特别是，“商务印书馆自丁未宝山路新厂落成，对于印刷努力进行，铅印、石印、雕刻等均独步一时。文明书局因资本小，逐渐退步。集成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复失败，各小书局之印刷机械，不如商务一家之精且多。”

说这话的陆费逵，对商务的教科书质量似乎有所批评。他本是商务的人员，后来拉出来单干，亦是先从教科书业务的竞争上入手。因为此人也是颇有出版家眼光的。陆费逵创立的出版社即是一九一二年随中华民国诞生而诞生的中华书局。

话说民国成立，讲革命，讲共和，成为舆论风气，原来商务所编教科书的内容未免有些已显得不合时宜。这时便有人劝张元济注意，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蒋维乔说：“菊生（按指张元济）向来精明强干，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首。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而伯鸿（按指陆费逵）却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秘密组织书局。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商务措手不及，其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者，遂被一律打倒。伯鸿亦脱离商务，一跃而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商务则亡羊补牢，汲汲将各书修改，时逾半载，方能勉强出版，而上风已为中华所占，最为难者是高梦旦，不能见谅于商务；日发起人，竟有人背后低为奸细者，唯菊主深知梦旦，倚界如初。”这情况确有戏剧性。戏剧性即源于以中华书局挑战于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同商务有）段恩怨因缘。这一恩怨使张元济的同事高梦旦最觉尴尬。据上引蒋维乔一文所云：“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屡与文明书局

---

《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10页。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国出版史料》补编277页。

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8页。

代表陆费怕鸿见面，谈论之下，大奇其才。盖经营书业者，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分，互相联系，然能发行者未必知印刷，能印刷者未必知发行，能编辑者更不知发行与印刷。唯陆氏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于菊生，以为如此人才，‘文明’竟不能识，屈居普通职员，商务应罗致之。于是以重金聘力出版部主任。梦旦欲坚其心，又以姪女妻之。”

陆费逵既是能人于才，且野心勃勃，一旦看准时机，另立旗帜，侵夺商务的势力，对商务的冲击不算小，恐怕还不仅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由此遂演化出尔后多年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分庭抗礼之竞争局面，譬如商务既有“最新教科书”，中华乃推出“中华教科书”，分其秋色；商务继而攻出“共和国教科书”，中华又出“新式教科书”；商务再复出个奎用教科书”。商务有《辞源》，中华则出《辞海入》；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则出《四部备要》；不一而足。

在竞争中，商务及张元济的反应是平静而积极的。关于竞争并没有留下太多记载，事实是新教科书很快就修订完成并在一九一二年出版了，市场虽被史华占领一部分，但商务仍保持了主要地位。庄俞说：“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隼路蓝缕，煞费苦心。”参与编事的包天笑（名公毅）口忆他那时进入商务的情况：“张菊老出见，长袍马褂，风采不减当年，就是同我一样，脑后少了一条辫子了。先谈谈金粟斋的旧事，旋同时报馆的近状，然后谈到了正文。他说：‘我们出版的小学国文教科书，年年改版，现在革命以后，又要重编了，要情阁下来担任其事。’我说：‘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恐怕才力不及。’他说：“看过你写的教育小说，深知你能体察儿童心理，必能胜任愉快。’又加上我几顶高帽子，我算是答应了。”张元济在延揽人才上，总予人通达的印象。大概正因商务有此好传统，社会上不少文教精英都成为商务的编辑和作者，譬如后来参加编辑白话文体的“新孕制教科书”的，就有不少学者，如叶圣陶、顾颉刚、张其勋、胡适、周予同、吕恩勉、刘海粟、刘文典、陈衡哲、萧友梅等。至于通过杂志、出版新书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更为广泛。商务的作者队伍中包括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伍光建、林琴南、丁文江等杰出人士。

书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对于商务未始不是好事。总的看，二十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社会的蜕变期，也是经济统制相对松弛，民族工商业由胚胎而渐为生长的时期，正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商务的核心人物夏瑞芳、张元济、鲍咸昌等都曾赴国外考察，技术骨干如鲍庆林、郁厚培等曾在外留学。因此商务较少因循保守之习气。在资金、管理、组织结构、印刷技术和发行系统上急追现代化潮流。尽管竞争使商务的教科书市场有所缩小，但却使商务确保其在其它方面的优势。出版的书籍，据统计，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一年期间猛增至二六五七种七八七册，其中如字典工具书、地图、数学参考书、翻译文史哲著作、古籍、杂志，其影响力和效益之优，国内仍首推商务。据书业营业额的粗略统计，民国初年约一千万元，商务印书馆占十分之三至四，中

---

《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64页。

《钏影楼回忆录》390页。

《商务五十年》附表，1950年版。

华书局占十分之一至二。此外，商务在张元济主持下，对社会文化公益事业亦多有投入，已不仅限于生意经的范围。

中华书局咄咄逼人的竞争，还促使商务对自身的资本股份进行调整，因为中华的竞争手段之一，即是就商务的日本方面股份做文章。它多次在报纸上做广告，呼吁人们注意“中国人应使用中国人的教科书”，以及商务在资金和教科书方面同日本人合作的事实。这自然使商务感觉难堪。考虑到当时国内民族情绪和反帝情绪的高涨，商务必须认真应付这一问题。

一九一三年，商务的资本已由早期日商金港堂加入时的二十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早期中日双方股份为一比一，到一九〇五年数次增资扩股，逐渐规定供“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和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认购，这样，中方股份的比例便增大了。此时便由夏瑞芳亲自赴日谈判，争取收回日股。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协商，日本股东同意退出，在一九一四年一月签订退股协议，退还日方股金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万元，升值百分之三十三，作为账面资产估值低于实际的补贴，计共多付十二万四千元，至此，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全华商”。

按说，从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非议商务的中日合资，并不正确。但商务领导人虽无狭隘观念，却不得不及时顺应潮流，好在它已略具实力，可以不必再“借鸡生蛋”了。杨杏佛氏说过：“有人以该馆曾用日资为病，不知中日合办之实业甚多，能如该馆之出淤泥而不染，率收口自办者，何可多得。此正该馆之不可及之处也。”

应该说，作为初见发达的民办企业。缺少政治后盾，商务的发展亦颇有风险，尤其在社会失去稳定的民国初年，树大招风，任何可能的政治或经济仇怨，都对商务负责人会构成人身威胁。一九一四年初，张元济险遭不测之灾。当时他为收购古籍，在寓所大门上挂出“收买旧书”的招牌。一日，有人上门留书一包，张元济因忙于出门未及打开观看。后书估又来将书包取回，此人回去后炸弹突然爆炸，当场殒命。不几天后，傍晚时分，张元济与夏瑞芳忙完公事，自棋盘街商务发行所下楼，准备回家。张有事重回楼上，夏瑞芳行将登车，忽有一刺客向夏开枪，夏当即倒地，送医院后不治去世。凶手被抓获，经租界会审公堂审问，背景复杂。凶犯虽被枪决，但商务亦不敢追究其背景。估计夏之被刺原因，同夏作为书业公会会长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都督陈其美驻兵闸北有关。那时暗杀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夏瑞芳的去世，对商务是一大损失，从而也使张元济的工作更多地转向商务的管理方面，成为总揽商务全局的关键人物。夏瑞芳去世后，印有模任总经理，时间不长就病故了，从一九一六年四月起，由高凤池任总经理人张元济改任负责实际工作的经理一职，编译所长便交卸给高梦旦。

### 涵芬楼内外

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将张元济归入“实业家”一类，不能说没有道理，商务印书馆当属实业，张元济在民国初年即主持商务，自然是致力于实业了。不过，更确切他说，张元济还不是一般的实业家，他所致力之实业乃

---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国出版史料补编》279页。

长洲《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654页。

《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载《最近之五十年》1922年。

出版业，乃是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的实业。“义”和“利”，的分别在他那儿不妨统一，讲“义”，就是于“利”的追求之中亦寓含工作的社会文化服务性质。二者相辅相成，这毋宁说正是张元济的使命，正是他在近现代史上的独特意义。所以《现代名人小传》评张元济语失之偏颇，如说他“所编书强半急就，罅漏百出”，又说他于“中学仅涉藩篱，罕有述作”，显然并非事实。

譬如商务一九一二年出版了《新字典》，张元济参与编写和审订。蔡元培曾评价说：“近世我国所习用者，有《康熙字典》，……其书行世已二百余年，未加增改，不特科学界新出之字，概未收入，即市井通用者，亦间或不具。其释义则直录古代字书，而不必适周于世用仍诉合乎学理。且往昔文字之用，每喜沿袭成语，厕正名百物，初不及甚解，故全书不附一图。是皆其缺点之最大者。商务印书馆诸君有鉴于此，爰有《新字典》之编辑，五年而书成，适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岁。于是重加订正，以求适用于民国，……于吾前举《康熙字典》诸缺点，既皆矫正。”商务版书籍讲究质量和科学性，此为一例。工具书的编纂尤需严谨，虽不能尽善尽美，当不至“罅漏百出”。

说到学术，特别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文献之学，亦即所谓“中学”（与西学相对而言），“旧学”（与新学相对而言），张元济由于忙干事务，不可能多有著述，但说他“仅涉藩篱、实在不免轻视了他在版本、校勘等方面的努力和造诣。事实上，张元济对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贡献，具有无可低估的学术意义，与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正因此；本非学术专门家的张元济，后来在一九四八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据考，从民国初年开始，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即着手较系统地出版善本古籍。这在商务历史上算一个显著变化，因为原先商务的主业是在教科书与工具书等方面，而且一般新式出版业部还未及插手古籍出版，商务且着先鞭，也意味在学术文化的领域，既重视西学、新学一又不忽略中学、旧学，把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张元济所起的作用是很关键的。若无张元济以之力量作实际的倡导，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古典文献的保存、整理、出版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整理出版善本古籍的意义虽然不小，但最初目的并不明确，计划也是逐渐才形成才排上日程的。张元济曾道其因缘，回溯到初任馆任编译事时，需要参考书籍，来保证编书的质量，所谓“辄恩有所检阅”，而“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刻，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有自者。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之书将散，徐氏故子民居停主人，乞其介归吾馆，旋以数十椟至。书固不恶，然所需者犹未备也”。

由蔡元培介绍而收得徐友兰熔经铸史斋藏书，时间约在一九一九年商务建立涵芬楼图书馆之前，而张元济收书努力至少始自一九一三年。他主要收书不为个人，这也是同以往藏书家不同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尽力搜罗散

---

《新字典·序》，见《商务印书馆大事记》1987年。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涵芬楼烬余书景序》，《诗文》282页。



出各家藏书，亦渐以藏书家和版本学家著称。一九一六年春，号称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归安陆氏丽宋楼，有鬻出之谋，是在其主人陆心源歿十三年后子孙不守。丽宋楼据说以拥有二百种朱版珍籍名重书苑，稀世之宝一旦出售，或可能流亡散伏有不虞之厄，为文化的大损失，所以很引起世人关注。当时商务印书馆已谋求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夏瑞芳知道了丽宋楼求售的消息，便拿着丽宋楼藏书钞目去同张元济商量，意图购进，张元济当然很赞成。出价的情况是：“公司是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然因售者要价甚高，事竟未成。一九一七年夏，丽宋楼藏书终以十万元之约被日本人购去，中土宝贵文献舶载而东，归入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此番落魄情状，使海内士人无不疾首痛心。董康曾说：

按陆氏《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终云之烬，魂魄长留故乡者。为太息者累月。……近年日本学者，研究历史，覃思冥索，进步可骇。兹复骤增秘籍，单词只义，孤证是求，温古知新，必能为史学别开一途径，而吾国浅躁之士，方且藉新学之名，以便其不学之实。拙塞者视书之存亡，淡如漠然，无与于己。其猖狂恣肆者，直欲投书一炬而后快。闻丽宋楼书既至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彼此相较，同异如此。世有贾生，能无痛哭！

董氏所谓“台城之炬”、“绎云之烬”均指使古籍遭厄的火灾，前者指朝廷大内的火灾，例如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毁去《永乐大典》正本。后者指江南大藏书家钱谦益的绛云楼在顺治七年的一场大火中成为灰烬。但丽宋楼的流亡海外，在许多人看来，比水火之患还觉痛心，这中间包含对民族文化衰落命运的悲伤与忧虑，似在时代变换期格外突出，古籍的命运尤有象征意义。文物与文献大量耻辱般地由母邦流出国外，引起了广泛而效果有限的呼吁，混乱年代的政府和权贵似不肯顾及此事。张元济有感于此，势不能不投入抢救和护持文化遗产的努力之中。他曾说：

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一方面是性情，即爱书藏书传播书，成了生活的内容与趣味；另一方面又是责任，认定保存书即是避免划灭文明，是文化托命之所在。这二者，使张元济成为著名的藏书家与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所以他曾自道：

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因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余尝言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

收买丽宋楼的失败以及珍本的外流，可能刺激了张元济与商务收书典藏建立图书馆的计划加紧进行。其致纓荃孙函云：“来书慨然于旧书之将绝，此亦时会使然，要在有一二先觉者出为转移，自有挽回风气之日。承示图书馆宜多备通行书，甚是甚是。但难得之旧本，若无公家为之保存，将来终归渐灭。丙午春间，丽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指荣庆）拨款购入，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

---

董康《丽宋楼藏书源流考·跋》，《国粹学报》第八期。

《致傅增湘》，见《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26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宝礼堂宋本书录序》，《诗文》280页。

一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的收书之愿、积书之志，在清末数年间渐次付诸实行。到一九一九年因已有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五十余橱书人藏，遂建立商务自己的善本书室——涵芬楼，后于一九二六年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

自有涵芬楼成立，张元济保存善本旧籍之事业心日笃，除委托孙毓修管理图书馆事务，还躬自访书于京沪晋鲁诸地书肆。如其一九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致孙毓修书云：“弟此行拟由泰安经邹县、峰县、沂州府、郑县入江苏境，至海州乘舟至淮安，循运河南下。拟向图书馆再假沿途志书，……沿途尚拟收买旧书，馆中书籍有残缺待补者，可否开一清单，一并交下。”当海内私家藏书已陷于颓委不振，涵芬楼崛起于清末民初，可谓壮举。到一九三二年遭战火之前。经勤于搜求，涵芬楼善本已具五万册。其中先后收有吴县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闻斋”、宗室盛昱之“意园”、丰顺丁日昌之“持静斋”、溧阳端方之“宝华淹”、江阳纓堃孙之“艺风堂”、巴陵方功惠之“碧琳琅馆”、南海孔广陶之“三十三万卷楼”、乌程蒋氏“密韵楼”、扬州何氏之“悔余庵”以及荆州田氏、海宁孙氏等诸家散出珍本旧籍。富甲一方，称盛于时。据粗略统计，涵芬楼曾藏有宋本一百二十九种，元本一百七十九种，稿本七十一一种，抄本四百六十种，名人批校本二百八十八种，所藏宋元善本之多，超过了号称“百宋一廛”的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其中尤珍贵者有宋刊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配合之南华真经等。这些善本久历沧桑，分别经过许多著名藏书家之手，如鄞县范氏“天一阁”、昆山徐氏“传是楼”、常熟毛氏“汲古阁”、常熟钱氏“述古堂”、昭文张氏“爱日精庐”、秀水朱氏“曝书亭”、歙县鲍氏“知不足斋”、吴县黄氏“士礼居”、长洲汪氏“艺芸书舍”等，遗泽不绝，至可宝贵。在张元济的倡导下，涵芬楼收藏地方志，亦颇为专注，数量丰富至达二千六百余种。张氏自谓：“民国之始，余锐意收集全国方志，初每册值小银钱一角，后有腾至什佰者。此虽不在善本之列。然积至二千六百余种凡二万五千六百册，亦非易之。”

说“非易”，可以想见聚书之个中艰辛苦乐，尤其在晚清以来传统藏书事业走下坡路的情况中，涵芬楼之创立和发展，也不免惨淡经营，伸使斯文不至扫地。当时海内藏书名邨，北方聊城之“海源陶”遭兵匪之毁，“韶宋楼”浮沉异国，钱塘丁氏之“八千卷楼”售与江南图书馆，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决然犹存。张元济对古籍善本的保存有着不同寻常的关心，其与傅增湘往来书札几乎全为这方面事情的讨论。涵芬楼之起于沪上，一借商务的财力，二靠张元济的热心擘画。而它的存在意义又超出藏书本身之保存，更在于成为公共图书馆，使无力藏书的读者受益，同时，为商务出版古籍奠定了高质量版本的基础。

涵芬楼藏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是极为宝贵的。版本目录学者赵万皇曾追述：“涵芬楼要算当时江南唯一的大藏书库，方面之广，质量之多，无论宋元旧槧、明清旧钞，足足塞满了二三十个

---

《书札》1页。

《年谱》82页。

《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诗文》284页。

大木柜子。虽然其中名贵的，已经盛了几十个大衣箱运到租界里金城银行年库避风火去了，剩下的一部分，据我看来，还是值得羡慕。”他在张元济招待下参观了两天，记录若干有关明季史料的书目。他又说：“除极少数外，无一非绝无仅有的秘复，……除了史部各书，最引人注意者，尚有类书类，明人吴统所编蓝格抄本《三才广记》一书，共存四百九十六卷，八十三册，原书卷数达一千一百八十四卷，卷数比《太平御览》还多。在涵芬楼只有三分之一，现在天一阁者，尚有百册左右，合起来虽不完全，实已过全书之半。自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经过日本飞机队巡礼以后，一律化为灰烬。除了我日记簿上一些痕迹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如其所述，涵芬楼同东方图书馆一道可悲地毁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日本侵略的战火中。清初诗人吴梅村曾有《汲古阁歌》，咏藏书家事，中有句云：“当时海内多风尘，石经马矢高丘陵，已坏书囊缚作裤，复惊木册摧为薪。君家高阁编无恙，主人留宿倾家酿，醉来烧烛夜摊书，双眼摩挲觉神王。古人读书借三馆，羨君自致五千卷，又云献书辄拜官，羨君带索躬耕田。……读书到死苦不足，小学雕虫置废麓，君今万卷尽刊讹，邢家小儿徒碌碌。客来诗酒话生平，家近湖山拥百城，不数当年清闷阁，乱离踪迹似云林。”古来藏书家的得失、苦乐、兴衰每令人感慨，涵芬楼与明末清初兴盛一时的汲古阁一样，既重藏书又重刊刻，本来以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可以长保于东南，何期战祸突来，火于一旦，竟不如当年的汲古阁，百年之后散归江湖。这是涵芬楼的经营主持者张元济一生最为不幸的一件事了。

张元济之爱书，往往同其爱家爱乡的感情相联系。他的祖上原有“涉园藏书”，九世祖张惟赤、六世祖张宗松皆曾以藏书之富名于时，在清道光后家道中落。书板沦佚。张元济中年之后努力收回先人旧藏，恢复“涉园”，日积月累，竟也逐渐收回了五十二部之多，包括辗转落入于右任手中再售出的荀于、庄于两部宋刊本。此外他还搜罗家乡海盐及嘉兴府地方文献不少，后全部捐入合众图书馆，该馆曾编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

张元济藏书爱书，既为商务经营涵芬楼，又有自己的“涉园”，但公私之分，他始终不曾混淆。这可举一部《宋诗钞初集》为例说明他的态度：当初他为涵芬楼购人第一批徐氏熔经铸史斋藏书时，便已发现其中有这部曾经涉园先祖旧藏的书在内，上面还有他六世祖不少的手泽，张元济当然极渴望收回，但因其书属商务公有而罢，事隔多年之后，他偶然在书肆中又发现一部同样的书，而且还是自前一部抄录的，当即买下，并向商务同人商换其先祖旧藏，这件事始于公私分明而终于情理兼顾，也算得上书林的善缘佳话了。

### “藏书不如刻书”

甫至民国初年，明清以来曾十分兴盛的私人藏书传统渐渐难以接续，将被各地建立的图书馆所取代。涵芬楼的建立正处于此一过渡期。同时，它又既不仅仅是商务所建东方图书馆的一部分，也不似一些有钱的官员藏书多为附庸风雅，它还不同于学者之藏书往往秘而不肯示人，张元济为商务收集古

---

《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大公报》1934年2月3日《图书副刊》。

《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四。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5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籍的目的，主要是在于为编书作参考，为系统地出版、流通古籍作准备。藏书乃是为了刻书。这正如藏书家张海鹏所云：“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者，其道不更广耶？”当然，张元济创议出版古籍，对商务印书馆来说，既可以发挥其印刷技术的优势，又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

张元济发起出版古籍，是从选印《涵芬楼秘笈》开始的，时在一九一六年。由于既要购集善本古籍又要鉴别审定和计划刊行，他便找了一位助手来协助工作，助手便是精于版本目录之学的孙毓修。孙是一九一一年进馆的，先是从事童话的编译，后被张元济请来致力于《涵芬楼秘笈》的出版。《涵芬楼秘笈》仿用鲍廷博刊《知不足斋丛书》之例，分集陆续出版，每一集为线装本八册，包含古籍若干种。印刷方法大多为原书或原稿之影印，亦有小部分用铅字排印，大多以涵芬楼藏书为底本来源，所收各书由孙毓修或张元济写有跋文。第一集是一九一六年九月出版的，收有《忠传》、《续墨客挥犀》、《复斋日记》、《识小录》四种旧籍。“缘起”谓：“纸墨装潢，力求精善，使爱古者不至薄今，垂绝者赖以续命。”以后每年出版两集，至一九二一年四月出版了第十集，共收书五十一种，印成八十册。这是商务有功于古籍保存的一个较大工程。

不过，《涵芬楼秘笈》的选目，限于本身所藏珍本的范围，不能充分反映传统学术的主要面目，因而其学术文献的意义便很有限。实际上在《涵芬楼秘笈》及《说部丛书》出版前后，张元济便已在考虑和计划搞一更大规模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丛书。此即《四部丛刊》，而原拟定名《四部举要》。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九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云：“再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举要，第一集种类业已选出，约在一万卷以上，拟分三次出书，全部约定价二百元，亦分三期缴楚。欲零买者则照各部定价，贵亦不逾三分之一。兹将目录附呈，伏祈代为察核，如有应增应减者，并求指示。但有所增，必有所减，因格子售价也。敝处藏本尚不敷用，将来尚拟就邮架借影。所缺书名已用朱笔标出，如所选之本有未善者，亦乞代为改定。”印制工作实际于一九一九年底开始，几年间，张元济在忙于馆务时，一直在为《四部丛刊》的选目、选底本、借影、工程预估、印刷办法做准备。编印《四部丛刊》和《道藏》这种大型的综合性丛书，反映了张元济对中国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的重视，也反映他不局限于藏书和版本研究的个人兴趣，而决心利用现代印刷技术使古籍善本得以保存、传播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空言。《四部丛刊》之印行，可以解决“求书难”、“流行版本差，两个问题。此举之兴，张元济有“七善说”：

汇刻群书，防于南宋，后世垣之，顾其所收，类多小种，足备专门之流览，而非常人所必需。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

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无所不包，诚为鸿博；而所收古书，悉经剪裁。此则仍存原本，其善二矣。

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槧，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其善三矣。

---

黄廷鑑《第六弦溪文钞》卷四，《朝议大夫张君行状》。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64页。

求书者纵胸有晁陈之学，冥心搜访；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时。此则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其善四矣。

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皮藏，字大则能悦目，其善五矣。

镂刻之本，时有后先，往往大小不齐，缥緜异色，以此括架，殊伤美观，此则版型纸色，黼若画一，列之清斋，实为美雅，其善六矣。

夫书贵流通，流通之机，在于廉价。此书搜罗宏富、计卷逾万，而议价不特视今时旧笈廉至倍丧，亦较市上新版亦减至再三，复行预约之法，分期交付，既可出书迅速，使读者先睹为快，亦复分年纳价，使购者置重若轻，其善七矣。”

对于印行大型古籍丛书而言，上述考虑确不失为最适当可行的安排。而谋其事主其政者亦非张元济不可。由于张元济本身即为版本与印刷的内行人，又与海内公私藏书家交往密切，信誉诚孚，足以歆动各公私藏家出其所储，敷应选目。果然，经张元济号召后，学界版本目录名流纷纷响应，并联名发布通启，各出珍藏。其中有沈曾植、严修、张謇、董康、罗振玉、叶德辉、徐乃昌、张一麐、傅增湘、邓邦述、陶湘、蒋汝藻、刘承幹、郑孝胥、叶景葵、夏敬观等。仍有不足时，张元济又与南京的江南图书馆相商（因其拥有清季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全部善本藏书），派孙疏修驻江南图书馆查索可采用之善本，并商借影印。《四部丛刊》的印制自一九一九年底开始，计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为明清精刻，共收书三百二十三种，用六开线装本印成二千一百册，四年杀青，于一九二二年底出版。并刊行了《四部丛刊书录》。

用张元济的话说，当时正是“神州多故，国学寝微之日”，印行那么大型的一套丛书，成本浩大，风险不小，且无前例，非有大气魄和坚强毅力是不敢尝试的。而且这件事情怎样办，商务印书馆内部也颇有一番争论，据茅盾回忆：“当权者工影印。这一派可称为‘善本派’，也有人讥讽地称之为‘制造假古董者’。另一派主张注重实用，例如《庄子》，便应该采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或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墨子》就应该采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等等。这是实用派。据说两派争论了五六个月，最后还是‘善本派’得胜。”争论中显然是张元济的态度占了上风，因为他同一些学者一样早就意识到，提供一种更可靠更符合原来面目的版本，具有长远重要的意义。是否是“制造假古董”，似不值一辩，因为就学术价值而言，早期刻本，钞本的价值是显著的，影印好的版本，可以校正后世版刻之删削、残缺、讹误、校勘不精等弊端。譬如不少学者都知道，“明万历以后，刻书者率校勘不精，讹文误字，比比而是。又好以意改书，甚至改换书名，变乱旧章，致使后人发‘明人刻书而书亡’之叹。倘无旧本，正其讹误，则故书之真象多失，本来之面目罕存。如水经注一书，今传明以来刻本，谬误滋多。戴东原以永乐大典本校之，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除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而后始稍稍可读。”有鉴于此，张元济力主影印善本，正是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而非做意以古董为标榜的，

---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例》。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71页，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

这一点，后来鲁迅也有能说明问题的议论，他说：“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指纂修《四库全书》时的抽毁、篡改）。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对于研究历史来说，影印善本可见如何必要。虽然《四部丛刊》的印行，被一些人认为是寒士买不起。只不过给有钱的人家做摆设，它还是极有助于善本古籍的保存与流通，成为学者可容易得到的参考书。这种学术价值是不能仅从商业角度去考虑的。

为出版《四部丛刊》，张元济付出了大量精力。他为此必须亲自动手选择版本，为了确定和比较每一版本的优点和可靠性，不得不仔细阅读细节、注意前后序跋、研究避讳（这是确定书籍年代的最好方法），注意刻工姓名、卷帙编次版式、纸墨质量和字迹、刀法，都属于极细致的准备，亟需严谨朴实。在照相排版和修整照片以及校对的紧张工作过程中，张元济亦须总其责，做最后的把关。这也可见其作风勤谨之一斑。

自有《四部丛刊》，中国出版业逐渐推行了影印的办法。此创举之外，张元济还提倡印古书使用国产纸。“《四部丛刊》初编用纸分手工连史纸和手工毛边纸两种，筹印时估计到上海市上供应不足，曾先后几次派人到福建光泽县的司前和江西铅山县的陈坊地区坐庄采办。当时销路困难的内地手工造纸业借此获得转机，纸价随之上涨。馆内曾有人说：‘《三都赋》成，洛阳纸贵；《四部丛刊》出版，闽赣纸价飞涨。’前人储藏线装书，常利用书根缮写书名册次以便查阅，《四部丛刊》初编发行时，可以代印书根，也算是近代印刷技术上的一个新发明。初编开始预约时，张先生每天必到定书柜询问当天销数，从不间断。对于包装，邮寄也随时检查，极为细致认真。”

从民国初年到二十年代，由于张元济的推动和组织，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古籍上颇为用力。《四部丛刊》之后又陆续辑印《续古逸丛书》、《续藏经》、《道藏》、《学海类编》、《学津讨源》等大型丛书，直到已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思想文化革命方兴，给予传统文化不小的冲击时代，此一看来是“维护国粹”的工作仍然保有持续的势头。这似乎表明张元济的文化态度已趋于保守或者说与时代不合谐。当然，可以肯定，张元济的思想性格一贯不是偏激的，他也不惯于趋时或投机，他的意识形成的背景完全不同于较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鲁迅。他的思想不妨也是新的，肯于接受新事物的，但这些不曾能割断其人生与历史传统的联系，或者说由于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张元济的理性和情感也包括他的生活现实，并未产生新旧意识尖锐冲突和绝对的选择。一九一六年他曾以《新国家当以旧道德相维持》为题赴民立中学演讲，即是一例。总之，他不是从“传统”与“反传统”截然对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而既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视本国文化若敝屣，也不力主守旧，对外来文化或新文化不屑一顾。基于此一思想取向，商务既大力印行有关新知识新思想的书籍，亦不废兼重古籍的方针。如果平心静气地考虑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斗争可以不必被激进反传统的导向牵着走，张元济的实践也未尝不有其建设和值得反省的意义。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曾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开创出一个好传统，身在出版业的张元济

---

《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卷6，182页。

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23页。

与蔡元培有许多共同点。

### 革新与进退

从历史转变的角度去看，倒了民元初期，中国的变化不可谓不大。皇帝是没有了，但共和啦，宪政啦，闹得乱糟糟，总不成个样子。篡了权的袁世凯原是意在独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久果然就演出了一场帝制的“洪宪”闹剧。然而一片声讨中，袁世凯死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又继之而来。中国自晚清以来就在呼唤的现代化正是步履艰难，遥望渺茫。

虽然混乱的时代环境阻碍了国家现代化的变革进程，但是在小的范围内，也还有现代化较为成功的例子。这当然是极个别的情况，如商务印书馆在变革中的生存和发展，商务作为一个较成功的事业型企业，同它的主持者张元济的努力分不开的。显然，张元济的经历表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社会关系资源和政治参与经历的知识分子，他比较彻底地从历史舞台和思潮变动的中心退出来，去从事一种具体的实践、有限的工作。如果说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都不免会有一种患得患失的“自我中心”感的话，张元济却想得很少也说得很少，大概他会认为，重要的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可能做到的事情。或者这本是一种无可亲何的现实主义。自然这并非等于随波逐流，我们毋宁确信，那也是一种进境，其意义即在于他的实践比空讲道理还是有效，虽然远不成“治国平天下”那般伟大。

一九一五年前后几年，是已经颇具规模的商务印书馆在发展中面临困难的年头。困难既包括外来的竞争，也体现在其内部机构的运行是否具有现代化的效率，能否成功地避免经营失败的危险。这种危险并非不需警戒，譬如一九一七年中华书局便曾因资金周转危机，几乎不得不被兼并。

在一九一四年夏瑞芳遇刺逝世之前，夏是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其人因是商务的主要创办者，不乏威望与能力。张元济做编译所长，主掌编书刊一摊，两人的合作，被公认为奠定商务的基础。夏瑞芳突然遇害，张元济失去了一位知己和可以信赖的合作者。同时公司管理上的矛盾也便逐渐突出了，张元济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去应付公司内部的人事关系。

夏瑞芳死后，先是印有模（商务的大股东、闸北纱厂的老板）任总经理。一九一五年印氏去世，其职由高凤池代理。高凤池为早期商务的四位创办人之一，资格老，却少创见和能力。由于他也是基督教徒，便代表着商务内部所谓“教会派”。这一派以印刷技术起家，彼此大都有亲戚关系，在商务内部颇有根抵。相形之下，张元济及其主持下的编译所同人，虽然因其学问、眼光已成为商务发展的主要力量，终究像是“外来人”。这些人即所谓“书生派”。作为协调者的夏瑞芳去世后，关于馆务、方针政策等等，两派之间自然会有矛盾产生。

陈叔通曾谈到“商务内部的矛盾”，“原来商务的主要人物大体上可分为教会派和非教会派两派。最初创办人全是同教会有关系，夏瑞芳、鲍咸昌、高翰卿（即高凤池）等全是教会中人，张元济是非教会的。开始时张与高冲突较少。我认为高翰卿是个好人，是顾全大局的仍但脾气很别扭；而张元济是不让人的。……双方的意见，起初都是一些小事，渐积渐多，例如，张主张在香港设厂，而高、鲍总是不同意，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才能通过、新加坡设分馆问题也是如此，张认为总厂在闸北地区易受政局影响，建议分一部分

到租界里设一分厂，高、鲍始终不同意。”陈氏曾是商务的主要人物，他说张元济的性格有自尊好强的一面，该是中肯的，又说两派的矛盾不是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也不错。但实际上，张元济的主张往往代表了比较开放长远的眼光和比较现代的管理思想，而且做事认真而不因循苟且，比较之下，高凤池的头脑就比较旧、比较平庸。情形或如张元济自谓：“与总经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弟意在于进步，而高君则注重保守，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高君则偏于求旧。”

平情而论，张元济并非好揽权的人，他在社会上及商务内部声望既高人缘也好，对商务的贡献很大。在夏瑞芳死后，完全可以任总经理，但他不做，就是因为做总经理要与官方应酬，他毕竟还有些士大夫气，故不肯如此。但是他又一心办好商务印书馆这个文化型的出版企业，故又不肯失去自己的行事原则。否则他当初就不必屈身进入这家私营企业了。他是要做事情，施展抱负的。商务的成功，一靠经济实力，二靠人才，第三就要数到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进步了。而后两者张元济都起着最显著的推动作用，尽管在一段时期内（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高凤池任总经理，张元济担任经理，实际上是张元济在主持行政事务和日常工作。

张元济注重引进有学识的人才，对改进商务的工作，是很划得来的举措。譬如陈叔通在张元济几次约请下，在一九一五年进馆，他原是国会议员，在北京办报。陈自述：“到了商务，每天只是看看各分馆的信札，有头无尾，使我觉得无事可办。有一天我便与张谈，想回杭州扫墓。张看出我的意见，要我说应办什么。我就提出商务有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各搞各的互不相关，如何搞下去，计划从哪里来，你（指张）在编译所下班后再到发行所，辛苦忙碌之极，没有一个制度怎么办得下去，以我看来应建立一个统一机构，把三所联系起来。这个机构的名称，我最初提出叫总管理处，后来正式定名叫总务处。张同意了 my 意见，……从此商务才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联系三所的事，开会时三所所长皆出席，意见一致便通过执行，意见倘若不一致，便将意见写下来或在会外商量。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订出许多规则来。”这个一处三所并下辖各分厂、分馆及附属机构（尚公小学、东方图书馆）的组织管理体制，实践证明在决策实施和功能配合上是健全、稳定和有效的。

又譬如张元济曾引进了留日归国的郑贞文，聘其为编译所理化部长。郑贞文又介绍留欧归国的杨端六进入商务，这些人都很年轻，在商务有所作为，杨端六长于研究会计学，由他筹画，改革了商务的会计制度，使原来混乱的财会工作走上了正轨。

经过多年发展，商务已是家大人多的“一大摊子”，张元济虽高高在上，却从来不做“甩手掌柜”。在任经理期间，我们看他当时的日记，实在是费神的事不少。简单说，他一是工作作风勤谨，办事重效率；二是在人事上重视引进新进人才，三是公私分明，在管理上很严格，讲原则，注意兴利除弊。

曹冰尸谈张元济的办事精神和工作作风时说：“他在公司办事时，经常先众人到馆，后众人离馆，偶然及时不到，必系因公在外奔走，散值时，又

---

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37页。

《致梁启超》，《书札》62页。

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将馆中未了文件实之皮囊，皮囊不足容纳仍复太为大包小包、’携回家中处理仍虽至午夜亦不厌倦，翌晨到馆，即将批阅过的文件或批改过的文稿分交各主管人员。”他还特别指出，张先生“不仅主持公司大计，迹致力于稽查公司各部分的办事情况，改进办事手续，往往抓住个别事件，追查原委仍毫不留情。在这段时期内，他为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当时所有各项办事细则，甚至应用单据的格式。几乎完全是他参与拟定的”。总的来说，由于张元济重视和推进行政管理上的改革，商务印书馆不仅采用了日本和德、美等国的印刷技术和机器设备，同时，也为自身确立了较为现代化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这位它较成功地保证了在竞争激烈的出版业中常盛不衰。

当然，他的作风也招致馆内一些人私下批评，譬如说他是“事务主义”，亦即“管得太细”，或者说他责人过于严苛，等等。张元济之认真，或者也许近于偏执，但大体是出于戒怠戒弊的责任心，他对于营私舞弊、办事倾顶、敷衍搪塞，出于长期植立的道德感，憎恶甚深，故责之而不留情面。在总经理（高凤池）之下，做了五年经理，由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一年，人已届五十岁有加，张元济实际不免感到既累且苦。苦恼之来，多缘于同总经理在性格和观念上的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分歧，这反映了前述商务内部之矛盾，逐渐加深、难以弥合。

张元济与高凤池的分歧，始终伴随着二人合作主持商务的过程。如《年谱》所记数条：一、一九一六年三月，“印刷所李彰生、吴炳铨自营私业，且嗜赌吃花酒，先生坚持辞退二人并登报通告，高凤池等认为处理不宜‘过激’。”

二、一九一六年五月，“因财政困难，先生决定停印若干书籍，并商定各所、分馆减员人数。在调整山西分馆经理事上，与高凤池意见分歧。”

三、一九一六年九月，“与高凤池、鲍咸昌、高梦旦、李拔可商议湘馆经理调动事。先生以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高凤池却主张‘宜用旧人，少更动’。彼此争辩许久。”

四、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为图书公司事与高凤池发生争执。中国图书公司盘入后，原作为第二印刷工厂用，先生常往察看，然主持人吴某营私舞弊，公司反添竞争对手。先生力主‘终以收去为是’。而高言不可，先生谓以现在办法，不愿再予过问。”

五、一九一七年一月，在荐徐新六事上与高凤池意见分歧，高谓：“此间人多不识，且留学生多靠不住。先生以为高罕与外接，此间人尤不善外事，故取材之路甚狭。”

六、一九一七年二月，张元济致信高凤池，“畅论用人政见之不同”，谓：“公司事业日繁，人才甚为缺乏，且旧人中之不能办事者甚复不少、若不推陈出新，将来败象已露，临渴掘井断来不及。”“公主张用老人，弟主张用少年人，公主张用平素相识之人，弟以为范围太狭，宜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而试之。”

七、一九一七年八月，编译所拟添购打字机，高凤池以“撙节”为由婉拒，先生以为其事当办，“虽费万金固无伤于俭德，否则即糜一文亦不得谓之非奢也。”力主应添设备。

八、一九一八年一月，鲁云奇贪污案发。鲁系商务所属中国和记图书公司经理，夏瑞芳亲戚，在外私设进出口洋行，偷印图书，亏空公司七千余元。高凤池意不予揭破，让其自行弥补。张元济力主揭露并诉诸公堂。

九、一九一八年四月，张元济致信高凤池，辞经理职，谓：“彼此宗旨不同，用人、行政所见动辄相左，公固为公，弟亦匪逞私见。徒以彼此相违，互相迁就，造成一非此非彼之局，然后可行。此于公司又有何益？”故辞职。后经劝解，张元济答应暂不辞职，并提出公司“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1）用人。欲储才，先汰冗，“以所有赡养无用之人之款，移以培植新来有用之人”。（2）财政。于公司有益之事。费虽巨，不宜吝，有可节省者，虽其事沿习已久，亦必停罢。“会计制度缺点不少，宜聘有经验有学识者预备修改。”（3）组织。建议“裁减机关，省去头目，聘用西人，改良印刷，采用法治”。张元济在这封致高凤池的信里，特别强调，“公司成立以来，制度实未完备，且积习已深，不速改革，于公司前途甚有障碍。”看来，张元济对商务的整顿、改革需要抓紧，已觉迫切，但明显感到总经理不予合作。在这次辞职风波后不久，果然又在数事上与高发生争执。

张、高二人最主要的矛盾是在用人问题上，所谓“意见凿枘”，张主张新，高主守旧，张主“动”，高主“静”。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张元济致信高凤池，陈述己见，要言谓：“五年前之人才未必宜于今日，则十年前之人才更不宜于今日，即今日最适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后，亦必不能适用也；事实如此，无可抗违，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公尝谓得罪旧人，旧人旨将寒心，公司必受其影响。弟则以为其人苟忠于公司，必能知公司如此用人为求免以上诸弊，相谅之不暇，奚至寒心！若非然者，其人本专为一己计，为反朋计，不为公司计，如此不忠之人，即不寒心亦有何益？不独此也，公司专为老旧无能之人保其地位，而新进之辈必将灰心，弟恐其害于公司者什佰于旧人之寒心也。”

张元济特别声明自己是“喜新厌旧”，认为公司之取得成绩，“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主义之所致”。就张元济的性格言，温和平实原为主导，但就他与高凤池的矛盾而言，事业心已使其显得棱角分明，其革新意态和激烈的争辩，倒也并非出自意气或争权夺利之心，可能是时代的变化、进步，影响到和促使他意识到必须使自己和商务都克服暮气，以开明改革的形象，跟上时代之进步。毕竟，那时已是社会思想文化潮流正在发生大变动的时代。

张、高二位商务领导人的矛盾，由于张元济的不肯苟且而又难有作为，高凤池的敷衍延宕，到一九二〇年时已近于弄僵。实际上这是商务内部“教会派”与“书生派”在文化背景上差异甚大的矛盾，反映在经营决策上往往互为牵掣，难以决断。一九二〇年三月因购地产事，张、高二人又起冲突，张元济遂再度宣布辞职，其致各分馆经理书谓：“元济自被推力公司经理，极思与翰卿先生同心协力，共谋进步，无如翰卿先生宗旨不同，元济对于公司革新及久远之计划，于今数载弗获施行。……迫不获已业于本月二十六日向董事会陈明辞退经理职务。”

---

《书札》189页。

《书札》190—191页。

《年谱》188页。

这次辞职显系下定决心，因而当商务董事会为此特别开会，由高凤池声明挽留；并由金伯平、高梦旦代表全体挽留时，张元济均表示万难复职。甚至说“如再复职，是为无耻”。其心情可以想见，是特别要示以绝无争权夺利之心，他多少不免还有些“道不行则浮于海”的士大夫气。

去意难回，僵局亦难化解。好多人都明白，商务印书馆其实还离不开张元济的操持的。然而怎么办？陈叔通回忆说：“过一天高翰卿来找我了。我便直截了当地对高说：‘你是总经理，你可以估量一下，如果能背得下，那就听他（张元济）辞职，商务还搞商务的。’高说：‘事务方面还能勉强凑合一下，但社会文化界，我怎么能号召得了？’”之后陈叔通想出了一个主意来打开僵局，即张、高二人均辞职，成立一监事会，张、高同任监事（后定名为监理），形式上二人同退，但仍可不离商务。高凤池同意了这个办法，陈又去见张元济，告诉张说：“你怎么摆脱得了商务？恐怕晚间作梦也要做商务的梦。”把他的办法也说服了张元济。此事最终达成妥协，张元济便从一线退了下來，从此改任监理。他主动要求减少薪水。日常事务因之有所减轻，但馆内事务仍随时过问。至于他与高凤池的关系，矛盾亦随之淡化。张元济在日记中记述：“午后到公司，先约翰至会议室，余为之道歉。董事会特别会议。……翰先述病后精力本不及，又言曾受余之建议，亦久欲施行，因事忙未果，今能如此，以后并多招有新学问之人，于公司甚有裨益，云云。余继言，退志早，屡因事阻，不能如愿，此次辞职，实由于此。翰既采用余议，余自赞成，且多招新学问之人，尤为余所主张。监理不办日行事务，必有若干冲突，在公司如此之久，断无超然不顾之理，翰可担任，余必追随。但为身体年纪关系，恐亦不能久长，只可先行试办。……余再声明，余任监理，待遇必须亚于翰翁。并言余应向翰翁道歉。”总的看，张元济虽不再担任经理一职，他的“喜新”的指导思想，基本上被确认了。对此他多少感觉宽慰。

## 第六章 仁山智水

### “五四”潮来

二十世纪的脚步走到第二个十年，这大概既是世界史也是中国史变动极大的年代。在世界上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由是转出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及思潮演变的新格局。在中国，民国代替了王朝，似乎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但社会混乱、政治腐败几乎不见减少，且更形严重，说“换汤不换药”，恐怕还嫌说轻了些，其间尤以袁世凯的篡权窃国、“八十三天皇帝梦”最为丑恶。那时有副喜笑怒骂的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讽刺不算夸张。当袁世凯一伙军阀政客利令智昏、弹冠相庆歌舞升平时，北京又有一副门联道是：“得过且过日子，将死未死国民。”反映出那个时代精神的迷茫。

一片声讨之中，洪宪帝制消亡，袁世凯气死，是在民国五年，不过接踵而来的，依然是倒退，内忧外患，如军阀混战，如张勋复辟之类，还有欧战之后巴黎和会的屈辱等等。这一切历史的挫折，实际上距晚清的全面社会危机形成，已过去了几十年；却仍然走不出困境。刺激、反省以及域外新思想的传播，促使一部分思想前进的文化人要求再对困境加以重新考虑，也就是对传统进行启蒙主义的思想文化批判，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出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包括批判旧的礼教、旧的文学艺术、批判国民性。这个思想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创刊的《新青年》为标志。而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形成高潮，其现实意义极为鲜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社会变动亦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后来有人认为“五四”反传统反过了头，有人则认为“五四”反传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不够彻底。

《新青年》原名《青年》，是由陈独秀创办的。陈独秀后来做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总书记，在清末民初一直是位革命党人，同时体验着辛亥以来政治革命的失败。到他在上海办《新青年》时，袁世凯正在搬演“洪宪”帝制，现实使陈独秀发现，政治革命的一再失败，是由于缺乏一个思想文化革命的基础。在他看来，思想文化革命应包括文学革命、伦理道德革命、宗教革命等等，一句话，中国需要“改弦更张”。而这是最符合进化论的原理的。

由于蔡元培于一九一七年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就由上海迁到北京，并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有七人：陈独秀、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高一涵也参加了编辑。这些人又都同北京大学有关系，一时，北京成为新思想的中心了。

回头看去，《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曰民主，一曰科学，即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坚定声明：“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是不是把那两位“先生”请了来中国就有救了？隔了许多年后来看，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退一步说，如何把两位“先生”请来，恐怕也

是一个很困难的实践过程。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毕竟有至少两个积极的特点，一是出现了参与变革的一代新人，二是成为一个社会历史和思潮的转型期的开端。

话说回来，在思潮转变的契机及影响之下，作为出版家的张元济的情况又怎样呢？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一年，他作为经理主持着国内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由于商务在文化界有着它重要的作用，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可能意味着远比商业竞争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挑战。

在民国初年“黑暗主义”（蔡元培语）的政治环境中，社会文化景观，一方面是打碎了“铁板一块”，新思想得以引进与传播，另一方面更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譬如清末民初的小说有了很大市场，小说的繁荣是同报刊书籍市场的扩大互为作用的。在辛亥革命以前，因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创作以“启发群治”为宗旨的新小说，小说的内容天地扩大了，再加上域外文学的影响、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商业化倾向的增强，各种题材类型的小说，特别是翻译小说发行渐广，颇为走红。例如林琴南译介（实际是在别人口述故事基础上撰写）外国小说名著《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文字生动，令人爱不释手”，形成“不胫走万本”之热烈景况。这类小说销路很好，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三年的十年间，光商务就出版了六十四种林译小说，社会影响大大超过一般出版物。商务还出版了《说部丛书》，编刊《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等杂志，组织译介《福尔摩斯侦探案》等侦探小说，以飨读者口胃。小说之兴盛，不能不说是移易风俗、浸染思潮的一件事情。康有为当时有诗云：“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也有人讲，连士子们也“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

不过，辛亥以后，文化潮流的变化也可从小说潮流的变化中窥知消息。比较而言，辛亥以前是思想热情随政治革命而高涨的时代，到得民国初年，政治败坏的景况，不免令许多人的理想感到幻灭，不论言论还是小说恐怕都难以再以拯世济民号召民众，政治热情消退之后，于是，消闲的、自娱娱人的、游戏的趣味便开始行时起来。由于除了“赚钱”以外，也不大再需要别的目的和准则，小说的“俗化”，它的迎合市民趣味便一时大为流行。所谓“读者却正以消遣避暑而才读文学·作者正以取得金钱之故，而才去著作娱乐的文学”。后来五四新文学作家称之为“文学的堕落”。

应该说，在民初的出版物中，商务印书馆的业务量仍占了很大比重，既是营业，也必须获取利润，但商务的出版方针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如张元济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日记中记：“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木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商务的出版路数，与主持者的文化修养和开明思想有很大关系。

毋庸讳言，张元济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态度，既是开明的，却又并非激进的。这种温和的特点，使他既不同于拼命维护旧秩序的传统主义者，又不同于企图借打破传统而动员起社会文化变革的人。从戊戌到辛亥，他一直亟亟于寻求启发民智式的改良，特别是教育的改良。当政治风云翻覆却无希

---

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74—75页，北京文学出版社，1989年。

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38号，1922年。

《日记》（上），265页。

望可言时，他彻底终止了有限的政治生涯，不肯与“腐败官僚”共事。所以，在他民国初年的日记中，除了馆中事务，毫无有关国事的记载。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张元济也只记了“闻袁世凯病毙”六个字，多少有些淡泊于世事了。但是，这又决非使自家等同于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闲人。换个问题来问，除了终日忙碌于编译出版事务外，他还坚持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自己的历史观、现实观的核心？

显然张元济隐隐仍不可释怀的，除了民族苍生的命运，既非“革命”或者“保守”，也非其它的政治或文化的是是非非，而是一种人格的道德的关注。其实这也就是他的基本文化态度。这种关注，在他看来，与晚清以来盛行的进化论思潮并不矛盾，亦即，尽管人格和道德观念虽不免在历史中变化，但其儒家传统的价值意义并未失去。这种关注，体现于他的日常生活和从事事业时的原则立场，也体现于对世事的看法。换句话说，像袁世凯这种阴谋野心家，先是出卖过戊戌维新派，后又在民党与清廷之间搞两面派，讹诈取得政权，又进一步耍弄字法搞皇袍加身，演出一场肮脏的骗剧，正是为尚未泯灭的社会道德、良知所深恶痛绝，虽然袁世凯到死还以“为中国再造共和”自居，其骗术又何能掩盖，只能落得众叛亲离。张元济曾就袁氏之不道德立论，讲演“新国家当以旧道德相维持”在此之前，他接待过因反袁而南下经沪去广西的梁启超，并表示将尽力帮助。护国军之役后，他约请梁启超著《袁世凯之解剖》。此役的功臣在云南发动誓师讨袁的蔡愕将军病逝于日本，张元济撰写了挽联，挽联写道：“为争人格不得已而用兵，败勿亡命，济亦引退，抵柱中流，先生庶无愧矣；既负民望宜知所以爱国，首轻权利，更重道德，良药可口，后死者其听诸。”正是：字里行间，慨寄遥深。

然而张元济毕竟不属于思想家，他对人格道德的关注和坚持，大抵只可独善其身，难以兼济天下。也就是说，他那种作为精神学问与修养境界的“道”（安身立命之道）难以同社会变革的“术”相沟通，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隔着一道鸿沟。从戊戌到辛亥，张元济对此恐怕已深有体会了，以他的性格，也只能有逃避现实社会活动的选择。现代大学者陈寅恪讲过一段看似牢骚的话，他说：“我济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此一“入而不入，离而不离”的处世方法，学者陈寅恪等人其实做不到，因为他既不愿把学问变成庸俗的实用手段，又不可能去经商。倒是张元济将道德学问与入世谋生还算不矛盾地结合于自己身上。这既同他从事的是出版业有关，也同他并不取“高调”的人生态度有关。在二十世纪中国，“高调”式的人生观往往体现在要求推动大规模社会改造（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思想文化结构、社会组织）上面，体现在乌托邦式的思想主题上面，对一代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在现代往往被称之为“革命”随社会改造运动中，“五四”前后的思想文化革命确于是一个转折点。张元济显然并不处于这场革命的前沿。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鉴于辛亥民族民主革命的失败，认识到非得从思想文化变革入手去改造国民性不可，而首要的途径即是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去批评传统，于是有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国粹派的运动发生。发难时期，在《新青年》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

《年谱》131页。

《吴宓与陈寅恪》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大呼他的“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比较激进，他称一些明代的文学家如“前后七子”（李梦阳、王士禛等）以及清代的桐城派为“妖魔”，恨不得拖了大炮来打倒这些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妖魔”。当时还有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也都写文章宣传文学改良，主张白话文。用胡适的话说，白话文是活文学，文言文是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

一九一八年底，又一个白话文的周刊《每周评论》创刊，紧接着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办了一个白话月刊，名为《新潮》，形成了一种同声相应的势头，不久，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也拥护白话了。持异议而出来讲话的，主要是林纾。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责难新派“废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蔡元培覆书驳洁，取比较开明的文化观点。相比之下，林纾的守旧观点显得说服力不大。实际上，到“五四”运动起来，全国响应，新文化运动便已深入人心了。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文学研究会成立，《小说月报》改组，思想文化气候，翻然为之一变。

这儿话说回来，新文化运动在北京方兴未艾，气势不俗，大本营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却无多大变化。本来商务的出版物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一直颇有社会影响，而且其方针既着重开启新知又比较稳健，个中原因，既同商务需要生存和发展有关，又缘于主持人、编辑人的知识和思想背景，他们都不是新一代人，当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这种状况自然显出一定的保守性。譬如商务的出版物与杂志一直都是文言文的天下，《东方杂志》作为广有读者的大刊物缺乏新鲜思想和明确的政治立场，过于稳健。

《小说月报》和《学生杂志》从题材到形式都是传统的模式，甚至充满了“礼拜六”派文人的酸腐创作和风格陈旧的翻译作品。这种情况维持多年，当“五四”新文化精神高涨时，自然会引起非议。譬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八年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抨击《东方杂志》及其编者杜亚泉。罗家伦于一九一九年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对商务印书馆的几种杂志，作了严厉批评。

作为商务主持人的张元济，显然遇到了新问题。他是否会站在他的老朋友严复、林纾的立场上面对彼时的文化新潮呢？

### 开放与开明

一九一六年到二九二一年间，由于任经理职，张元济一直忙于出版管理、经营等事务性工作以及古籍的收集和印行，几乎是心无旁骛。当然，商务的方针也反映着他的指导思想，有稳健的一面，亦有开明的一面，这应该说是—贯的风格。而问题在于张元济所联系的思想文化界，包括人与主张，正处于一个嬗变期，究竟该墨守常规，还是与时俱进？毫无疑问，无论就商务的传统而言还是就张元济的性格而言，他们都不会有积极大胆突破规范的意识与举措，不会在其出版物上出现言论的“黑马”，如果注意到商务之出版必

---

即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须考虑到社会各方面，其主要的印刷业务如印钞票、债券以及发行教科书，又都不能得罪于官场政界，这种谨慎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既要考虑到社会各方面，势必就不能太刻板，否则会导致市场机会的丧失，所以向来出版业又都有“喜新”的机会主义的一面，老牌子的商务亦不能例外。况且张元济任经理期间，已经对墨守成规有危机感，因而在改革内部结构和引进新人上面表现出积极倾向，并因此而与总经理高凤池多次产生冲突。

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以前的张元济既然是个君主立宪派、保守派，辛亥以后又不参与积极的社会活动，加上商务的稳健传统，似乎对新文化运动不会持积极态度，因此商务的改革与更新，实际上并非由张元济促进，而是大势所趋，是不得已的。

这说法不大正确。

固然，张元济从来都不是革命派或激进派，但也从来都说不上守旧。“改良”，当然不合于政治和思想上激进的“非此即彼”模式，不赞成极端的手段，但也还是要朝“良”的方向做改进的努力。从戊戌变法到民国初年，张元济尽管算不上在时代大潮中弄潮，其希望通过维新的途径使国家人民臻于进步、富强的努力，未尝放弃。就此而言，这种思想倾向与革命派的差距，也许在于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是高调的，一个偏重于点滴的改良，一个则乞灵于借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斗争来解决问题。当然，在民国初年的历史情境中，现实对革命的要求，往往看来更迫切，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正如它作为反帝爱国运动而得到广泛支持一样，也是势所必然。

从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评价标准去看，温和、开明，并不足取，但恰恰是张元济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的意义，在文化史上可能会被忽略，但不会被完全抹去，正如我们不得不承认，滴务印书馆始终在文化转型期具有意义。张元济的情况同蔡元培相似，蔡元培也不是激进派，他作为北大校长，以他开明的态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难道不重要么？而且这种重要性会随着时间推移更为明显。可以说，张与蔡非常相似。乍看，文化变革的开路先锋不是他们，但他们做了打基础的工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其重大的改革之一是引进了新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从而引起“五四”之际的风气转变。进而论之，其所以能力中国学术界知识界开一新纪元，又在于他并不流于偏至，其休休有容的性格，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这比仅仅高喊“革命”更具现代精神。蔡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之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活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着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

说这话已经在“五四”后多年，其开明的文化态度依然如故。

张元济早年从南洋公学转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多年，商务出版的书籍大量引进了西方哲学：文学、科学技术、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文化思想的资源，也足以说明，张元济的思想是开放的，甚至可以说“五四”新文化



的一代人大多受到过熏染，所谓“新”，当然意味着变革的内容大大超越了一般的社会意识，却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由于开放与开明的传统并未因商务的牌子已经是老的而失掉，商务顺应时代的改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九一八年六月，张元济为解决京馆购地、津馆营业及借印《道藏》等事离沪北上，这是他一九一一年之后隔了七年的一次北京之行。在北京，活动主要为仿书购书、会友拜客。张元济见了不少老朋友与社会名流，他们中间有蔡元培，王宠惠、孙宝琦、熊希龄、汪大燮、汤尔和、章士钊、严复、林纾、伍光建、傅增湘、夏曾佑、马叙伦、李石曾、胡适、陈独秀、沈尹默、沈钧儒等。政界情况或者文化界的变化情况，估计可能会在诸多谈话场合涉及，但没有留下记载。张元济此行的目的，毕竟是在改进商务出版方面。与此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与北京大学诸君进行了积极接触，如七月九日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座谈，在座者有陈独秀、马幼渔、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其时谈了改订商务教科书事，请同座诸人帮助改订，还谈了编写通俗教育书籍事，表示商务愿意出版。张元济后又参加了一次为《北京大学丛书》的编译举行的茶话会，商量具体出版事宜。不久后，《北京大学丛书》及《尚志学会丛书》均由商务印行了。郑振译曾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说：“我统计这一年出版的书籍，最多的是定期刊物，其次就是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少的却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

就张元济而言，你可以说此人不够有锋芒，但大抵可说“与时俱进”、“休休有容”是历来的。一方面他听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保持同严复、林纾，以及孙宝琦、董康、王克敏、傅增湘、章士钊、林长民等人的联系，这些人有不少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作过大官的，算是比较守旧的罢，甚至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守旧派，由于他的学问，张元济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如此这般，自然不妨称为“雅量”，实际上，更近于一种开放社会应取的文化态度，正是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比较缺乏的。

张元济的京华之行，历两个月（中间曾因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长李拔可病重而返沪，一周后复又北上）。此行既主要“注意旧书”，即古籍的搜集和出版事宜，亦开辟了出版新书的渠道，如《北京大学丛书》的推出。不知是否由于张元济接受了沈尹默关于教科书应改用白话文的意见，商务于一九一九年开始出版《新体国语教科书》，是为国内教科书采用白话文体之第一步，嗣后，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教科书改用国语，商务又编印新法教科书一套，还出版了最早的国音字典，国音学生字汇，推广拼音字母。商务显然并未因循守旧。一九二二年还开始出版《世界丛书》，属于较早的普通丛书，此丛书以译印欧美日本各学科著作作为内容，由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主编。此外，拟展开电影摄制的活动影戏部、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机器雕刻字模，也都在商务首先诞生。

不须多加解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个日子被特别地铭刻于中国现代史页。这一天下午，来自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前示威游行，反对西方列强拟定的巴黎和约，抗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愤怒的学生在游行之后前往赵家楼曹汝霖（当时为交通总长与章宗祥、陆宗輿合伙搞媚日外交）的住所，殴打了章宗祥，火烧了曹的住宅，安福系军阀

政府逮捕了数十名学生。事件发生后，更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迅速扩展至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五四”，以其鲜明有力的形式强化了中国现代史上民族、革命与走向大众的文化批判的主题。

张元济显然也不可能置身于事外。他当时的日记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运动的想法。五月九日，记载了这天公司停业，“表抵抗日本，及对于北京学生敬爱之意”。五月十三日他函告出版部，查杂志如有日本广告，应停止。六月五日至六月十二日，上海罢市，商务亦停工，由于造成经济损失，馆方有人主张要求复工，张元济则主张灵活对待。他还提出向学生捐款，在发行所门口略备茶点招待学生。五四运动对张元济个人也产生了某种影响，诸如触动了忧国之心情，他本已数年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一次，他在见到来沪的严修先生时，希望严修与张謇等通电，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只因严未允而作罢。蔡元培先生因学潮震荡不已而辞职南下，事件有所平息后、“挽蔡”呼声甚高，包括教育部当局、教员、学生均选派代表南来请蔡复职，张元济则致函于蔡，劝其“不可轻于再出”，因为他担心政治、教育的局面都是很难安顿的。毕竟，他们仍然只是有温文尔雅气质的学者。

话说回来，“五四”以后，它作为群众住政治斗争的作用，可能不如转变社会思想文化氛围的作用来得大。显然，新文化运动经此浪潮而产生了放大效应，影响迅速扩展，其中包括五四运动激发出的那种挣脱束缚的年青人的热情奔放情绪。革新的趋势使原有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样式很快显得陈旧以至老朽，不长时间内，许多新文学杂志和社团涌现于世，即是一例。

在这种情况下，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亦开始改弦更张，另整旗鼓。首先是《东方杂志》调整。据记载，五四运动爆发后二十天，张元济便与高梦旦、陶惺存商量，《东方杂志》最好由陶来接手，撤换原主编杜亚泉。人事变动的原因即在于要改变《东方杂志》比较保守的面貌。杜亚泉是一九〇四年进馆的商务元老之一，原任编译所理化部长，他在出版科学教科书和词典方面颇有贡献，从一九〇一年起由他主持革新了的《东方杂志》，开始着重刊载自撰或征集的论文及译文，杂志的影响迅速扩大。只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杜亚泉持论保守，主张否定西方近代物质文明，肯定东方的道德文明，他以“伧父”的笔名写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论战，时人渐渐对《东方杂志》的倾向表示不满。在商务当局的干预下，杜只得辞去主编，专任理化部长。

《东方杂志》换了主编，接着《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也面临形象更新的问题，因为这几个杂志也受到新潮思想的人抨击。于是《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由周予同负责，《学生杂志》的编辑换了杨贤江，《妇女杂志》则由章锡琛来办。

商务的《小说月报》，也是广有影响的文学月刊，一九〇一年创刊，最初的主编许指严为旧派文人，一九一二年主编改由恽铁樵担任。恽擅长翻译，曾与徐凤石合译过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也翻译小说，文笔宗仿林纾。他编《小说月报》时颇有眼光；鲁迅、张恨水最早的文言小说均被恽的慧眼所识而发表。恽喜研中医，后来就改行行医了。接他手的是王药农。后来，有人说王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小说月报》是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其实不大对。王药农是南社成员，也算旧派文人，善诗文、词曲；也好写些遗闻轶

事。民国初年，消闲的通俗小说比较风行，内容多是供消遣的才子佳人艳情故事以及侦探、武侠等，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名称有点儿笼统，比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当推徐枕亚的《玉梨魂》一类。大致而言，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小说读者的趣味还在这类消遣性作品上面，上海许多报刊的版面故被占去不少，《小说月报》亦不能免俗。志希在《新潮》上著文《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批评社会上有三派小说，一是“黑幕派”、二是“滥调四六派”、三是“笔记派”（包括言情、神怪、技击、轶事几种），并说《小说月报》多登第三派的小说，大毛病是“无思想”。由此可见，《小说月报》虽不同于《礼拜六》，也还是与新文学无缘，到一九二二年，《小说月报》的销数步步下降，王蕤农亦表示要“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了。不久，王终于辞职，由沈雁冰任主编，来改革《小说月报》。从第十二卷开始，该刊面便焕然一新，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成为该刊的基本作者，有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许地山、郭绍虞、郑振铎、冰心、庐隐、王统照、孙伏园、沈雁冰等。他们在《小说月报》上实践其“为人生的文学”的主张。

沈雁冰是浙江桐乡人，当时才二十五岁，一九一六年由北平分馆经理孙壮向张元济介绍而入馆，先在英文部编译，后为孙毓修助手，协编“四部丛刊”，因其读书多，思想活跃加上笔头不弱，被张元济、高梦旦畀以重任，也算是破格用人了。

茅盾（沈雁冰）回忆道：“后来我才知道，张菊生和高梦旦十一月初旬到过北京，就和郑振铎他们见过面，郑要求商务出版一个文学杂志，而由他们主编（如《学艺杂志》之例），张、高不愿出版新杂志，但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于是郑等就转而主张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然后再办刊物。张、高回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小说月报》革新版面，显然得到张元济的默默支持，不久，印数持续增长，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革新是必要的。

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张元济在经理任上最后两年，杂事丛脞，可谓忙甚。一方面经营管理事务皆需亲自处置，又与总经理高凤池意见往往分歧，不能合作愉快，以至终于引发辞职风波（事见上章），另一方面外面的干扰亦复不少。譬如中华书局对商务发动“攻势”，根据《实业之日本》杂志所载一篇失实文章（说商务有日资），译成中文小册子《支那问题》发行，结果引起诉讼，张元济作为原告，三次出庭，终以胜诉作结。另外，一九二二年初又发生孙中山抨击商务印书馆事，事情是由商务退回《孙文学说》一书不印而引起。孙中山据说十分气愤，发表一公开信云：“我国印刷机关，惟商务印书馆号称宏大，而其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固无论矣，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有保皇党气味，而又陈腐不堪读。不特此也，又且压抑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这可能是一时偏激之词，张元济曾解释说：“当时不肯承印，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所言应该是实情，商务固然在政治上十分谨慎，却不会与孙中山先生特别对立，否则

---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

《日记》下，651页。

一九一六年初商务就不会向孙中山领导的运动捐助五千元了。当然，不能否认，出于谨慎，商务的出版物往往缺乏锋芒，亦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后来，《孙文学说》以及《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都由一家后起的小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出版。

到一九二一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已是一家大规模出版机构，全国有几十家分馆，内部有学校、图书馆、藏书楼，既拍电影又造文具，还在加紧进行较庞大的古籍出版计划，《四部丛刊》之外，又在策划印行容量更大的《四库全书》。好像一艘大船，“船长”张元济必须努力使其保持稳定地运转，同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既要能生存，又求发展，既不激进，同时又不落于保守。这大概正是张元济将传统与时代精神加以调合，使人格、道德原则与商业旨趣作有意义结合的尝试。中国有句老话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是沉稳的，水是流动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夹缝式”处境中，张元济大抵表现着“仁山智水”的境界。固然，做事业的人，即使是张元济这样资历不浅的人，也不免遇到许多阻力，以至于叹息：“元济对于公司革新及久远之计划，于今数载弗获施行。”在那种使得人常常不得不袖手而观、明哲保身的时代，张元济仍然不失其“干实事”的责任感。其谋事勤谨，小而言之，如为女工发花红、改良厂内厕所，拨款为贫苦工人子弟求学之助；大而言之，或为“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拨款四万元，组织译辑新书（亦即梁启超、蒋百里等人撰写的《共学社丛书》和后来的《万有文库》）。尽管这些努力是平常的，一点儿也谈不上“治国平天下”。可做来一点一滴，功在不舍。

毕竟，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未来如何，难以卜知。张元济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也在于他既有执著的一面，又有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这样便不仅淡于名利，而且不把职位权力着得太重，以至成为人生的缰锁。显然，“五四”以后，新思想的演变正在成为潮流，他尽量去跟上潮流，但他的“跟潮流”，不仅体现在商务的改革，更能反映他的真知的，则是他明智的选择，即“退”的境界。一九二二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使弟果为一己什，则公司目前尚称顺境，尽可遇事敷衍，优游率岁。然吾辈一存此心，公司败坏之根即种于此。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过去明代人徐树丕《识小录》讲过一种“老计”，他说：“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志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当随缘任运，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其名曰老计。”这么说，是达观，也不免太消极。但从张元济的“老计”来看，却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在这儿，他与许多常常自诩领先于时代或指弹别人落后于时代的人，有着很大的不同。

---

《年谱》188页。

《年谱》190页。

## 君子之交

张元济在世九十余年，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世事潮流迭历变迁，“金谷俊游，铜驼巷陌”，他的阅历，一定是“锦瑟无端”般的一本厚书。但人和人真是不一样，与其他与世沉浮的人相比，或者与别的文人墨客相比，张元济确乎显得不务虚名、不求热闹。本来可以当官，不当，作大学校长，也不作，却肯以翰林的资历一头扎入一家印书馆，作起编书的事业，一作二十年。这二十年，商务印书馆由小渐大，执书业牛耳，不仅有功文教，而且与社会文化变迁息息相关。这样看来，张元济尽管不是“浮在上面”的角色，却与思想文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张元济广结善缘，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关系至大。可惜他不好言说、表现，一生没有留下一本回忆录，是很遗憾的。

假使有那么一本回忆录，可以猜想其中的“感旧”部分首先会谈到蔡元培。张、蔡二人，可称知己。他们二人在思想性格上的共同点，可用后来《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中的话来描述——“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兼有学者兼事业家的特长”。张元济与蔡元培交往的时间很长，两人有“六同”关系：一是同庚，而人都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二是同乡，皆籍贯浙江；三是乡试同年，皆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中学；四是殿试同年，光绪十八年壬辰考中进士，一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五是同事，一度同在南洋公学任教，六是一同创办《外交报》。此外，如前边说过的，两人在思想性格与文化态度上也是大致趋同的，趋新而不躁进，用现在的话说，既有其精神的“发散性”，又有“收敛”的特点，肯于突破藩篱新其进境，同时又素守传统的好的人格品质。亦如宋代学者程颐月旦人物时所说：“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

戊戌变法失败，张、蔡二人均意识到改造社会的根本不能仅靠上层的变法，须从改革教育、启发民智入手，于是不约而同，南下兴学。而《外交报》的创办，实为二人重视文化传播之始。其《叙例》有言：“夫思想顽钝，赖言论以破之，言论暧昧，则借事实以画之。然则言地学者，必取资于图绘，习制造者，或效象于雏形，事实一界，非空言所能发也。同人有鉴于此，议发旬报，荟我国自治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国之现状，之隐情，胥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为理论家邮传，而为实际家前驱。”虽然张、蔡二人的处境后来有所不同，此一思路，却始终为其服务社会、学术的宗旨。

本为传统士人，张、蔡二人却有开阔的世界眼光。一九〇六年蔡元培意欲出国留学，适逢孙宝琦出任驻德国公使，他曾托张元济、叶瀚去向孙关说，愿在公使馆兼充一名职员，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三十两，蔡便随孙前往柏林。为了帮助蔡的国学生活，张元济特约蔡元培在德国为商务编书，每月致酬百元，一部分汇德国补充学费，一部分留供家用。当时蔡的三个子女尚在幼龄，张元济对他们的生活一直尽照料之责。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当国，蔡元培辞去民国教育总长之职，举家赴法国，张元济又用约稿付酬的办法为蔡谋助在欧洲的生活。两次欧洲之行，蔡元培除依约撰寄论文供《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刊载外，还先后著译《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

学修身教科书》、《哲学大纲》、《赖斐尔》等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无论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还是在北伐以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蔡先生与张元济及商务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一直到抗战中蔡先生病逝于香港，治丧事宜也是由商务印书馆料理的。

与蔡元培先生还有另外的相似一点，即张元济善与社会上的各种人相交，以诚信待友待人，有“和而不流”，“群而不党”的君子风度。他的交友录，大抵以斯世前后两代读书人为重，以书墨为缘，以素谊会友，至于当道权贵，极少交接，不外“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他的朋友中，也有历史风云人物或在晚清暨民初政治舞台忽上忽下的角色，但张元济与他们的交往，很少具有政治派别的或功利的色彩。这或许也是他作为一个旧绅士的局限。倒也不必讳言，张元济从来都不是在政治或思想斗争中旗帜鲜明的人，他的秉性修养，促使其在处世待人时往往以传统道德为归，一遵儒者的风格。因而就可以理解张元济民国初年的社会交往何以既与腐败政治无缘同时又是多方面的，他与一些前清的旧臣遗老保持交谊，其中有瞿鸿机、缪荃孙、沈曾植，郑孝胥（还是商务董事会主席）等，因借集古籍善本事，与思想极顽固的叶德辉亦有交往。他的朋友中，既有北洋时期的政界闻人熊希龄、汪大燮、汤尔和、王宠惠、梁士诒、叶恭绰、范源廉、傅增湘之辈，又同梁启超、蒋百里、丁文江等研究系人士过从不疏，民党方面的唐绍仪、胡汉民、吴稚晖、汪精卫等亦时有联系。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严复、林纾、章士钊依然是旧交，而胡适、刘半农、罗家伦诸君亦不妨成为新知。其自有一种泱泱之大的风度，张元济不是一个很有成见的人。这一点大约也影响到商务印书馆兼容并蓄的出版方向。兹就《年谱》所载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数条记事略录，可见张元济多方面交往之一斑：

7月21日晚邀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来寓所用餐，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作陪。

7月24日宴请北上新官及议员，有范源廉、蓝志先、马君武，徐佛苏、欧阳俊明等。

7月25日孙中山偕廖仲恺、胡汉民、张继、朱丁、唐绍仪、温宗尧等来商务厂参观，先生接待。

7月27日孙壮来信告以卢鉴泉荐沈德鸿（雁冰）来馆。先生同意试办。

7月28日章太炎托人见先生，欲将《章太炎全集》修订后交商务印行。

7月31日访吴稚晖，拟聘其入馆。并谓公司“且注意于培植人才，不专在谋利”。

多方面、多渠道的交往，小而言之，是为商务印书馆同知识界、学术界建立积极经常联系奠定基础，大而言之，传统文化的发展恐怕还是有赖于这种开放的而非狭隘封闭的精神状态。显然，由于这种开放的色彩，商务长期对知识界人才具有吸引力。张元济任编译所长时，引进了高梦旦先生。高梦旦在被聘为国文部主任之前，已经是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复任留日学生监督。高进入商务后，与张元济合作默契，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也很好，他也是个没有什么成见的谦谦君子。胡适曾说他“爱国家社会，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他爱敬张菊生先生，就如同他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他们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就如同他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高梦旦是福建人，他的一位同乡李宣龚（字拔可）也在商务服务甚久，李是前清举人，曾做过

---

高平叙《蔡元培与张元济》，《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

适之《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53页。

知县，辛亥革命后进入商务，很得张元济借重（李逝世后张有“几砚亲交四十年”之语）。李拔可熟悉的多为旧派文人，他能写字、做诗，和戊戌被杀的林旭（漱谷）是中表兄弟，且有文字深交，所以于编印《戊戌六君子遗集》之外，又印了《晚翠轩诗》。清末民初“同光体诗人的诗集，大多数由商务印行，差不多都和李有关系，如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郑孝胥的《海藏楼诗》、诸贞壮的《大至阁诗》、沈瑜庆的《涛园集》、陈衍的《近代诗钞》和《石遗室诗话》等，虽为新文学论者所不取，仍有其历史价值。

还可说说另外两位福建人：严复、林纾。严复早年虽然没有走科举的路，而是去英国学海军，但他比张元济年长十几岁。两人订交约在戊戌变法以前。戊戌之后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因知严复谙通西学，起意合作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第一本经张元济之手出版的严译西书是密克著《支那教案论》。张进入商务后，由商务出版过的严译名著有《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八种。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一年期间，严复致力于译书，自谓：“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先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口，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羸魔（亡国），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些想法是在写情给张元济时谈到的。严复译的书对时代思想确实影响不小，但是否如其自谓的，达到启发民智的大功效，则很难说，因为社会变革的道路颇为曲折。到民国以后，他自己也感到苦闷了：“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严复晚年因列名于为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不免世人讥评，张元济也未必以为然，但始终尊严复为著名学者。虽然民国建立后，严复与商务的交往减少。但他存于商务的稿酬、版税以及成为股东后的红利，维持了晚年生活。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年纪也长于张元济。他早年中举后便仕途阻涩，以教书为业，写得一手追步左、马、班、韩的古文，后以译写《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外国小说声名大振。林纾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四年间，共翻译了一百七十九种欧美小说，影响亦不小，其中仅商务一家就出版了一百种。林纾译作的大量出版，张元济和高梦旦都是赞助者，并保持彼此长久的交谊。例如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蛮荒志异》一书中仍林纾写有跋语：“长安大雪三日，扃户不能出。此编眷缙适成，临窗校勘，指为之僵……雪止酒热，梅花向人微笑，引酒呵笔，书此数语邮致张菊主先生为我政之。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畏庐书于雪中，”林琴南古文情词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但他却有文人的怪脾气，也就是“倔”。据说，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却又是赞成共和制度之一人，民国初立，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六复辟之乱，他屡次函劝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等，谓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这种矛盾的行为，他自己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已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是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此可见林纾之注重道德人格。他的矛盾，其实也是社会文化转型期一些知识分子面临

---

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严复致张元济函第1卷，1899年，见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陶菊隐：《六君子传》255页，中华书局1948年。

的典型矛盾。张元济也不完全能超脱于此，譬如在新思潮激荡而来时对传统解组后如何重建的忧虑，矛盾的心理，如王国维所云：“可爱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爱”，也反映着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恐怕还不是一个“顽固守旧”可以解释的。张元济虽然欢迎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仍与林纾保持了旧谊。

说到晚清以来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困难，关于思想意识的紧张、冲突以及迷茫，处于风云变幻历史情境中的梁启超，体会可能比严复、林纾还要复杂。梁启超与张元济的关系可上溯至一八九五年左右，那时张任刑部主事，梁进京会试，思想上都倾向维新变法以求自强之道。梁虽会试不第，却积极追随康有为，他的宣传维新变法的那支笔很会写文章，因其才思敏捷、文字热情犀利，声名大著。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为实现其君主立宪的主张而勤于著述。张元济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不完全一致，但对梁的精神和学问是感佩的，因而一九一一年游欧美之行船过日本神户还专门会晤了梁启超（后存待记云“谡谡松风满寓庐，主宾笑语晚来初”），约请梁为商务著书、写文章。民元后梁启超归国，于政海漩涡中沉沉浮浮，但张元济不问政治，故一时过从不密，至梁氏因反袁世凯帝制而南下参与护国军之役过上海，张访梁，表示将尽力相助，并于尔后出版了梁著《国民浅训》、《饮冰室文集》等。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故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譬如，二九一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一九二二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又譬如民元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战国时代的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氏曾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析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这倒真是其人的坦率处。话虽说如此，梁启超毕竟是开风气的人物，他不断寻求新知和济世之道的努力，既有其一定的历史作用又有其学术贡献，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张元济与梁启超是契合的。自一九一八年宣言放弃政治活动转向学术研究后，梁启超与商务的合作显然密切了。他从欧洲游历归来，即倡议举办共学社，译述外国的新学说，张元济表示支持，于是有以翻译为主的《共学社丛书》八十余种出版。梁本人也在商务陆续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其它历史和佛教内容的著述。

张元济很推崇梁任公的文字，当时给予梁最高的稿酬，还资助共学社邀请柏格森、罗素等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张梁交谊一直维持至一九二九年初梁启超病逝。梁病笃消息传出，张元济致信胡适，嘱托：“公到日如尚及见者，千万为我道念。四十年旧交，不能与之握别，甚至咎也。”按说，张、梁二人的性情大为不同，但彼此之间不妨投契，这恐怕同张元济在与人交往时注意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有关。他是一个审慎的有限主义者，他的活动世界主要同文化学术的建设和传播有关，因而避免了卷入历史诸多的恩怨是非。

如果说张元济是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那么这种开拓如果说是成功



的，具体看，必然包括一种“沟通”的意识与能力。若不善“沟通”，眼界、手笔难免狭仄和小家子气。有的人是学问家、著作家，但搞不好出版组织，盖因扮充社会角色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风格。张元济一自进入商务，便十分注重“沟通”，譬如出版与教育的沟通、学术研究和普及知识的沟通，以及雅与俗、中土与域外、新知与旧学的沟通。自然，作为沟通的“桥梁”，为人处事之性情便不能太偏执，而张元济的涵养正体现于此。虽然他可能算不上某方面的专家，却能称得上“通人”、“通才”——沟通各方面人才的人。例如，一九二一年以后，张元济和高梦旦都感于时势所趋，深恐脑筋陈腐，影响商务之发展，故急切想引进人才。他们觉得胡适是编译所长的合适人选，便力邀胡适南来。胡适自然是新派的路子，但不算偏激，当时才三十岁。胡适本不愿进商务，耽误自己的事业，婉辞而难却盛意，便于暑假中间到商务考察了一下。张、高二位真是诚以待之，无奈胡适终不愿接任，转荐了王云五。从胡适的日记中可看出，他对商务的情况是不大以为然的，如说“翻看他们的中学教科书，实在有许多太坏的”，又如对商务所编字典的批评。但张、高二位礼贤下士，始终十分客气，并听取了胡适的改进编译所的建议，临走致送一千元（胡适只收了一半）。

不久，张元济又赴北京，通过郭秉文的介绍，商请当时来华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罗（Pauli Monme）担任商务顾问。在会见时，张元济说：“二十年改革教育之制，余亦与闻。二十年迄无成效。今世界大势变更，我国教育未上轨，不能不急图改良。本馆教科书，约有七成供全国学生之用，自觉责任甚重，愈觉兢兢。公司董事特属我与邝君特来求教。”孟罗并未接受聘请。由此却也可见张元济为寻求改良而求与外界沟通之苦心了。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广集贤才，各展所长，在张元济的引导下，商务的编辑与作者阵容，大抵能荟萃一时之选。《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间，先后有陈布雷（后任国民党中央书记长）、周昌寿（物理学家）、谢六逸（日本文学专家）、杨贤江（教育学家）、郑振铎（文学家、藏书家）、周建人（鲁迅胞弟）、周予同（经学家）、李石岑（哲学家）、王云五（后任商务总经理）、杨端六（财经专家）、朱经农（教育学家）、唐钺（心理学家）、竺可桢（气象地理学家）、任鸿隽（科学家，后任四川大学校长）、周鲠生（法学家，后任武汉大学校长）、陶孟和（社会学家，曾任北大教授）、顾颉刚（历史学家）、范寿康（哲学家）等进馆。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五四”之后，正是国内文化知识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新人（许多是自学生）和积极引进新思想、新知识、新形式的时候，而张元济的“沟通”，显然意义颇不寻常。这意义并不仅在于以一传统儒生绅士而能牖启新知，顺乎潮流，更重要的是，当现代中国的不同意识观念之间，彼此日益紧张、斗争以至非要你死我活时，却在这儿持守着“对话”的精神，“宽容”的文化态度。

坚持此种态度，且行之有年，张元济的恒心，体现于出版与学术的沟通上，具体说，是介绍“西学”，不忘“中学”。实际上，“西学”与“中学”的价值比较及认同危机，晚清以来久已成为令思想界彷徨不安的大问题。由于西方文化的挑战偕兵舰大炮而来，中国的反应又是无力的，“西盛中衰”

---

《胡适的日记》（上）162页，中华书局1985年。

《日记》（下）799页。

便不免逐渐成为趋势，张之洞曾提出“中体西用”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力用——以保持平衡，在新与旧，西与中，守常与趋变，向心与离心等两种思想进向的冲突中作调合。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他这想法，不能说无道理，却不免有很浓的实用的折衷的色彩。由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的失败，历史表明“中体西用”的路走不通，于是有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化的努力一直很曲折，也包括中学与西学、体变与用变的冲突未获得解决。

就张元济而言，他的倾向，从他做京官那时起，就主张更多地了解和接受西学，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良，特别是教有的改良，但他一是赞同这种改良是渐进的，二是不主张抛弃中学，抛弃传统文化、学术中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民族的历史。当然他并未处于那个时代政治与文化斗争的中心，他给现实开不出药方来。毋宁说，他只是希望既引进西方的思想学术，又保存传统中学的遗产，在沟通中通过民智的开发，自然地促进社会的进步。

因此，从清末至民初，无论世局潮流如何变动，张元济作为出版家，都没有改变上述的基本想法，仍以“沟通”为文化职志所在。他与严复、林纾、梁启超的交往基于此，“旧亦供新用，新仍溯旧知”。此外，张元济与夏曾佑、伍光建的交谊也值得一提。夏曾佑，字穗卿，是光绪进士，一八九七年与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思想倾向维新，他是最早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由张元济促成，夏于一九二二年撰成《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史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张元济为该书写序曰：“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一度，夏、张与伍光建同住上海张家花园（道台张叔合的园子），常相往来，商讨编写教科书事宜。伍光建字昭宸，同严复一样曾留学英国、学海军，长于翻译，于中西学均有造诣。伍氏与夏曾佑皆曾随“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伍为翻译，夏为总纂官。后来夏写了中国史教科书，伍则写了《西史纪要》。张元济还约请伍光建编写了中学理科和英语教材，并于林译小说之外，鼓励伍光建用白话文翻译了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和续篇《二十年后》（一九一七年出版时题为《侠隐记》、《续侠隐记》），是为中国第一部白话翻译小说。

## 第七章 落日楼台

### “后商务”时代

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于辞意甚坚，张元济终于交卸经理职务，改任商务监理，算是退居二线了。这番变动的主因在于张与总经理高凤池的矛盾难以弥合，工作常觉掣肘。张欲自家引退，而商务又难以接受。于是采纳了折衷的办法，同意二人皆辞，皆改任监理，由鲍咸昌任总经理，李拔可、玉显华任经理。监理不担负具体管理事务，但对公司事务有监察或指导之责。

这一番变动，张元济可能是乐意的。一来可减轻负担。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二来可培植新进，以谋公司长远之发展，他本人也确实不可能完全摆脱商务去优游林下。不过这一番变动，也许意味着前期商务的结束、后期商务的开始。至少，继任者不可能具有张元济所具有的文化素养、社会资望与广泛关系，而张元济、高梦旦这一商务原有的出版策划的“轴心”，也将告消失，高梦旦与张元济也有不少共同点，“智圆德方”是主要的一个，他们看到时代已在飞速变化，深怕自己有跟不上时代的地方，因而夙以开明之心对待自身之进退得失，不会抓住一点儿小权力不放，有终身制的念头。自“五四”之后，此一感觉更形迫切，高梦旦亦起意辞去编译所长职务，以避贤路。那时张、高考虑新所长之合适人选，莫如胡适，便由高梦旦到北京去敦请。胡适几次婉辞不成，答应夏天到上海考察三个月，“做客、看看、谈谈”，再说。胡适正做着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整理国故”正在瘾头上，颇有风头，心里想着“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因而应邀去商务做编书匠是不大可能的。实际上，张元济与高梦旦并不大了解，胡适其实是不耐寂寞的人，譬如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一九二二年春，他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当时张元济与高梦旦等还谈到，都不赞成胡适办报，因为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据胡适自述：“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戏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这么看，一年前胡适若肯来商务，也怕呆不住的。胡适既南来周旋了一番，终不能上任，总觉有负张、高之望，恰好在上海见到了王云五，认为王云五“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便借高梦旦“准能任此”的话头，转荐了王云五。

胡适捧场未免捧过头，张、高闻言，大诧异，因为他们自命为随时留意人才，竟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王云五确也并非平常之辈，他早年作学徒，上夜校读英文，靠自学成才，十九岁时便当了中国公学的英文教员，与宋氏三姐妹的父亲朱耀如同事，故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还算是王云五的学生。入民国后，王做过政府官员，还当过禁烟特派员，大约也发了点财，辞职后，便在上海读书、译书，为一家小书店编丛书。他自然觉得能进商务任职是个很重要的机会，而张、高两位求人迫切，且以为胡适所荐当出之稳重，故决定聘王云五入馆，先任编译所副所长，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高梦旦辞职，举王以自代，高只任出版部长。王云五进商务后，调整编译所机构，进用新人，出版规划上开始着重教科书外的一般图书和各种丛书，而古籍出版仍由张元济主持。王云五不乏精明头脑，却并非渊博学者，这大概是影响

到商务印书馆经营面貌与企业文化风格的一个变化。另外，在为学、经商、从政几个方面，王云五毕竟有较强的从政意识，而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首脑以及在文化界的影响，又可以以社会名流身份进入政界做铺垫，这也是王与张、高的一大不同。

当然，张元济负有监督之责，他对王云五是信任与支持的，因为王云五很快就表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办事效率，还有商人式的机敏。在王云五的主持下，二十年代的商务开创了大规模出版“文库式小丛书”的特色。如一九二三年出版《百科小丛书》，一九二五年出版《国学小丛书》，又陆续编印《新时代曳地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每种丛书计含百本单册，单册字数约二万，是便于快出书而又成本低的普及性读物，尤其适宜于地方中小学添置，类似于小型之图书馆。这种丛书经逐渐扩充，也为后来出版《万有文库》准备了条件，为编印《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中学生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积累了经验。应该说，“文库”的创意，并非来自王云五，而是由张元济、高梦旦最先筹划的。如据《年谱》载：一九二一年一月，张元济与高梦旦商编丛书，高建议编一种哲学、教育科学丛书，选西人名著，“托胡适之等人代办主持”。先生同意“只以新思潮一类之书选十种八种”。另拟编每册三四万字之小丛书。又：一九二二年三月，梁启超来馆，先生、高梦旦、陈叔通与其晤谈，商编小本新知识丛书等事，先生谓丛书题目范围宜窄，如“过激主义”、“消费组合”等，“要读者易于了解”。梁则“意欲分两种，一为此类，二是历史类，每册约十万言”。此事后又议过多次，如一九二一年六月，商务董事会第263次会议，黄炎培云：“吾国教育未能遍及，故普通常识多未通晓，深冀本馆多编常识书籍，以助文化。”先生赞同黄之建议，谓此事久与编译同人筹商，终因难得编辑人才，屡编屡辍。经众讨论，议定以上二事应由编译所研究进行。又如该年七月二十二日，张元济偕高梦旦访胡适，谈编纂《常识小丛书》，翌日，胡适即拟定计划，并拟了二十九个题目。看来，这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也就是后来产生《万有文库》的初议。梁启超也好，胡适也好，有想法而未能进行落实，是王云五上任后将其付诸实施。据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回忆，一九二六年胡适居上海时，还曾把计划拿给他看，上面有张元济的批注六条。胡适主张这种丛书应该通俗、价廉，“要使茶馆、车站之书贩皆乐于兜售”，张元济也赞成，但对两个月内交齐付印能否办到表示怀疑。显然张元济原先比较偏爱的学术性色彩减弱了，王云五借此市大子快上便成为可能。章锡琢对此言及：“一九二一年九月，王云五就任编译所长。记得他就职后曾在北四川路底188号公馆设宴招待所中重要干部……饭后他提出《百科小丛书》的编辑计划，请大家商讨。这套丛书，专门介绍西洋最新的学术思想，每册二三万字，预先拟定有关哲学、文学、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一大篇书目，请各人提意见，并认定自己愿编的书名。这套书……多数是从《大英百科全书》分条译出，这是他后来函译《百科全书》计划的开端。”尽管手段稍嫌草率和图省事，王

---

《年谱》182页。

《年谱》186—187页。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18页。

云五的办事效率还是既使编印小丛书得以观成，也在经济效益上颇为成功。这自然符合一种倾向，即商业化以及通俗化的色彩在文化转变期的出版业逐渐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知识的作用，远远大于作为思想斗争资源的作用。这一倾向已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要求略有不同，包括王云五对几份杂志激进倾向的抑制，表明商务在二十年代的姿态仍是比较稳健的，亦被不满于此种倾向的人称为“保守的面貌”，甚至有人称王云五为商务历史上的“袁世凯”，未免过甚其词了。

不当经理后，张元济摆脱了一些缠身事务，但也没有闲云野鹤可伴，仍是忙忙碌碌。所忙者，一是公司经营上的大事情，如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年两赴广州、香港，为在穗建印刷厂和在港购置地皮筹画、视察，一是为辑印古籍访书、借书，为此而于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二年而度赴京津。张元济为出版古籍投入的精力更多了。作为一旧式学者，且珍爱旧籍，殚于旧籍之日渐放失，张元济浸淫其间，矢志承前启后，一在保存，二在传播，而此事做起来极难，一须有心，二须有财，三须有术，后两条惟个人极难周旋，依靠商务的财力和机构，庶儿可渐次展开。由张元济操持，商务已出版《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及大型的《四部丛刊》，一九二二年以后，按张元济的拟想，还要续出《四部丛刊》的续编、三编，要准备编印《百袖本计四史》，都是大工程。欲着手，首要为版本的搜选，所以张元济同许多藏书家，如博增湘、刘承幹、叶恭绰等保持经常的联系，或为收购，或为借钞，得网罗善本不少。举例如一九二六年一月，傅增湘致函，告以徐坊（午生）藏书将散，有宋版书多种，询商务愿购否，张元济复云“极为想望”，但当时正在考虑收购蒋汝藻之“密韵楼”藏书，再无余力，故张元济还建议“联合同志数人集资若干，为一买书会”，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善本流往海外，购书所需资金不菲，往往是一大难处，就因为购进“密韵楼”藏书，张元济还遭到攻击。

蒋汝藻，字孟莘，是清末民初上海大藏书家之一，他继承先祖之“传书堂”旧藏，又以己之搜集窝之，家中颇得宋刻元刊，其中尤惊目者为宋代周密的《草窗韵语》六卷，故命名己之书斋为“密韵楼”。蒋氏藏书中较名贵的还有《永乐大典》明抄本四册和范氏“天一阁”、陈氏“听诗斋”旧藏，却是流散在外，被蒋氏购集的，蒋曾请著名学者王国维以数年之功撰写藏书志。但到一九二五年时，因事业亏折，将书典押于浙江兴业银行以偿债，后因无力赎回而出售。张元济提议斥资购入，理由是，“鄙意久思再出《四部丛刊》续编，留心访求，已有数年，无如好书极不易得。如能将蒋书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说罢，经商务总务处讨论议决蒋氏书以十六万两照购。

这本属正常的事，却引起一点儿风波。第二年四月三十日，上海《晶报》忽刊登题为《商务印书馆之购书案》报道，言商务股东不满去年购进蒋氏藏书，“以为公司发股东股息时横一公积，竖一公积，扣除股息利息之所应得，而徇一人之嗜好，购此无益之古书至十六万元之多。”显然影射张元济。

翌日，股东年会上，张元济不得不起立申辩：本馆营业向有印行古书一项，仅《四部丛刊》一种收入可达百万余元。

“因此遂思发行续编，然此种古版书，不易搜求，向藏书家借印，亦颇烦扰。适蒋孟莘君家藏古版书，悉抵押于银行家，因有收回让渡之意，于是

以银十六两买归本馆。至言不通过董事会，则此为一种进货。商务印书馆买机器、进纸张，价值再较此为大，亦不必通过董事会。”又谓：“书为公司所买，并非我张菊生携归家中，如今尚存银行库中。至谓一人嗜好云云，因为当时我主张收买最力，或暗射及我。读书人喜欢古书，亦无足异，然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且因是而使营业上有益，则我亦无负于各股东也。”

做一种事业，总少不了许多障碍、磨难，好在张元济没有私念，也不拿做事来投机，也就仍然能坚持下去。实在做不成也就罢了，但只要还可以做，他就无暇旁虑。譬如《道藏》这种宗教史文化史资料的汇刻，原以为影印出版不为难事，只要从道观处借照即可，况而是推广善缘，但一做起来，却阻梗甚多。曲曲折折，捱了五年多光景才搞成。

《道藏》为道家经典的集成，自东晋以降流传渐多。宋代《云笈七籤》曾收入苏州旧道藏经本及台州旧道藏经本各千余卷，是为道藏之始，明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分为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部。最初，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傅增湘提议影印《道藏》，张元济赞成进行，当时傅正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不久，北京白云观的陈方丈到上海，张元济与他一道去仿上海白云观的阎方丈，商定借照，但不久阎又变卦，因有董事陈、葛二人指使拒借。张又去北京，拟借北京白云观本，久亦不能落实，不得已又找上海陈、葛二人商量，无奈总被推托延宕，气得张元济在给傅增湘的信中叹唱“真闷损人”。后陈、葛提出要商务为白云观捐款，张始同意，终因上海白云观方面以《道藏》居奇，“欲壑难填”，作罢论。这事就搁下来了。一搁两年，傅增湘其间因“五四”学潮而辞职，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方又联系在京影照《道藏》，由商务在京的京华印书局代为布置，至一九二二年始得加速进行，好在预约订出了六十部，始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开印，十月出版了第一辑，其周折有如此。张元济最大的出版计划是影印《四库全书》，自然也属好事多磨，努力多年而未能观成。四海不安宁、国家不统一，有志者也只能拊掌嗟叹。

### 孜孜不倦与“东方图书馆”

虽然出版古籍有许多困难，张元济锲而不舍地进行，仍有不俗的成绩。二十年代，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以一民营出版企业之力量作保存文化遗产的努力，不能不说有着特别的执著。与此同时，涵芬楼渐积为海内大藏书楼之一，张元济也成为版本和校理群书方面的专家。他的工作性格，简单说即是严谨、认真，还有耐心、恒心来保障做事尽可能去追求理想。譬如《四部丛刊》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同被认为是明代以后六百年来纂辑文献的四大书。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四部丛刊》亦凝聚了张元济在辨析版本、校勘异同、考证真伪上的功夫，许多书后都附有他的跋文或校勘记，著在编印过程中发现某书有更好的版本，则予增补或调换，甚至不借重新制版。

古籍出版的价值，尤在于徵信微实，从而为文化、学术研究提供较可靠的历史信息；惟其如此，既重善本，且重校勘。但若无善本，校勘则颇不易见功。所以张元济极重视访书、藏书，却又与阔人之玩古董，一般藏书家之

秘赏自珍不同，大抵风雅韵致不足而孜孜不倦有余。纵使收书、校书、印书三者俱多不易，却兀兀经年，不稍懈怠。一九八三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册经整理后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计收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七年间张傅两人往来书札六百二十二通，内容以搜集、讨论古籍版本为主，不辞搏沙之劳，涓流之获，表明在民国初年张元济在这方面所花费的心思精神，海内殆无其匹。

中国历史文明久远，又为文献古邦，但历代兴衰继替，书之聚散每多沧桑故事，大体而言，治世弘文，复继之以乱世毁业，书之聚散如劫运轮口。宋谢肇淛曾云：“大凡尤物，聚极必散。毋论货财，即书画器具，衰集甚难，而其究也，或厄于水火，或遭于兵燹，或败坏于不肖子孙，或攘夺于有力势豪。如隋嘉则之书籍，宋宣和之玩好，李卫公平泉之木石，赵明诚校讎之书刻，以四海之物力、毕世之精神，而一旦浙灭，无复子遗，岂成败自有数那，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载之下，犹且扼腕，何况当时？”这种情况，到清末民初又不免一番动荡重演，除了战乱和水火之祸外，官府及私家皮藏不免辗转散放于市井、江湖，且增加一厄，即文物、典籍向海外流失，大宗者如皕宋楼藏书被日本人购去，零散者亦恐存在不少，抢救之急殆非虚想。譬如张元济便深有此忧，一九一八年九月他听说明刊本《吴兴艺文志补》已为美国人施永高购得，将携回美国，便致函刘承幹，担心此罕见之本将不可复见，提出代为照相，以利日后石印。又听说《永乐大典》三册宝熙将售与日本人田中，“闻之不胜懊丧”，即致函傅增湘，望傅“能仗大力挽回”，“万一不能”，“务乞代恳瑞臣同年允我借影一分，俾不至绝迹于中上”。

可以想见，在上述的背景下（善本书的价格亦随之高抬），张元济为商务购集、借校、出版古籍，实有一般人不甚了解的苦心。清人孙庆增认为求书有六难：“知有此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难也；知好而求之矣，而必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至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探之于书情，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而不能远购，五难也，五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贸购求，每多阙佚，终无善本，六难也。有此六难，虽有爱书之人，而能藏者，鲜矣。”

这是讲对藏书家的要求。张元济除了在一、三两项不能不受到限制，其余则庶几无愧。他与一般藏书家进而不同的是，意在保存，更意在流通。而且，当私人藏书传统正在向公共藏书过渡，文献的使用也逐渐由社会公众来享有时，张元济的努力显然是颇有代表性的，代表了藏书史与古籍出版的新时代。

张元济为搜集善本，与不少大藏书家建立互通信息借书校书的关系，其中早一些的有纓茶孙（艺风堂）、李盛铎（木犀轩），晚一些的有叶德辉（观古堂）、邓邦述（群碧楼）、董康（诵芬室）、傅增湘（双鑑楼）、蒋汝藻（传书堂）、刘承幹（嘉业堂）、宗舜年（咫园）、朱希祖（邨亭）、叶景葵（卷蠹）等。往来最多者，当推常在北方的傅增湘和两栖于上海、南浔的刘承幹。此外与收有钱塘丁氏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也有良好的往来关系。惟独聊城杨氏海源阁（后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两遭匪劫）未得窥其堂奥。

---

《文海披沙》卷六，“物聚必散”条。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84页。

《藏书记要》1—2页。

傅增湘，字沅叔，晚号藏园居士，为清末翰林，曾热心兴办女子教育。他与张元济相识约在宣统三年，其时举行中央教育会议，张与傅同任副会长。民国后，傅增湘热衷于古籍搜罗，因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为元刊本，一为得于端方“甸斋”旧藏的百衲本），将藏书处命名为“双鉴楼”。

傅氏对古书颇有识鉴，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多年专心于此道，故自己收书颇多名贵善本，且琳琅经眼，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故王国维叹唱：“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傅氏亦是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的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其孜孜不倦，譬如民国二年，他由天津赴京师图书馆校书，住馆一百零六天，校书三百口十二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正因为如此，张为涵芬楼采书，为出版《四部丛刊》等书在选目、校勘方面，借助于傅增湘的地方是很多的。二人往往商榷往江晨昏不倦，一旦聚首，几无日不相过从。除了购书事宜，张元济在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源》、《学海类编》、《百衲本廿四史》及印行《百衲本资治通鉴》过程中，得傅氏襄助举措甚多，不能尽言。

为搜罗善本付诸校勘或影印，刘承幹亦慨然允助，以至张元济写信给刘说：“承示嘉业堂藏书与涵芬楼，彼此可订一特约，互相借钞，极所欣愿。”

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祖上经商致富，靠湖丝生意，富甲一方，因向光绪崇陵捐纳巨资，得奉宣统御笔赐书“钦若嘉业”，故额其建于南浔的藏书楼为“嘉业堂”。刘氏自民国初年始大事收藏古籍，最多时达一万二千多部，六十万卷以上，为民国之后私家藏书之冠。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云：“嘉业堂主人刘翰怡，宅心仁厚，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几有海涵万象之势。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于无人问鼎，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积之久，遂蔚成大观，非他藏书家所可及；至其所藏《明朝实录》，《永乐大典》残本，则海内孤帙也。”

刘氏所藏宋、元槧本不少、稿本、抄本亦多，而所藏明本尤多、精华汇萃，不能不令张元济仰重。因为人开明，刘氏于书籍从不深藏秘守，故与张元济讲术“流通”之旨契合无间。查《年谱》所载，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间，张元济曾二十余次致函刘承幹，大都以借书为内容，如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信谓：“敝公司近拟辑印旧版‘廿四史’，向各处搜罗，已影得十余种，所阙尚多。而南北朝六史，欲求印本较好者，尤为难得。曩闻邕架藏有南监‘廿一史’，极为精美，亟拟趋前借观。”两天后，南监本的《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便到了张元济案头。编印《四部丛刊》初编时，刻入刘氏藏书八部，其中宋版二部、元版一部、明刻本五部，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尚书》、《重校鹤山先生大全集》为海内孤本。

书籍，不论新的或旧的，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它们的价值（譬如古谚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轩”或所谓“著书皆为稻粱谋”），书籍都具有一种

---

《观堂遗墨》卷下，《致蒋毅孙札》。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95页。

《年谱》251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年谱》251页。



最重要的属性，即它的文化传承性质，而保藏与流通，适为其不可忽视的环节。也就是文化事业的内容。张元济不为书商而已，也不为一般之出版家，盖因其所经营摹画，总以文化事业为旨归。有人曾评价其进入商务后所做了三件大事，一为编辑教科书，一为重视汉译科技和社会科学名著，一是创办东方图书馆和涵芬楼。这三件，尤其是最后一件，尤为显示其努力不仅是开一代风气，而且是博大的事业型努力。张元济自味自云：“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正因为如此，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乃是一种文化寄托所在。

商务原有涵芬楼作为古籍版本库，一九二一年二月，张元济退居监理后在董事会上建议，将公益基金专办一公共图书馆，经议决通过，此为东方图书馆之发轫。转过一年一月，总务处报告，设立公用图书馆委员会，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为委员，先在公益费中提出四万元，作开办经费，两年内公司每年拨八千元充常经费。至一九二四年七月，图书馆办事章程订立，筹备工作渐次进行，同年，在宝山路公司的对面建筑四层大楼，下面为同人俱乐部，上面为东方图书馆。一九二六年五月二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开幕，并对外开放。

东方图书馆虽为商务的附设部门，它（包括原有的涵芬楼）的建立与对外开放，反映了张元济一贯以文教服务社会的愿望。在“东方建成以前，先生曾倡议在公司楼下专辟一间图书阅览室，又称陈列室，陈列全部本版图书及仪器、标本、模型，读者要看什么书，可向招待员索取。后又倡议举办“巡回图书馆”，将本版图书运至外县开展览。这两件事都是由学徒出身的号称“交际博士”的黄警顽来操持的。“东方”开幕，上海地区有了一所大型公共图书馆，而且与近代以来各地始建的图书馆不同，它具有明显的民间色彩，管理服务均称开明、周到。胡道静先生忆及这所上海历史上最大的图书馆——

从我读中学的高年级到大学毕业的那些年代中，它一向是我亲密的“图书之家”。

一九二六年五月，它开始对外开放。从那时，我就是它的阅览者了。进“东图”看书，要纳两个铜板的入门费，连同来回的车资，大约用掉一毛钱，可是对于我这个矮矮个子的学生想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合算的事情了，因为每次都能读到不少想读而不能或无力备有的书，笔记本上总是密密麻麻的，“满载而归”。

“东图”的藏书，最终达四十六万八千册，在那时候是上海最大的图书馆了，就在当时全夙范围算起来，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那时候的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的藏书数量，也未必逾越于它。还有它的一个甚大的特点，就是那长达四十来米的宽敞的大阅览室，是实行开架的。这间阅览室，除了一扇中门以及卡片目录框和出纳台以外，两壁多层的书架上陈列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常用图书大约有而万多册，那是读者可以自由取阅的，感到十分方便。

“东图”大楼建成后，曾在这里举行过印度诗人泰戈尔访沪的欢迎会，由泰戈尔演说，徐志摩翻译。商务对这种中外学术交流一直予以赞助。不过，张元济对泰戈尔演说抨击物质文明的观点却不赞成，不久，他在一次工程学

---

王绍曾《记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几件事》，《学林漫录》初集，中华书局，1980年。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四部丛刊初、续、三编总目》。

胡道静《我读书在上海的图书馆里》，《上海轶事》，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

会年会上致词说：“闻泰戈尔云：吾国原有之田光树影，鸟声水声，颇以为乐。迨西人入境，工厂夹岸、航舰盈川，失尽精神之乐云云。其实人生必需之衣食住，无往而非物质，又何可须臾离物质？泰氏之言，吾不取也。”此一段插曲记在这里，或可说明张元济看问题的切实。在东方如何现代化的讨论中，他既非“唯心”又非“唯物”，实际上比较早地提出了，可以在保存固有精神文明时，发展物质文明。他这个思路不见得高深，故听者闻之漠漠。另两种观点倒是更有影响。一是说，要保持固有精神文明，就不能让“物质”冲击了“精神”；另一种则是说，要发展物质文明，必须抛弃固有的精神文明。大概，这种对立，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所深深陷入的。

说回来，东方图书馆只是张元济兴办文化事业的努力的一部分。另者，在商务范围内，还开办艺徒学校，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办同人俱乐部，设立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办图书馆讲习所，将活动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摄制电影，将铁工制造部改组为华东机器制造厂等。在社会上兴办了上海国语师范学校，为上海失业工人捐款等。张元济还列名于古物研究社发起人，捐款支持丁文江等人组织考古发掘。

尚须一提，张元济还在一九二三年设计了旨在减轻排字工人劳动强度的新式排字架。这种新式排字架为宝塔形，用十六个分级的转盘组成，结构使用钢材，不似旧式木结构支架那样笨重，每层转盘可旋转自如，工人可坐于一种专门设计的转椅上，排字时不必再终日站立，屈伸俯仰了。张元济还为此写了《拟制新式排字机议》的说明。这虽然不算什么大发明，但以一彬彬儒者、商务元老前辈，而不辞躬自做“下里巴人”之实践，实在令人惊讶。

### 《四库全书》及其它

一九二六年张元济年届六十岁，他已为商务工作了二十五年。循其点滴改良扶助文教的路线，虽然无大事功，商务的发展也还无大颠扑。这也不能算易事，因为那个时代的环境并不好，几乎有十几年，中国都陷于军阀混战或割据中。

那么这家出版公司何以能尚称苟安呢？

说来原因颇多，譬如上海这个地方（有租界）不是军阀们打仗的地方，又譬如，具有重要文化与经济地位的地方单元，虽然属于这个或那个军阀控制的地盘，但军阀无法有效地控制往大学、期刊、出版业及知识界的其它机构，换句话说，权力的干涉是比较薄弱的。再有，商务的主持者实行远离政治的方针，这也并非专是策略，在张元济看来，“今之政府（指北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法。能则摧灭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去而已。”一方面“避”，另一方面，商务进行其稳步的文化建设和商业活动，它的文化和经济地位已较为稳伺。但是毕竟四海不靖，还谈不到一帆风顺。譬如有一件事——影印四库全书——就让张元济屡碰钉子，尝了尝避不开官府而又难打交道的滋味。他后来自云：“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店三藏之取经。

本来，从一九一六年起，为抢救古典文化遗产，商务就已开始注重古籍出版，先后辑印了不少古书，其最著者，为一九一九年开始辑印的《四部丛

---

《年谱》247页。

致蔡元培书（1923.6.17），《张元济蔡元培往来书信集》52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刊》，初编收书三百二十三种，均选用善本，被视为亡羊补牢之举。不过，在张元济想来，这还远远不够。他在一九一六年听说，上海大富商犹太人哈同拟出资筹印四库全书，便觉得作为中国人，实在更应引为己任，于是开始争取影印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巨书。”这部大型文献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类，收书上万余种，清朝乾隆年间纂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部告成，贮于故宫文华殿后文渊阁，后又陆续缮写六部，分贮于盛京（奉天）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晚清战乱频仍，四库全书亦遭劫难，文源阁本与圆明园一并烧毁，扬州文汇、镇江文宗毁于太平军之役，杭州文澜亦遭兵燹，掠毁殆半（后经丁丙、钱念幼、张宗祥等补钞，由浙江图书馆度藏）。北方三阁，文渊、文津民初时犹存大内，文津后移交京师图书馆，文溯辛亥后曾运北京，一九二六年复由东北取回，也都有散失亡毁的危险。

一九二一年徐世昌当国，一度企图影印“四库”，盖因法国当时拟退还庚子赔款，此款可用为影印费用。北洋政府为此决议依原式影印，拟交商务印书馆承办。张元济为此曾于该年十月赴北京与北洋政府方面朱启钤、叶恭绰商议。但按当时所拟格式，略照原书大小，估计成书百部，需款三四百万元，费时廿载，如是浩繁，绝非商家能力所及，故张元济表示“一家总难担任”。此时遂搁置，政府拟自行设局，然亦未进行。

一九二四年，旧事重提。适值商务建馆三十年纪念，张元济拟议影印“四库”。经与清室内务府协商，允借文渊阁本一次运沪。由于计划将版式缩小影印，可省成本、工期，大抵五年之内可竣事。几经磋商（高梦旦赴京联系）后，订立了领印办法，并报北洋政府国务院及内务部、教育部、交通部备案，而且准备了运书的专车。眼看谋求有望，忽然又起波折。缘当时之总统府秘书厅发出公函，查禁“四库”出京。表面上是说“爱护古籍，格外慎重”，实际乃贿选总统曹锟之秘书长李彦青，人极贪墨，因向商务索贿未成，故横生枝节，阻其事。张元济闻之，急电国务总理孙宝琦等，陈述原委，奈何孙以为难种种借口延宕，事遂又搁置。

到了一九二五年段祺瑞执政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叶恭绰又通知张元济，政府有意允印四库全书，商务遂派李拔可赴京交涉。先拟商借印京师图书馆所藏之文津阁本，嗣该馆暗中反对，故又有影印故宫藏文渊阁本之意。后终商定查点文津阁本，订立合同，准备运沪。不料江浙战事忽又爆发，路运中断，计划又告中止。到第二年，北伐战争由南而北，风声鹤唳，北方政局翻覆已在朝暮之间，商务再提履约之事，已不可能付诸实施了。

张元济半生致力古籍出版，努力不懈，也多半能有志竟成，惟独影印四库全书之举功败垂成，未获实现，实为大憾。所幸者，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商务得以据文渊阁本辑印了《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夙愿稍偿。但旋因抗战发生，未能继续。附带说一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迟至一九八六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时距张元济致力于此已届六十余年了。

话说回来，正当影印四库全书困难重重时，商务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麻烦，开始是一九二五年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内发生工潮，由于一名工人被枪杀，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发展为包括罢工、游行和抵制洋货在内的反帝浪潮。五月三十日，正当大批学生在主要街道上示威游行时，工部局巡捕突然向他们开火，有十三人当场死亡。这一流血事件迅即激起中国人的愤怒。一时，

上海全市总罢工，商务也被卷入风潮。当时，编译所的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等人还编印了一份《公理日报》，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张元济等商务领导层人物暗中予以支持，但亦为罢工问题所困扰。

“五卅”事件是一导火索，标志着中国社会民众运动开始有组织地崛起。实际上在此之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已经在广州组建，工会运动正在成为上海的新事物，而且必然会向企业中扩散开来。“五卅”运动好像推了一把，结果之一便是商务印书馆工会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成立。工会显然是以共产党员秘密组织为核心的，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任委员长为廖陈云，他（即陈云）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商务工会成立不久，八月二十二日，工会组织了全馆大罢工。这次罢工与以往声援爱国反帝运动的罢工性质有很大不同，它是有领导和组织，有权利要求和条件的一次典型劳资斗争。罢工者向馆方提出的复工条件，主要有要求公司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职工之权，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等。编译所的编辑也卷入了工潮。因罢工正值八月下旬，直接影响到九月新学期教科书的供应，故令商务当局十分头疼。劳资谈判，资方代表为张元济、高凤池、王显华，劳方代表有王景云等十二人，其中还包括沈雁冰、郑振铎。沈雁冰曾说：“商务印书馆罢工是党发动的，意在重振‘五卅’运动以后被压迫而渐趋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党中央派了徐梅坤在罢工委员会年组织临时党团，实际领导罢工斗争，我也参加了临时党团。”由此可见，这次工潮的目的并非局限于罢工的经济目标本身。

对于张元济来说，作为资方代表，他不能不考虑公司的利益，然而这种现代劳资斗争他是从来没有应付过的，大概只能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去平息风潮了。

按说，作为一家民族资本的出版企业，商务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不能算很差。譬如，每天九小时，每周六天的工作制按当时的标准看，是十分充裕的。工人每月工资收入从十元（新满师的徒工）到五十元（熟练的工头）不等。每年有国庆、新年和四天春节的假日，还可给予五至十天有薪的婚假或父母、配偶的丧假。女工有两个月无薪的产假，但可得十元喜封。尚公实验小学设有奖学金，对低工资工人的子女有助学金。它附设的幼儿园是免费的。公司在印刷厂设有诊所，每次仅收三分钱象征性的诊费。所以一九二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杂志还刊发过一篇称赞商务福利计划的文章。

尽管如此，商务仍是资本家的公司，它需要赢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里存在着剥削。而二十年代中期，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和阶级斗争意识已开始在中国传播，劳资关系失去了昔日的稳定，因而商务工潮之来亦非偶然。

几天后，经过谈判，劳资双方互有让步，达成妥协，工人工资得到较大幅度提高，工潮遂告暂时平息。还不清楚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他在达成协议时发言，希望公司同人多注意和维护公司发展之可能，委婉

---

茅盾在《“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一文中回忆：“《公理日报》之创刊，商务印书馆当权者曾给予经济上之支持，此是动用公司公款的。此外，张菊生、高梦旦、王云五每人亦各捐一百元……但商务印书馆不肯承印此报”。

见《商务印书馆大事记》1925年条。

叶未曼璜：《从翰林到出版家》192页。

地表达了他的“同存共利”的苦衷。但时过不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末又发生工潮。

这一次起因于年终馆方辞退工人，工会方面以罢工表示拒绝，并提出增加工资要求。

商务董事会开会，张元济报告罢工情形并提出：“此次罢工要求被辞同人复职，实无办法，元济等再入思维，此无非由于办事人处置无方，只得提出总辞职。”董事会讨论后议决，辞职事万难应允，如不得已只有暂行宣告体业。这次资方不愿再让步。但是张元济对事端持和平解决之基本态度。经理王显华则主张用强硬手段平息工潮，以至调动驻厂军警开枪打伤数人，拘捕数人，使事态恶化。张元济闻讯声泪俱下，坚主和平谈判，委托夏瑞芳之子夏鹏等到厂协商，作出决不带走一人的保证，谈判得以进行。经彼此让步，签订协议，风波始告平息。

工潮中张元济虽然人望不低，得到工人的拥护（职工大会上全场高呼“打倒王显华！”“拥护张菊生！”），但也颇受刺激，处理劳资纠纷的两难困境，使其心情低沉，渐萌退意。罢工刚刚结束，他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致董事会函：

现在潮流甚激，断不能以一二十年前陈腐之思想、简略之方法与之周旋，必须开诚布公，一切为根本之解决。公司组织亦不能不大加改革。改革之事恐非吾辈脑力之所能。窃谓欲保全公司，不能不易旧制度，尤不能不用新人才。  
此时他在考虑辞去监理职务。

### 退休

张元济曾同高梦旦有过约定，约定二人在六十岁时退休。恰好，一九二六年他按中国传统算法六十岁了，工潮过后四个月，上海《申报》、《新闻报》同时登出了《海盐张元济启事》，启事说：

鄙人现因年力就衰，难胜繁剧，所任商务印书馆监理之职，已向本公司董事会辞退。

四方人士如因关涉公司事务有所询商，务请递函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勿再致书鄙人，免致迟误，谨此通启。

在董事会尚未接受其辞职的时候，此一公开声明，既是不寻常的，也表明其退志之坚，所谓“断无出尔反尔及名去实回之理”。

张元济忽然宣告辞职，引起馆内同人、董事以及各地股东的关切，纷纷表示挽留。连夏瑞芳夫人鲍金玉也出面来劝说，胡适亦从北京来书，“盼先生再支撑几年的辛苦”。面对各方殷殷挽留之呼声，张元济不得不做出解释。此次抉择十分认真，但个中心情亦颇复杂，所以有时自白“现在精力渐衰，迥非昔比”，“与其尸位素餐，不着早避贤路”；有时则说：“未尝不思再支撑几年，但干事实上，再做下去，恐有损而无益”；有时则说：“我既悲观，故打不起精神。”实际上张元济的心理久已被忧虑所笼罩了，他感觉将

---

《年谱》261页。

《年谱》262页。

年谱》226页。

夏鲍金玉书》，《年谱》267页。

复胡适书》，《年谱》269页。

日记》（下），840页。

很难与变化急剧的现实相适应，此时退身尚未为晚，而促成决定的直接动因，则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股东年会。

这次会议，高凤池为议长，由王显华报告上年营业概况，由于高、王等坚持，不顾张元济反对，股东会通过了《修改股息公积办法案》。原案是一九二二年由张氏提议设立的。主要内容为：（一）公司嗣后追有盈余，分派股息至一分以上时，应酌量提存股息公积。（二）股息公积除积存巨数，于扩充股额改作股份，或遇股息不足一分之年份酌提垫补外，非经股东会议决，概不提用。这是一种增加积累的办法，便于长远发展和安不忘危。但是此办法为一部分股东所不满，股东总是想多分红。故争吵了几年，终于决定修改原来的办法，规定：（一）股息公积专备股息不足一分时填补之用；（二）股息公积每满三年，将已提存之数分配一次，或分配现款或改作股份，其息全随同一并分配。“张菊生先生对此竭力反对，曾作通启一篇印发各股东。旋因监理高翰卿彼推为股东会议长，经理王显华附和 high 氏，力主分配，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张氏大愤，即于翌日登报辞去监理之职，固留不允。”时有董事认为“张氏固执已见，虽一厘之微，亦不肯稍予通融，甚至负气退席，器量未免太狭”。而张元济觉得，如此眼光浅近，事关公司大计，这不过是一个开头，自后同事者宗旨将益见睽违。其引退倒也并非仅仅出于负气。譬如他希图通过此举而唤起对公司改革旧习，拔擢人才的注意，是有所针对的。并非仅对一时一事而言。其辞职书云：

……抑元济更有请者，现在时势不同，思想解放、无论何事断不能墨守一二十年前陈腐之见解、简略之方法，以为因应之具。商店工场规模较大如本公司者，元济愚见尤必须用科学的管理，诚心的结合，勿以喜怒为赏罚，勿以恩怨为进退。虽然，言之匪艰，行之维艰，果欲行之，不能不破除旧习，不能不进用人才。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张元济辞职被董事会接受。正式退休。但不久便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退休的另一余音是，张元济亦不肯接受特别照顾和优待，要求退俸金照普通同人定额裁定，绝不肯接受公司给予的酬庸。在利禄一途，张元济个人始终不仅忌贪，而且守拙，他不肯改变素守的传统道德观念——“元济幼习诗书，窃思勉附于辞尊居卑、辞富居贫之列。昔年投身公司，绝迹仕宦，即是此义，至今未改。君子爱人以德，甚望董事会之怜其愚而鉴其诚也。如必相强，有于普通定额之外增加分毫者，元济只可缴还公司。”

在进入花甲之年时退休，虽然并不意味着人生连续性的中断，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但是一个主要的人生阶段毕竟可以说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古语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三十年时光，张元济是与他的事业共度的，其中二十五年与商务印书馆荣粹相关，这就不妨稍加回顾。

在那二十五年里，显然，张元济并非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其人经历中亦无戏剧性的起伏，跌宕，或者就不妨说近于平凡。但是平凡不等于平庸，这种平凡似乎还有一种独特的意义值得言说。如果简要而言，那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刻露于人生表面现象，那种显而易见的，相反，它沉潜于历史变迁的

---

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35页。

商务印中馆大事记》1926年条。

年谱》277页。

深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就很容易忽略过去。其实，他的主要努力，属于中国由近代走向现代进程中的一种文化选择，也是一种精神的探索。尽管张元济并非思想家，并且未曾对自己的选择作过理论阐释。

事实是张元济在仕途遽然中断后选择了出版——几十寒暑将心力抛掷于此，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开拓者。职是之故，一般都视之为出版家。不过，我们知道，出版家虽不同于书商，以常情而论，大抵其努力仍限于书籍的编辑、印刷、发行几个环节，而张元济的工作空间与精神空间显然要大得多。他是个出版家，但不仅仅是个出版家，正如说他是藏书家又非一般的藏书家，是实业家，又非一般的实业家。总之，二十五年中张元济所投入的领域，大概可称之为泛文化领域，其经历平凡，却不一般。

譬如，关于参与、组织和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若是一般出版家，其业绩大抵也只在经营方面，而商务之由小到大，有着独特的经验，它先是以合资的方式，引进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逐渐发育为成龙配套、结构合理和进行现代方式管理的企业集团，进而又保持了民族资本独立自主的性质。这在中国现代早期工业化的历史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的“引进”意义，恐怕不仅在出版方面。

再者，主要由张元济规划，商务的出版物形成了教科书、工具书、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译介以及中国古籍几大系列，并且较早地着眼普及型知识丛书。这些事情可以说是文化工程，在晚清以降尤其是科举制废止以后的文化转型时代，其启蒙意义更是超出出版的范围。

第三，张元济与一般出版家不同，除了一开始就抱定以出版扶助教育的宗旨，还围绕出版尽可能地致力于社会公益。在他的推动下，商务建立了各种学校仍制造各种仪器、文具、.. 玩具，拍摄电影，建立藏书楼、图书馆、俱乐部，这些活动的文化事业性质，也还不是一般出版家所愿意和能够做的。

视野、境界、“手笔、之宽，培植之厚，你不得不说，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恐怕我不出第二个人了。

不仅以“出版家”来为张元济定位是不确切的，实际上，称其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者“卓有成绩的实业家”，都不大合适。在人生大剧场里，也许可以说，他的特别，正在于某种“出格”——不符合世俗对“角色”的一般性理解，用决定论的眼光来观察这样一位有个性色彩的人物，也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按照决定论的认识或者世俗成见，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尤其是已历仕宦的士大夫，不大可能降格去从事实业活动。在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久矣，所谓“士、农、工、商”四民，“商”排在最后，地位向来不高，故前儒贱商观念甚深，如陆游的家训便叮嘱子孙“不仕则农”，“但切不可迫于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晚清以来，这情况虽颇有变化，工商地位渐渐抬高，但具有一定产业资本和经营工商业的人，除了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与洋行买办，其间读书人寥寥可数，而越过藩篱的，如当过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的郑观应（他著有《盛世危言》），如“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亦如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都可以说，离开了传统士子的道路，寻求富国利民、改良社会的新路，其间也包括知识分子除了依赖知识的价值之外寻求新的谋生方式与入世方式。当然，张元济式的选择又并非以谋生、

谋利为目的，他参与经营和培植出版企业的特别意义更在于，当传统的“君臣依附模式”逐渐解散，知识分子借助政治来卖现其自身价值的可能性日益减少时，足以使人安身立命。再扩大说，“经济利生”与“救亡图强”这种近代历史的主题，张元济与其他的爱国实业家，是以这样具体的努力方式去理解的，尽管历史环境和命运并未保障其获得巨大成功，他仍然至少通过自己的事业摆脱了依附性而有所作为。换句话说，如果人往往被动地被“角色”所规定，而张元济却主动地创造新的“角色”——既非局限于士大夫的道德自律的精神天地，而不能开展出新的经世致用方式，又非陷于重利轻义，仅仅成为俗商，相反，他的大半生活动，表现出术不离道，援术入道的色彩。

所谓“道”，既可以说是一种“终极关怀”，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合理途径。在这一点上，选择的冲突在近百年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浮沉不断。读史者不难清理出诸如此类的矛盾：常与变，传统文化情结与西方文化冲击，改良与革命，救亡与启蒙，等等。晚清以来，社会思潮震荡不已，往往与此类矛盾的激化紧密关联。从那时起，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也在艰难中走过了好几步，开始是着重器物层面的变动，如洋务运动搞坚船利炮，“师夷长技”，弄了几十年，到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惨痛，证明失败了。接着是寻求制度层面的变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改良不成继之以革命，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批判的锐气，卷起思想文化新潮，显然是在价值层面引起更深刻的变动。历史确乎是在进步，许多人进行了探索，并高扬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造理想。但总的看，理想目标与现实途径之间存在着不易一下子消除的距离，矛盾也总是远比想象更为复杂，而急剧的变动亦造成了“无序”的趋向，实际上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包括一种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否定，推动不断的社会政治、文化革命，亦是关于现代化进程历史反恩的内容。在近现代文化变迁之中还不难发现一种有意味的现象，即许多前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怀有使命感，去从事文化启蒙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忏悔意识”，愿意失去自己的个性，顶礼于大众，从而投身于阶级群体，投身于社会革命。这也内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上述的历史大背景上，张元济却保持了独特的姿态。其独特，既不在于他是一位建立业绩的出版家，也不在于其人对政治和个人名利的淡泊，而是在于思想性格的开放性，也可以说是思想和行为总是结合着中庸之道。人，虽然也处于世潮之中，却未落于偏执。换句话说，许多时代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它们使人们不得不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在他那儿却得到了“调和”。“调和”，亦即并非“非此即彼”的意思。张元济从来都是穿着长袍，从来不写白话文章，但他也从来都不排斥新的思想知识。譬如，胡适曾为商务印书馆拟议出版《常识丛书》，初定选二十五题，张元济批注“拟加《布尔什维克》，或仍称‘过激主义’”，他当然不会信奉过激主义，其思想之开放性，由此却可见一斑了。

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编译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书籍，你似乎由此不难得到印象，即张元济一定是有着“西化”色彩的人物，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其人其事，又对传统文化典籍文献的保存和流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就持守传统的人生原则而言，他确乎属于时代变迁中的旧人物，就“与时俱进”、“适应潮流”而言，他又是个新人物。似乎新与旧也不是不可以调和的，正如他经营出版企业时亦未忽视“利”与“义”的统一。



当然，凡此种种，又与做个随波逐流的“和事佬”不是一回事。张元济有他自己所一贯坚持的东西，譬如传统的道德精神，譬如扶助教育，开启民智的服务社会的大目标，不过，这些东西，在他看来，与思想的开放性是不矛盾的。同时，坚持意味着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的努力去影响社会，他仍然相信，改良是有希望而且可取的，尽管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很大，也不会诉诸激烈的手段来改变现实。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张元济从而表现了超然的立场和君子风度。也可以说，这种边缘状态恰恰体现了一种个性，作为开明知识分子的典型，注解了“有为有弗为”这句老话。

## 第八章 沧海又沉浮

### 一九二七：动荡与不安

年历翻到了民国成立后的第十六个年头——一九二七年。这一年，张元济卸职退休，同时又是发生重大历史激变的年头。

几个月前，商务董事特别会议议准张元济辞去监理职，旋又选举张氏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张氏仍居顾问之位，而以前经手之事亦须继续料理。毕竟，与商务印书馆二十余年感情深结，撒手为难，张元济也不情愿。他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纪念会上仍代表公司发言，提倡诚意合作：

在十余年前，同业迭起，记得夏瑞芳先生曾说过：“本馆日益扩充，譬如行舟，大者掉转不灵，恐被其它小舟追上前去啊！”现在我们公司更大了。不是更为可怕吗？不然，我们全体的职工，已实行“扬帆同舟”主义，就不怕了，夏先生在冥冥之中，当亦可以安心。

本之诚意，求得安心，希望如此，不过也还来之不易罢了。令人忧心的是，社会环境不安定。

张元济退休之后，除每月须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仍与傅增湘、朱希祖、伍光建等经常书牒往来，讨论古籍收藏、出版事宜。余暇，常常听戏，对昆曲产生浓厚的兴趣。一九二七年初，张元济曾赴苏州，接受东吴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获此名誉的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基督徒、神学院教授赵紫哀以及做过袁世凯幕僚和民国教育总长的张一麐。

进入一九二七年后，北伐战争已经鼙鼓声声，北伐军逐渐由南而北，一路下武汉，一路攻江西，一路入福建，迫近了上海。实际上在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力图以广东为基地通过军事、政治讨伐重新统一中国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虽然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但他所确立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一场革命的发动与组织随之到来。在准备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组建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任总司令，李济深、白崇禧任正副参谋长，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八个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北伐，攻打盘踞于鄂、豫的吴佩孚军队以及孙传芳的“华东五省联军”。

北伐迅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十一月夺取南昌、九江，十二月福州易帜，第二年二月，又占领了杭州。蒋介石统帅的军队随即推进到嘉兴，目标为上海，占领上海，显然能获得更大的财源与西方列强的重视。而孙传芳亦将上海防务交给张宗昌的鲁军，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为了呼应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并配合北伐，一九二七年二月至三月间，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大罢工和武装起义。起义是由总工会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商务工人亦组织了二百多人之纠察队，参与武装袭击由吴淞炮台开往北站的直鲁联军，战斗中有七人殉难。在北伐军的包围下，孙传芳的部队很快就崩溃了，实际上工人武装控制了城市。但一时间局势是混乱的，随着北伐军的到来，在三月到四月间，在所谓革命阵营内部又出现了关于控制权的残酷斗争，以及激进派与反激进派的力量角逐，最后又导致国共两党之分裂以及四月十二日的流血事件，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行动被镇压。这一由同盟到敌对的转换，可能对中国尔后数十年的政治格局影响至大，后

来者分析一九二七年革命内部的冲突：在权力以及暴力冲突背后，“还隐藏着在大革命宗旨上的分歧，国民革命的目的（至少在其现阶段）是否仅仅在于通过消灭军阀和取消帝国主义的特权而重新统一中国，或者，它是否还应当成为一场旨在解放劳苦大众的阶级革命？”不论怎样说，民国以来的社会虽然因大革命而转向一个新时代，社会矛盾却有增无已，安定局面尚无指望。

自民国以来已经多年不问政治，张元济对时局的看法不免忧心忡忡。虽然对工人罢工持认同态度（如在董事会上说：“此次罢工完全为对外之事，鄙意惟有忍耐、和平，认请同人之意而为要。”）而心绪更多的是不安，这在几封致友人函中时时流露，如谓：“此间谣言甚盛，吾辈皆窠幕之燕，正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默察沪地形势，大祸在前”，“前路茫茫，殊难逆料”。这年的二月底，康有为在青岛病逝，张元济闻之感慨于心，四月十一日有致梁启超书，谓“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这尔作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胜悼借。时局骤变，举国若狂，云橘波诡，不知伊于胡底，避世避地正在此时……”信的内容反映出他比较悲观的心情。直到六月份，才感觉上海情形趋于稳定，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狂风骤雨此间总算过去，以云安稳似比北方为优”。因为战事转向北方了。加上北洋政府面临垮台，许多文化人南下，聚集沪上，胡适也在出游欧美后未回北京，转而定居上海。一时及尔后，上海的文化活动中心色彩益为显著了。同时，上海已是全国金融、工商业的中心，为了适应形势与启我保护，上海的大资本家和大公司在一九二七年采取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并为其垫付了大量资金，譬如新发行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大部分摊派给江浙资产阶级认购，其中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三百万元即包括商务印书馆的二十万元，这是不得不拿出来的。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商联会的团体会员。

丁兹乱世，不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元济忽遭劫难。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晚，一伙持械绑匪闯入张元济在极司菲而路（今万航渡路）的寓所，将其劫持而去。事起突然，不知何故。后来知道是为了钱而绑票，绑匪的目的是获取巨额赎金。

当晚，张元济被劫至乡间（约在南翔一带），生命暂时无虞，然勒索甚巨。第二天绑匪声言索价三十万，继又减少到二十万。绑匪认为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的私产，且称张元济给女儿的嫁妆就值三十万元。把他视为大富翁，要借此好好捞一票。殊不知张元济哪里是什么大老板！

商务印书馆虽然外边的名气很大，但它是一家从事出版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很多，有个经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却没有一个占据大部分资本的老板。而且张元济并非大股东，他的收入主要是薪水和一定的股息、花红。虽然在那时不能算少，却根本不是大资本家，更从无夸富的事。张元济固然与一些大实业家来往不少，联系较多者，有经营棉纺业的聂其杰（云台）、穆藕初（湘玥）、银行家钱新之（永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等，这些人除了致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皆有心扶助文教事业，故来往多与这类事业有关，也并不能说明张元济有不小的财力。张元济在经济状态较好

---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6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簿》，《年谱》284页。

俱页《年谱》284—285页。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12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时（民国初年），曾在极司非而路买了一块二亩半的土地（每亩价二千元），请一家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建了一幢三开间两层楼房，他的私产除了藏书外也仅此而已，故张元济听到绑匪索价之口气，误以自己为大财主，不禁“大笑”，让他们不妨再去查查。

遭绑架后，张元济并未慌张，相反，头脑很冷静，对待绑匪，好像也仍是诚意待之。他在被监守时写信给高梦旦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道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还做了两首自嘲自遣的诗，中有句云：“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过了两天，危机有所缓和，按张元济致汤尔和信（10月28日）所述，“起初，监守甚严，弟告以决不私逃。两日后彼此相习，开诚布公，儿子无话不说。因劝其及早罢手，闻弟言有至泪下者。”绑匪之徒似亦不很凶恶，但毕竟不肯白白放人，惟以赎金降至二万元相讨。捱至第四天，张元济写信给侄儿张树源，希设法筹措赎金。张树源当时同商务一编辑出面与绑匪头目接洽，最终靠典当、借贷、四出设法，凑足了一万元。都已是无可奈何，只得以一万元了结。到第七天上，张元济被赎出归家。

二十年代社会不安定，人之流品混杂，良民因迫于生计化为盗匪，并不罕见。在商务当过编辑的小说家包天笑，其《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中便有一则“路劫记”，说到约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三年间，上海租界内，绑票路劫之案，真个是没有虚日。包氏晚间穿一件皮大衣走路，曾三次被剥，上海白相人的行话叫做“剥猪猡”。张元济以一老先生被绑，安坐家中，祸从天来，也颇有传奇色彩，只是先生素以道德立身，处险不惊，居然从容度过，而且对绑匪颇有慈悲之心，总觉得他们都是失了业的人，虽然做此勾当犯法，更主要的责任还在社会的不公正与国家的贫困。过了十年张元济的内侄许宝骈在京杭道上被绑票，幸而逃脱，张元济写了一则《谈绑票有感》，犹回忆说：“我和绑匪相处尚算不错，他们也说为生计所迫。”他认为消除“绑票”，要治本，在于实行民生主义：“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挺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

遭了灾难，不遑为自己多想，却为别人想，大概是一贯的怨道罢。同时也可见先生的达观知命，难中，张元济还作了十首诗，其一吟道：

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  
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蒙蒙。

真是随遇而安，至于其十所吟，“我是塞翁今失马，评量祸福尚难分”，不能不说是“通脱”了。胡适当时也匣在及司非而路，闻先生归来，读其自

---

张树年《忆父亲张元济先生》《编辑学刊》1993年3期。

《年谱》294页。

《诗文》219页。

《诗文》29页。

遣诗，评之曰：“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胡适还和了一首：“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看六夜绳床味，换得请新十首诗。”第二天张元济又作“依韵答和”一首：“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言六日清闲甚，此是闲中学赋诗。”正如黄炎培来函慰问时所谓“练达镇定，处之泰然”，“令人心折”。

对绑票事件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元济所认同的传统儒家思想和性格，包括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核心仍然是“仁”，也就是一方面通过适宜的知识 and 人格教育，使国民之素质提升，另一方面社会改良须以民为本，富国须利民。如孟子所谓“根本之道”：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人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仍然怀有这样的儒家仁道理想，张元济面对国内并不理想的现实，诸如弭兵无望，文化建设起步艰难，加深了对政治的疏离感，是很自然的。所以由辛亥革命后到一九二八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十七八年间，他渐渐不再与闻国事，而是沉浸于古代文献书籍之中，校理群书，浮云攘攘不入门墙。据先生哲嗣张树年讲，无论什么人当权，只要能使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老百姓做好事，他就拥护。这是很朴实的想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元济对新建立的国民党政府观感很坏，如说“在张看来，蒋（介石）的北伐与其说是一场统一中国的革命，还不如说是像其他军阀一样扩张自己的势力”。其实，张元济未必对此有明确的看法，而且对北伐成功有益于国家多少抱些期望。譬如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致蔡元培信中说过：“近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大局渐见底定，至堪庆幸。”可证他并无成见。蔡元培是一九二六年二月由欧洲回到上海，参加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代的工作，他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后担任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长、监察院长，由于有蔡这一层关系，张元济对新政府的教育工作还有所建言，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内战仍然不止，蒋桂战争又起时，张元济才特别对时局表示愤慨，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指陈战争之祸：“宁汉冲突，吾兄奔走调停，孤诣苦心，世人共见。观今日报纸，战祸殆恐难免。吾兄去宁来沪，杜门谢客，殆因此故。国势颓敝至此，民生困苦至此，而在位者犹欲从事战争，试问天良，何以对国，何以对民。吾兄此时亟宜发表正论，痛斥两造之非，布

---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216页。

《孟子·梁惠王上》。

1993年9月29日与笔者的谈话。

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204页。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72页。

1992年5月17日致蔡元培函，建议检查电影、取缔黄色宣传品，以纯洁社会风气。

告国民，速谋制止之策，并即日辞职，庶无负监察二字之责……。”立论甚正，但大概也只能属于书生之见罢，蔡元培无论辞不辞职，恐怕也不管什么用。所以蔡元培回信也只能表示“不得不以沉默对之”。不久，蔡氏也就卸去监察院长职，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逐渐脱离政治了。

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反对专制，主张开明，张、蔡两位老人的性格一贯如是，然而生逢乱世，徒唤奈何。

毕竟，作为关心文化学术的读书人，即或已经倦于世事之翻覆，也会关心能否有个开明的文化学术环境，以利建设。如同他对政治的态度一样，不论各种思潮、观点之间有怎样的是是非非，他都反对借助某种力量而来的压制。他担心“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专制局面又要回来了”。应该说，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洞见。这类事情果然很快就来了。当然，也还不到五十年代以后的那种程度。

一件事是由顾颉刚引起的，顾颉刚原是“五四”时期北大新潮社的成员，与傅斯年同学，后来受科学怀疑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古史系统产生了怀疑，在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古史辨”学派。其治学态度有个由“考信于六艺”到“考信于理性”的转变，从而提出上古史系统中包含了许多神话传说的部分以及汉代经生出于托古改制的考虑而做的杜撰，因而主张“辨伪”。他的主张在一九二三年间发表时，曾引起学界的激烈争论。那时他正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编辑《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书中未提“盘古”，对“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在他想，“这样做，是商务印书馆里所出教科书中早已有过的，当二十世纪初年，商务印书馆曾请夏曾佑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他编了三册，到唐末就搁笔了。这第一册里有用基督教《圣经》和保罗文洪水传说和大禹治水作比较的文字，总称三皇、五帝的时代为‘传疑时代’，直到周武王灭殷，才称为‘化成时代’，表示其已进入文明世界了。拿我所编的来比他，我并不比他写得激烈。”

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顾颉刚人已回了北京大学，教科书忽遭一位山东的参议员弹劾，说它“非圣无法”，应加以查禁。国民政府的大人物，后任考试院长的戴季陶便据此质难，主张严办，因为这部书前后印了一百六十万部，故处罚商务一百六十万元。消息传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十分恐慌。不得已，由张元济赶往南京，情吴稚晖出面调解，经吴氏说情，从宽处理，免去了罚款，只作禁止发行处理，方了结了此案。

另一件事，钥适在上海当中国公学校长，与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一班朋友办了《新月》杂志，在杂志上讨论人权问题。胡适与了《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并批评了国民党和孙中山，于是酿成风波。一九二九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于此种言论不能允许，先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以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

---

《张元济蔡元培往来书信集》82页。

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九十年》297页。

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胡适不服“训令”，还把公文油印成件分送友人，其中也包括张元济。矛盾深刻，他显然站在胡适一边，覆函云：“顷奉交阅教育部公文一通。与前报纸所载无甚殊异。鄙见窃愿我兄置之不答，正所以保我尊严也。犹忆数年前美国某邦，不许学校教师讲授达尔文学说，世界认为奇谈。以彼例此，均听其留作学术史之资料。供后之评议可耳。”张元济大约相信历史进步的趋势，终究会使任何文化思想的专制归于渐灭，徒成话柄，时间才是公正的，然而，现实往往不能理解这一点，与愚妄之人作争论也就变得无甚必要。

同时，并不理想的是，历史的循环（如“一治一乱”）亦有一种必然性。以往，一种统一的秩序，往往亦伴随着“君尊臣卑”以及“阳儒阴法”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格局，自由与开明的限度往往就很大。汉宣帝就曾坦率而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张元济虽并不深研政治思想史，但对此亦有洞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便谈到这个问题：

“昨日下午收到中古哲学史第三、四章的大稿。随即钉成本子，一口气读完。晚上临睡在床上又重读了一半。觉得那李斯一节，说来最透彻、最和平，真是有价值的。现在一班屠狗卖缯的和那乡下老太婆（我想吕雉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会卖俏的姑娘，所以会给刘邦看中）都上了台。而且人人都要想做孔子诛少正卯，又要将那二千年前的故事扮演一回，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专制局面又要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这怎么好！……”

这一关于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隐示的性质所怀有的忧虑，也是时代性的。此种忧虑似乎作为重要因素，使其与时代之主流思想逐渐加深了疏离感。人身的被“绑票”，用金钱赎回，而思想的被“绑票”，则须以自由为代价。张元济对一己之得失如果说是达观的，而进入晚年之后，对时势则每每悲怀不能已于然。

### 海外访遗编

张元济在二十与三十年代之交的悲观，伴随着其人三十年的生活体验。显然，与他的生活选择及理想目标联系最紧密的，是朴实的民主主义和国民文化启蒙的旨则，也是造成其人开明思想性格的核心。而这种心思愿望，又恰恰与晚清及民国历史变动过程难以衔接。张元济与他的朋友严复和梁启超有所不同，就严复而言，“价值、制度和观念——文化的整个内容——必须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能保存国家并使国家强大吗？”梁启超也像严复一样，“站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主流之中”。他认为，“人类如果不忠于或超越于民族国家的聚焦点，只是种蛮夷的反映。这样，民族国家成为梁启超的‘终极共同体’。”而同样作为维新时代的过来者，以张元济之开放性格，却希望周围世界应该是一个更加容忍，更易理解的世界。换句话说，民族国家的基

---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48—550页，中华书局，1997年。

《张元济书札》162页。

《书札》163页。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4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157、167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

本目的不是使国家荣耀，而是实现使人民生存发展和进步的承诺。正因为如此，张元济在三十年代关于专制与民主的讨论中，比较倾向于胡适的主张。胡适曾认为并不能靠武力来实现国家统一，统一中国的唯一方法，“简单说来，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的‘公忠’去代替今日的‘私忠’。”张元济并不参加诸如此类的争论，但他在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称：“近人好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间，胡适居留上海，与张元济交往密切。胡适自云：“每念及在上海三年之寄居，得亲近先生与梦旦先生，为生平最大幸事，将来不知何时得继享此乐事，念之恍然。”但是张元济虽然欣赏胡适，却不可能如胡适那样不能忘情于世事纷争，去把自己的学术事业牺牲于思想斗争，正如他劝告胡适的：置而不答，正是保我尊严。消极他说，他逃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积极一面说，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如胡适《述陆贾的思想》一文所评价的——陆贾“圣人不空话，贤者不虚生”之人生观，最近于先生处世之精神。

关于张元济主张的“默”，胡适曾为自己辩剖说：“事业是争出来，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老虎乱扑人，不甚可怕，可怕者，十年来为烂纸堆的生活所诱，已深入迷阵，不易摆脱。心挂两头，既想争自由，又舍不得钻故纸，真是憾事。素知先生富于积极精神，故敢发狂论，千万请鉴察。”胡适那种“心挂两头”的矛盾，张元济似乎是排除的，他开始越来越专心于校理和出版古籍。这也不失为积极精神罢，虽然并不表现在治国平天下等等。

说到辑校古籍，在张元济主持下，工作已陆续进行了十五年左右，分别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二年开始辑印的《四部丛刊》和《续古逸丛书》成绩显著。既得到鼓励，张元济又有心专注于此项事业，就准备积累地做下去，意义是不待言的，譬如《四部丛刊》未收的“二十四史”就需抓紧校辑。自然这又绝非省事的工作，因为并非一般的影印或排印，张元济始终都强调古籍出版的学术性价值——因而必须提供好的版本基础与校勘工作以及影印中的技术保证，最后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可靠的本子。张元济退休之后，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前面曾说过，商务印书馆之涵芬楼已收集不少善本，粗具体制，但欲求多多，虽可益善，事实上并不可能。因而张元济便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更好的本子在哪里，如何借来影照，或作为底本，或作为参考。退休之后，大多为此而奔忙，且兼“一意校勘”，如与傅增湘、朱希祖、叶恭绰、刘承幹等往来商讨借书，通过傅增湘借影故宫所藏善本，通过宗舜年借影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等，访书之心不稍懈怠。这样做，一是很麻烦，不便急功近利，二是得守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然而张元济之重视版本是很有道理的。

---

胡适、蒋廷黻、钱瑞升等人的争论，大都刊登在《独立评论》上。

《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

《书札》163页。

胡适1930年12月10日致张元济函，《张元济蔡元培往来书札》219页。

该文编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胡适1929年6月2日致张元济书，《张元济年谱》323页。



这道理，傅增湘作过一番解释，他就“二十四史”而言：“窃惟史籍浩繁，号为难治，近代鸿著，无如王氏《商榷》、钱氏《考异》、赵氏《札记》，三君皆当代硕儒，竭毕生之力以成此书。其考辨精深，徵引翔实，足为读史之律寄。然于疑误夺失之处，或取证本书或旁稽他籍，咸能推断以识其乖违，终难奋笔以显为刊正，则以未获多见旧本，无所取证也。第旧本难致，自昔已然。钱氏晓徵，博极群书，然观其“旧唐书考异”，言关内道地理，于今本多所致疑，似于闻人诂本未全寓目，明刻如此，逞论宋元。他还讲到有位老先生叫张石卿，立志重勘全史，只因不明“欲校古书宜先求善本”的道理，所见版本有限，故壮志难酬，死后遗稿不免有许多疏失，未能问世。

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均为清代史学大家，精于考证，傅氏论其得失。也算说及痒处，亦可见张元济重视善本、校勘，何以不殫辛劳烦琐，疏通置疑，匡正舛讹，广采旁蒐，期于信今而传后。其功确符王鸣盛所言，“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不亦善乎！”

自《四部丛刊》初编出版后，张元济访书的主要目标是为辑校二十四史作准备，他后来说：“为学不可不读史，尤不可不读正史……长沙叶焕彬史部语余，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虽舛错疏遗，仍所难免，而书贵初刻，询足以补殿本之罅漏。”他所说的殿本，即乾隆武英殿本，为世上较为通行的本子，但亦有不少妄删、脱漏之处，缺乏检稽，当年校刻之巨的粗忽，张元济就发现了不少，所以重加校勘十分必要。“近走两京，远弛域外”，两京即北京、南京，域外则是指一九二八年的张元济日本访书之行。

到日本去访求中国古籍，这似乎有些奇怪，而且未免令国人尴尬，因为有不少古籍在中国已消失，却在日本（或域外其它地方）保存着，总归是事实。此一现象自然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日本遣使入唐，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朝廷乐于把书籍当作交换的礼物，民间往来的也不少，积累久之，日本人拥有了可观的汉籍收藏，有些国内已然失传的珍本却成了“日本国宝”。一八八一年（光绪六年）有位学者叫杨守敬，随出使日本的大臣何如璋来到岛国，游历书肆之间，见到不少有价值的旧本，便曾感慨“古书之流遗，何幸复见于异邦”。

杨守敬是近代第一位去日本访书的人。其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际，讲求新学，旧书价落，他买到了不少善本书，还撰成《日本访书志》。在此基础上，协助驻日公使黎庶昌刻印了《古逸丛书》。杨氏堪称善本书的“知音”，譬如《春秋左传集解》古钞卷子本是六朝时的钞本，藏于枫山官库，不许外借，杨守敬千方百计托人借出，由于限十日内交还，“乃倩书手十人至寓馆，穷日夜之力，改为招本影钞之，刻期书成。”搜罗放快，心诚无过于此。

张元济去日本访书的目的，已不同子杨守敬的“购求古本”，事实上也不再有了杨氏那样的机会，此时已是遗编东去难再归。一九一七年，归安陆氏丽宋楼售与日本静嘉堂，其中包括珍本实数为北宋刊本七部八十册、宋刊本

---

校史随笔·序言》，商务印书馆，1990年。

《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诗文》270—271页。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

一百一十四部二手六百一十一册、元刊本一百零九部一千九百九十九册，这样加以扩充，仅“静嘉堂文库”即藏有汉籍九千余部，其中，《四库全书》仅有存目而该文库藏有全书的，就有一百七十七部，而张元济曾两次亲到湖州。欲观“韶宋楼”藏书，均被托词拒绝。欲校辑古史而了解善本，看来也就必须东渡扶桑了。访求中国古籍而到日本，此所以怪而不怪也。

张元济能到日本访书，是由中华学艺社居间联系介绍的。中华学艺社是一些留日学生于一九一六年在东京创立的学术团体。它的骨干如郑贞文、周昌寿、杨端六等回国后曾办过《学艺杂志》，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发行，张元济、高梦旦还支持了学艺社同人出版其他书籍。学艺社骨干也大都于一九二年后进入商务编译所工作，因此关系很好。正好学艺社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在东京研究图书馆学，“知道日本公私立各图书馆藏有宋、元、明、清中国精版图书甚多，建议由学艺社向日本各藏书家选借，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整套内部刊物出版，仅分配于特别需要的社员，不对外发售。这原是日本学术团体常有的办法，可以援例举办。”这个办法由郑贞文向张元济、高梦旦接洽，得到赞同，并商定由商务提供选书影印的经费，由郑贞文和马宗荣去向日本方面交涉借印手续，约明书籍印出后，每种分别赠送原书所有者各二十部。日本方面也同意了。此事遂按约进行。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偕郑贞文等乘轮东渡。此行距其初访日本已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溯陈迹，刘郎前度又重来。深宵一夕伤心语，故国迢迢首屡回。”在日本观书计时一个半月，张元济先后在东京、京都券地往看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私立东洋文库、帝国大学图书馆，还应邀参观了京都东福寺藏书以及几家私人藏书，与汉学家诸桥辙次，盐谷温、狩野直喜、眼部字之吉、长泽规矩也等数度聚晤，收获不小，感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张元济一八九九年曾会晤过的学者内藤湖南也尽其东道之谊。

在日本期间，“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选古书”，“每晚必作笔记，至于深夜。”每个图书馆，大约各阅书三四日，先生专看经、史、子、集，郑贞文则阅读古小说，初步选出后，由先生决定拟借书目，商借照印事宜。日本之行结束，张元济分别从宫内寮（6种）、内阁文库（28种）、东洋文库（2种）、静嘉堂文库（9种）借影了善本，底片带回上海。

日本归来，张元济作了一首长歌，抒写访书的观感，也引发了对这个时代文化兴衰的感怀：“……寒家世泽传清河，横浦遗集今不磨，等身著作云烟散，什无一二堪搜罗。宦游所至亟访古，数典自惭竟忘狙，忽闻员峤方壶间，乃有陈编在东土。逸书百篇今尚存，将伯请诵前人言，良朋意气重然诺，许我探索不惮烦。……回首乡关尚烽火，礼失求野计未左，国闻家乘亡复存，感此嘉惠非琐琐。呜呼，世界学说趋鼎新，天意宁忍丧斯文，遗经在抱匹夫责，焚坑奚畏无道秦。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阅墙只细事，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此诗结尾寄望于中日两国友好，那时还未估

---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210页。

《诗文》31页。

《年谱》313页。

《戊辰暮秋至日本东京观静嘉堂藏书，赠岩琦另爵等》，《诗文》9页。诗中“员峤”、“方壶”，皆为海上仙山名——引者注。

计到日本终于发动侵华战争。

张元济日本访书的最主要成果是得以从《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中转采影印，与国内的版本配合校辑，如《太平御览》配得整套完全宋版之书，又如宋刊《三国志》、宋刊《晋书·列传》、宋刊《陈书》、宋刊《新唐书》等和国内原有各史配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等。

### 校辑“二十四史”

在张元济主持商务出版古籍的过程中，百衲本二十四史居于突出的地位。这不单是因为以往旧史版本已流通不多，而且问题不少，缺乏系统整理校勘，始终是学术界的一个遗憾，需要弥补，同时又是张元济多年的宏愿。张元济自身的学术研究也集中体现于此。

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校史随笔》自序述及：“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二十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会禁网既弛，异书时出，因发重校正史之愿。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商务印书馆既覆印旧本行世，先后八载，中经兵燹，幸观厥成，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应该说，这并非易事，是否是“卷帙从衡，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以至“目睛如雾，尚范苑不休”，该只有个中人知道了。

以朴实严谨的学术风格从事史书辑校，《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学术价值显然超出了这一出版工程本身。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始于一九三三年，原计划分四期出书，到一九三三年出齐八百二十册，后因“一·二八”事变商务遭战火毁而中断，直至一九三六年才告竣。所谓“百衲本”，是指采用各种版本，残缺不全，彼此补缀而成，犹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样。实际上张元济在看到本上所做的准备工作经历了更长的时间。如傅增湘所云：“当创议之初，或疑古本传世日稀，诸史颇难求备，且卷帙繁重，沿袭滋纷，造端既阔，杀青匪易。君独奋厉图维，引为已责。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浏览，耳目闻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景附，咸出篋藏，助成盛举。于是广罗众本，拔取殊尤。远者写仿以归，近者投瓶见假。而编排待定，端绪至纷。宋刻旧少完编，则另徵残卷，秘籍也不再出，则取资覆刊。一史而同备数刻，必录其古者；无刻而兼用传钞，必选其精者。或合并异刻及完一书，或续获初铸而弃前帙。凡此甄择之功，皆再三矜审而始定。”傅增湘这么说是深有体会的，在“衲史”准备和排印过程中，张、傅二人书牒频递，求讨合适的版不厌其烦，仅从傅氏邨架以及介绍他处所得善本（或借照或补配）就有许多种。

譬如《史记》为全史首帙。自雕板印刷始行，较早的本子有南宋黄善夫刻本（含三家注），其它遗存宋刻本均未全有三家注（集解、索隐、正义），明代有“监本”（南京国子监），又称“三朝本”，有震泽王延哲家刻“影黄本”，又有毛氏汲古阁“十七史”，清代有“武英殿”等。后刻诸本，据张元考校，均有不少缺误，因而从事辑校的最佳底本角为宋槧黄善夫刻本。

---

张元济《校史随笔》，商务印书馆，1990年。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93页。

《校史随笔·傅序》。

但黄本已残遗多处，很难配全，尽力找到的，是由涵芬楼、傅氏双鑑楼、潘氏宝礼堂三处所藏集得，仍有缺卷，不得已而拟用明震泽王本补配，这样，张元济也承认“诚为缺点”，然“现在只得将就”。到一九三一年初，张元济终于访知日本上杉侯爵家藏有黄本全部，于是托友人借到摄影补足，方一了夙愿。傅增湘闻讯亦称，“史记得全宋本，真可庆慰，所谓精诚之至金石为开也。”

一九二七年十月张元济被绑票赎出后几天，便曾开列“衲史”所拟用版书的目录，而在尔后的实际运作中力求不断改善，变动是很大的。正是“或合并异刻乃完一书，或续获初镌而弃前帙”，成如容易却艰辛。兹略举若干情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致刘承幹：“曩承慨借宋刊唐书暨三朝本南北诸史，新旧对勘，获益非浅。”拟再借“大典”本《旧五代史》校印。

一九三一年一月致傅增湘：“影印旧本正史，明春即拟开印，其中尚有需斟酌者。”拟借《朱书》、《魏书》、《北齐书》、《陈书》配补。

一九三一年五月致傅增湘，谢抄示北平图书馆所藏残宋本《魏书》卷帙。然仍欠十余卷，且有阙叶，故“徐氏所藏一部如缺卷叶均可补者，仍乞鼎力转商为荷”。

一九三一年六月致傅增湘，告以李盛铎藏《晋书》拟先借数册，“先校一过”。

一九三一年七月致傅斯年，谓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宋刊《册府元龟》暨元刊《宋史》“蒙允假印，极所欣感”。

一九三一年九月，致蒋藻新、蒋观圭，谓：“元济嗜读乙部，以通行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讹舛甚多，亟思别印旧本，藉资订正，且以纠正明监、汲古之失。”又谓：“《晋书》善本较为难得，尊藏虽缺去记载，而纪、志、列传俱全，补抄亦至精美：不揣冒昧，拟求通假，伸善本正史得成完璧。”

这儿所引录的，只是版本淘漉选择工作的一小部分，更不包括张元济为辑校“衲史”所做的大量案头劳作和组织工作。其负责任劳之精神，或如清代一位学者所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一九三一年八月，当“衲史”已出样本并发售预约之后，辑校工作全面展开，张元济主持建立了商务印书馆校史处，以汪治年、蒋仲蕻为正副主任，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推荐来的毕业生王绍曾、钱钟夏、赵荣长进入校史处工作。张元济为助手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规则，如须将选定版本的照排版同明监本、武英殿本等进行核对，发现不同处记录于边栏外面，须查找名家校记、评论和注释，以备参考；须将同一生书的不同版本上所载的前人评注和书目提要进行对校。在此基础上，“先生每晚复校校史处当日送来之校稿，发现问题，即贴上签条，用朱笔批注，并在每页上加盖“断版勿拼”、“断版剪开，拼准修好”等戳记，翌晨发还。又亲撰《晋书·纪传》、《宋书》等史的制版须知。

百衲本二十四史总的风格是“遵古影制”，最终，除《旧五代史》用辑明永乐大典本，《元史》用明刊本，《明史》用清刊本外，前二十二史所据

---

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256—257页。

上引诸条见《年谱》332—325页。

王绍曾《张元济先生校史始末及具在史学上的贡献》。

底本有宋本十五种、元本六种，非朱即元。未得圆满者，盖因《旧五代史》的早期刻本坠绪茫茫，虽曾登报征求金刻本，终未有所获。

古本搜寻既难，寻到拼衲时亦有难处，这一难在于古本年代既久，漫漶垢蔽之处所在不少，给制版增加了困难。摄影后的底版非进行仔细耐心的描润手续不可：为此，张元济订下了“影印描润工序”，有初修，有精修，有初校、复校、总校，也讲了如何洁版、如何梳剔、如何弥补，颇为细致。经过描润后的印本字迹清朗，亦不失其真，令人感佩出版者的敬业之忧。

“衲史”是有形的，但其中还蕴涵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即不辞坚忍做事、做好事的精神。不畏难，亦不为挫折所屈。“衲史”辑印过程中曾遭“一·二八”战火之难，原存底版大半毁失，不少皆须重照再制。当时灾后校史处同人至先生寓所慰问，张元济见到各位，几乎抱头痛哭，呜咽得话亦说不出来，对“衲史”能否继续印行也毫无把握。但半年后校史处便在先生家中重建，开始了恢复工作，并在第二年加紧进行。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复傅增湘书谓：“弟近日为核印‘衲史’，几度废寝忘食，今岁只出南朝四史，宋、梁两朝均有邈邈本补配，印宋元旧刻亦多烂版，《陈书》照自日本，尤为模糊，工程之难，为从前竟未想见。……年前必须赶完，过年后方可议及他事也。”张元济甚至忙得在旅行途中的车、船上赶阅校样。

“遗经在抱匹夫责，焚坑奚畏无道秦。”此言不虚。书史小沧桑，在在显示中国历史文献的荣衰命运，既不乏爱惜者传承者，亦不断有水火之灾与“无道秦”式的人祸，兵罪逞于前，禁毁行于后，到了现代又加上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梨枣纸墨何辜？但张元济以守护弘扬陈编古籍为任，发其孤勇，百折不挠，其难能可贵，“衲史”出版提供了确切的证明。

“衲史”是否是二十四史最好的本子，如果过许多年再者，未必然，但无疑是承先启后。胡适的评价很中肯：“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功力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若能以每种校勘记附于每一生之后，则此书之功用可以增加不止百倍。盖普通学者很少能得殿本着，即有之亦很少能细细用此百袖本互校。校勘之学是专门事业，非人人所能为，专家以其所得嘉惠学者，则一人之功力可供无穷人之用，然后可望后来学者能超过校史的工作而作进一步的事业。”

实际上也就是做的“铺路”、“架桥”的事。过去顾炎武曾说过学者治学的价值在于：“必前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以此来评价张元济校辑史书的意义，也是平实恰当的罢。

### “一·二八”大灾难

一九三一年是发生了“九·一八”沈阳事变的年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由此开始了一个战争与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张元济正忙于校史，身体亦不算安康，“病起之后，终日伏案校阅旧史印本，日数十百纸，寝馈不遑，百事都废。”他何曾料及不久后，他和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会遭到一次巨大打

---

详见顾廷尤编《涉园序跋集录》91—94页。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311页。“邈邈本”指南宁绍兴年间蜀刻眉山七史，至元代后版本大部模糊漫漶，故称“邈邈本”。

胡适 1930年3月27日致张元济函，《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218页。

张元济 1931年9月7日复汪兆铭书，《年谱》355页。

击。

这年六月先生的儿子张树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拟赴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商业管理法科。行前，张元济仍像一九二二年侄儿树源留学时一样，谆谆叮咛如何爱身，向学，如何交友、用财。换句话说，他始终认为人受教育的过程既包括学问、知识的广泛吸收，也应特别注意道德修养，以养成文明素质。这样，正如他自己所躬行实践的一样，当人为社会服务的时候，第一能立定主意，有所作为，第二要趋向正当，第三要能忍耐，便能在与复杂的人生情况相遇时，保有可靠的人格支撑。

显然，无论是平常岁月，抑或动荡与战争年代，对于张元济而言，人格支撑都未尝在历史的流动冲击中消失。尽管他扶助教育以求国人能起萎发暗的理想仍在渺茫，却不肯放弃而且日益重视个人的与民族的集体人格的价值。一九二九年北方的老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范孙）逝世，张元济作挽诗感事而伤怀，惺惺相惜：

铜驼荆棘今何世，北学星沉已十旬，勿诵遗诗来远地，更怜吾党失斯人。弦歌百里

声犹在，山木千秋道不论，白马素车长诀别，临歧愧我未躬亲。

张元济不曾用理论说法诠释过“道不论”的“道”是什么，斯时斯世，亦难免道术分离或“背道而驰”，但张元济大半生的努力，都未曾偏离依傍传统道德人格而又开启新知的基本态度，也是既做实事又寻求精神提升的一路。一九三一年在辑校百袖本二十四史的过程中，张元济赠诗数首给傅增湘，流露出对此种寄托于书卷的苦乐的执著：

我为古人薪续命，更从新法试留真，

多君不惜娜嬛秘，举世莘莘获馈贫。

鸿鹄涑水未丛残，两宋名刊持续刊，

七宝楼台看涌现，漫云一角补天难。

铁琴铜剑岿存外，冀北江南此二楼，

君自丹铅吾石墨，相期事业共千秋。

相信为中国文化做拯亡续绝的事是“千秋”之事，实际如何，要历史来作评价，但就张元济个人而言，校辑古籍虽不能趋时，亦有重重困难磨折，却不妨说是安身立命的选择。因此完成“衲史”出版的精神与“袖史”本身一样，有它不俗的意义。

然而原本平静的工作忽然失去了平静。

一九三二年初，“一·二八”淞沪事变发生，震动波及商务印书馆。前此，日本蓄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正在逐步占领东三省，侵略气焰正盛，又在上海企图制造事端，寻找战争借口。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其信徒共五人故意向三友实业社总厂工人义勇队抛石挑衅，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僧人死于日本医院，乃指使数十名暴徒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破坏，煽动日侨集会、游行，捣毁商店，杀死、击伤中国警察三名。日本驻沪总领事还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尽管上海市政府已表示接受四

---

张元济 1929 年 3 月 12 日致陈润身书，《年谱》319 页。

《挽严范孙先生步自挽原韵》，《诗文》25 页。

娜嬛”指藏书的洞窟，“涑水”指北宋史学家司马光，“铁琴铜剑楼，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二楼”分指傅氏“双鑑楼”和“涵芬楼”。1931 年 10 月《赠傅沅叔》《诗文》35—36 页。

项条件，日本军队仍于二十八日夜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被迫起而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从而爆发。

一月二十九日清晨，进攻闸北的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总厂制墨部最先中弹起火，继而，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所及纸库、书库、尚公小学、东方图书馆均中弹起火，因战争激烈无法抢救。

交通已断绝，张元济无法得知确实消息，焦急中仍抱希望，希望东方图书馆能有所保全。但二月一日，疯狂之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将日机轰炸时未毁之图籍加以焚毁。灰烬与纸片随火光冲天而起，飘满上海天空，有的落入先生沪西寓所园中，先生对此情景，不禁为之泪下，对许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这场浩劫！”

总厂全毁，“东方”亦毁。所幸者，涵芬楼善本古籍有五百余种，张元济在一九二四年间为避内战之祸，曾取出寄存于租界金城银行保险库内，此次幸免同归于尽。但张元济多年孜孜不倦收集的二万六千册地方志书可叹化为灰烬，兹后不可复得，亦为最堪痛心者。

商务遭此劫难，张元济三十五年的心血同遭厄运。这件事刺激起的愤慨是可以想见的。虽然他在答复朋友的慰问时说到，“世间万物不能逃出‘成、住、坏、空’四字，……不同日月星球坏灭会有时，大地山河亦如之，一念及此，彼此胸次俱可豁然。表现出镇静通脱，其实块垒亦耿耿于怀。他写信给胡适说：

“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一簣。设竟从此浙灭，未免大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所最望者，主持国家皈依三民主义之人，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则吾辈或尚有可措手之处。否则，摧灭者岂仅一商务印书馆耶。”

天下兴亡，已不可能与匹夫无关。面对商务印书馆的惨重损失，固然仇忤于侵略者，痛心于国家当道无能，也是很自然的。大约自咸丰年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后，这是最令人痛惜的一次文明惨剧了，到三月中旬，据实情统计，商务总计有一千六百三十余万元的损失，虽然保了火险，但兵险则不可能承保。

灾难之来，也破坏了张元济退休之后的平静心情。事后丁文江在转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谓，“昨日仲恕出示叔通手书，又在适之处见菊生先生函，皆颇对于当局有不满意之表示。此固在上海受刺激者之恒情，然弟悉以为今后途径，还不在于责备已过去之当局，且未必可藉之以推翻国民党之天下

---

《中华民国史纲》38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290页。

1932年3月5日复姚名达书，《年谱》363页。

1932年2月13日致胡适书，《书札》163页。

丁文江，字在君，地质学家，曾任北大教授，与梁启超、胡适、张元济颇有交谊，1936年因煤气中毒逝世。

也。”

就此，张元济起草一答书说：“吾辈决不欲与国民党争政权，亦不欲推翻其天下，但不能不责其必须改过。以言军政，则全国养兵有八十师，只为人人拥以自卫，既不能守上，又不能剿匪，不知有何用处？以言财政，内债发至十余万，苛税不知凡几，真所谓民穷财尽。以言民政，则群盗如毛，江甯浙西原称乐土，近来全村、全镇洗劫之事，层见迭出，官吏窃脏逃走，政府无如之何……”下面还指出实业、交通、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由这封后来未写完也未发出的信来看，张元济对当权者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国事种种堪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甚至逐渐开始打破以往不谈政治的习惯，出而“为民请命”。他主动给当时身据要津的汪精卫写信，要求汪干预军队的纪律不严问题。

大约因为对中国社会内部之混乱印象殊深，张元济认为主张对日用兵是不行的。“此时只有暂时忍辱，力图振作”。尽管如此，尽管三十五年来的心血遭到毁灭性打击，他的精神却未垮掉。

### 复兴“商务”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下午，东方图书馆的大火仍在燃烧，大祸已成定局，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变。最后决定：（1）上海总馆及两分店停业，总馆同人全体停职。（2）公司以后方针俟立集股东会决定，成立善后办事处仍（3）同人薪金除已支至一月底外另发薪金半月。（4）各分支馆、分局暂时照常营业，但竭力紧缩。当时战火未停，张元济作为善后委员和馆中元老每日均到办事处料理善后诸事。直到三月三日后宣布停战，察勘损失，感觉维持公司仍为一大难题，恢复之志虽定，措手不易。时至五月中，日军尚未尽撤。由于损失太大，恢复工作亦受制于财力状况。

据当时的董事会报告，除了固定资产和藏书的巨大损失外，一九三一年度营业本来增进甚多，然遭难之后，转盈为亏，计亏耗三百七十四万余元。尽管将历年所存普通公积金一百三十三万余元悉数弥补亏耗，仍亏损二百十三万余元，不得不减少资本五分之二，营业收缩已不可避免。而解雇职工成了敏感而棘手之事。

已经停业三个月后的五月九日，馆方就职工解雇问题发表通告，解雇职工除发给退俸金外，再发薪水半个月，特别储蓄及活期储蓄全数发还。此方案引起职工方面不满，“曾组织劝导团，劝阻职工缓往领取，静候交涉，其结果，领款之人数达二千数百余人。闻未领款一部分之职工，请求职工被难善后委员会领导，提出诉讼，请求法律救济。”

职工有职工的难处，馆方有馆方的难处，劳资之间围绕解雇而产生的纠纷又持续多日，而且余波不息，只能说是勉强了结。以张元济之资望，亦每觉无可奈何，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感叹：“商务印书馆事两月以来众人精神完全对付工会。弟不忍三十余年之经营一蹶不振，故仍愿竭其垂敝之精力，稍为云五、拔可诸子分尺寸之劳。在此数十日中可谓吃尽生平未尝所谓资本家

---

见《年谱》362页。

《年谱》364页。

《“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记》，《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433页。



之苦。”

先是兵火之灾，人未缓过劲儿来，又是劳资纠纷，还要应付其它善后事以及复业、安排秋季需要的课本，张元济不仅不能“退休”，还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决策地位上。商务的总经理是王云五，王云五的皆理办法大不同于商务的旧传统，因而遭到许多人反对，张元济在遇到这么大的危机情况下，为保大局，势不能不支持王云五。而经此重创之后，商务的结构也确实起了很大变化。

王云五于一九二二年任编译所长，一九二九年辞去，由何炳松继任。王辞职不久，适原总经理鲍咸昌去世，一九三一年初商务董事会便邀王云五任总经理。王到职前曾出洋考察企业管理。回国后走马上任，倡行科学管理办法，改订了总务处办事章程，还成立个研究所，聘一些留学生分别研究“推广业务”、“机械管理”、“企业统计”、“印刷成本会计”、“工资”、“人事”、“印刷工艺”等方面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工厂管理训练班。但王云五的科学管理计划贯彻得并不顺利，譬如他搞的“编译所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便遭编译所职工会之抵制，称其为“欲推翻成规，独创酷例”、“彼之行为及言论，实无一合于科学方法者”，此事既闹风波，王氏只有取消他的新办法了事。

“一·二八”之变，客观上给王云五提供了一次对商务机构大加整顿的机会。除解雇员工、修改章程外，还改组了机构。由总管理处取代总务处，下辖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审核五部及秘书处、编审委员会、人事委员会。最重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编译所和印刷所，这样似可减少人员和麻烦，而稿件的来源将依靠馆外，恢复的五种杂志委托给专人负责，至于印刷，则主要包给一些新建的小印刷厂、小装订厂来做。去掉了编译和印刷两大块后，商务的传统结构改变甚大，它更像一个出版经营机构，不像一个企业集团了。不妨说，这是一个精简甩包袱的聪明办法。商务在当年八月一日复业时，王云五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实现了他的整顿计划。

从董事会开会的情况看，张元济对王云五的措置是支持的，毕竟没有什么更好的应急办法，而且他已不处于第一线，尽管他对编译所肯定会怀有创始者的感情。

劫难之后，张元济仍有不少事情要做，如抓紧恢复校辑出版“百袖本二十四史”，主持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委员另有蔡元培、胡适、陈光甫、王云五，先生捐款一万元），撰写《涵芬楼烬余书录》，组织编订出版《四库全书未刊珍本丛书》，辑印《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丛书集成》以及其它古籍，工作繁冗，负担有甚于难前者。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说，“殊以为苦，然商务印书馆为此时一家养命之源，我虽不拿一钱，然我若放手，恐大家从此松散，真觉得进退两难也。”话虽这么说，在所谓“复兴商务”的时代，张元济仍是个进者的形象。

而且，对于工作，他有一种责无旁贷的紧迫感。“一·二八”之后，战争阴影仍未消失，考虑到“近岁战争之事层见迭出”，古籍若不尽早重印以致毁亡，是大可惜的事。若无张元济以忧患心情加以督导，复业后的商务在

---

《书札》164页。

《商务印书馆试行编译工作报酬标准办法纠纷记》、《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420页。

《年谱》401页。

古籍出版方面不会迅速恢复并超过难前的水平。与此有关，张元济的指导思想亦起变化，他不再坚持采择善本的习惯癖好，如影印四库珍本，认为若“一一比勘，择善而从，不特非短时间之所许，假如文津、文渊有异同，而疑莫能明，不得不取证于他本，他本或不可得，或得而仍不能决定，又不可任意窜改，似此殆无成书之日。不如先印库本，以为流通保存之用”。但此一想法受到了北京的版本目录学者袁同礼、赵万里的批评，说是“万万不宜草率将事也”。鲁迅亦在一篇杂文中讽刺：“……‘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

不过，从尔后国内局势的变动来看，张元济的主张显然是对的。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的两编以及《四库珍本丛书》均在战争之前出版了，如果改用善本及细加校勘，计划肯定会因拖延时日而被战争破坏。“一·二八”的刺激，对张元济而言，非同一般。也许出于自觉，战争的威胁，使他把抢救文化遗产摆到了紧迫的晚年日程上，所谓“颇欲就此残年多印数千百卷之书，正不知心意何如耳”。

一九三五年夏，商务负责人致信张元济，言“近年公司印行《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正续各编，全赖我公一手主持，劳昔功高，远非公司在职同人所及，而纯任义务不下十年，尤为全体同人所敬佩不已。‘一·二八’以后，编审部同人较少，所有印行古书事宜，在编校以至广告，在在费神”。故通知先生从本年起奉酬四千元。

张元济对此当然谢绝，表示：“弟终当常为公司办事，但终不能受公司一钱，以此报诸君，并以次报身殉之故人……”

肯做事，不要钱，不但不计酬报，反而乐善好施，仅就财币而言，张元济帮助过的人可说难以计数。譬如罗家伦，在“五四”时期曾是抨击商务杂志方针的健将，但他在国外留学和国内工作期间，均曾向先生借过钱，先生重人才，总是满足其要求。罗氏后来作了大学校长，向先生还钱，先生竟退回不收。像这一类的细事，包括其生活与工作上一贯俭朴，大都可见一个贤者的道德心性充塞天地，原是出自能够超越世俗利禄风习的“平常心”。

一九三四年五月许夫人不幸病故，张元济哀痛之余，确定简办丧事，在报上只刊登一启事，谓：“宅内并不设灵堂，亦不在寺庙举行何种仪式，……膊礼一概辞谢，无论何物万勿见贻，即寸香片楮，亦不敢领。”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他要从自己做起提倡破除陋俗、归真反璞——“仪文至繁，数千年来递推递演，杂以虚荣迷信之见，致成今日诡诞之习。……此虽一人一家之事，然实社会之病，余以为亟宜湔拔。”清醇一介道德君子，张元济的人

---

《就影印四库珍本答记者问》。

1933年8月14日，袁同礼致张元济书，《年谱》383页。

《四库全书珍本》，收入《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267页。

1935年6月15日张元济复汪兆铭书，《年谱》409页。

《年谱》409页。

1934年5月6日《申报》，《年谱》396页。

《告窆为许夫人》，《诗文》373—374页。

格修养始终有着其人良知的理想，但然开明，亦不随波逐流。一九三六年十月值张元济七十寿诞在即，不少友人同事想举行贺寿活动。张氏生性谦逊，极力辞谢，只同意由商务编集了一本《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索性身赴杭州避寿，将已寄来之礼品、礼券全都退回。

他这七十年生涯，在旁人看来，是致力文化事业大半生，“其躬自校勘之古籍，蜚声士林，流播至广，对于我国文化之阐扬，厥功尤伟。”而在他自己抚瑟而味，却是“行年七十，岂但虚生，直是草间苟活”。这也是其人淡泊功利之心的流露。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奠业者，又是“一·二八”之难后的复兴者，张元济的努力是不平常的，然而他总是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当然，抚今思昔，亦不免有一丝悲凉。缘于人事已非，故旧凋零。自许夫人辞世后，亲家葛嗣渊、友人丁文江变先后亡故，先生挽联有“知交零落我何堪”等语。尤令先生悲感者，是挚友高梦旦变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猝然故去，默念头无已，空余涕泪。

至于晚清曹钧党之祸的二十余人，此时更是先后云亡，俟抗军兴，散原老人（陈三立）和熊希龄（秉三）变相继谢世，子遗者惟得天独厚生一人，以此更增长率“草间苟活”之感。然而世变不已，此时行将进入一个更为痛苦的时代。

---

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之《中国文化史丛书》书前题识。

1936年11月6日复胡文楷书，《年谱》427页。

## 第九章 尘世缘

### 国难与人格

张元济一生经历了时世翻转的好几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不太平，国家也并未臻于富强。一两代人的奋斗仍彼笼罩于悲剧性的命运。尽管张元济自一八九八年后解职当了平民，从此定居上海，从事文教出版事业，并未投身政治，但也不免风声雨声不断，天下兴亡系心，其诗云：“铜驼荆棘伤心事，忍及吾身屡见之，一瞑长辞旧京国，千秋遗恨黍离离。”写下这些伤心的句子，已是窗外传来日本侵略战争隆隆炮声的时候，上距甲午中日战争那年，耻辱忧愤集于心头，已度四十二载，仍难逃时世的艰难。这一次的艰难是抗日战争八年的艰难。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华战争在北平卢沟桥打响了第一枪，抗战从而开始。当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攻击上海守军，淞沪战役爆发。战役持续了两个月余，由于日军不断增援登陆，实行大规模迂回包围作战，我军被迫撤退，十一月十一日，上海亦告沦陷。

张元济未离开上海举家逃难。还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间，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说，“万一变生意外，我处重心在此，非至不得已之时亦难轻离。”战事爆发后，又觉得“此时家眷遽尔南行，未免近于张皇。我意非万不得已时，不宜轻动”。此外，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尚能苟安，也由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及留沪机构亦须维持，张元济滞留“孤岛”及沦陷区。后来所作一诗，堪为彼时心情写照：

惊心岁月思南渡，犹见君家旧井栏，  
石不能言应自痛，几经水剩更山残。

虽然他相信“神州未必终沉陆”，但七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民族苦难，何能不倍感刺激，肝肠俱热。这使他在抗战前越来越关心时事，甚至大声疾呼，一改昔日之沉默。蔡元培评之曰：“此老久不干涉政治问题，近渐渐热心。苏州法院审沈钧儒七人案，张君特赴苏旁听，亦其一端。商务近印其所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亦其热情所寄也。”

所谓“沈钧儒七人案”，即“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因主张抗日救国被以“危害民国”罪而受审一案。就争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而言，张元济是与“七君子”认同的，他曾专程去吴县横街看守所探监。

内修仁政，外御强敌。仍是张元济日夜望之，望之不足而疾呼的主题，而站出来讲话的情况也出自其内心。譬如他为海盐家乡的百姓讲话，反对县政府为修建公路而不必要地拆毁民房。为此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上书蒋介石（时任行政院长），请求干预，同年十二月参与向省长朱家驊接洽，一九三七年一月亲赴海盐调查，并写了《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对地方官只图敷衍新政门面，于地方民情全不体会的做法严厉批评。同年六月又向新任县长写信，要求体恤人民财产，不为病民之政。

---

《挽陈伯岩》，《诗文》39页。

分别见《年谱》426、446页。

《题顾起潜拓示宋绍定井阑》，《诗文》76页。

蔡元培《杂记》手稿，见高平叙《蔡元培与张元济》一文，《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582页。

应该说，张元济对政府是抱有希望的，希望在国难日深时，政府能考虑民生的根本，克服弊政，庶几有助于民族复兴，但他对贪官污吏尤为痛恨。所以当上海出现“纱交风潮”时，他写信给《大公报》“记者先生”，对报端揭露财政部税务署长等官僚操纵上海纱布投机事，力主严办。其言谓：

国家困穷，小民日受剥削，几无生路，若辈贪污至此，可谓全无心肝。闻诸银行家言，法院果能持正，将所有各项支票逐节根究，必可得其主名。敢请贵报续撰评论，得此层明白揭破，使法院不敢含糊了结，各银行亦不敢代为隐藏。倘使贪吏伏法，政局澄清，国家前途，庶犹可望。

先生的呼吁还引起了在北平的胡适的反应。胡适也致信《大公报》：“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以使我们年青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如果人人都能像张菊生那样爱打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亭就有望了。”当然，“打不平”也好，“说正话”也好，效果终究是有限限的，面对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只是一种微弱的声音。毕竟，从改造社会富民强国的角度看，几十年的颠扑仍不免路漫漫、夜漫漫。有时，张元济便又想到了他那尚在微茫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吾国家至于今日，唯有从增进国民程度人手，否则无论如何总是皮毛。”他对国土沦亡至感痛心：“……平律相继又拱手让人，若辈只知有身家，不知有国，亦其程度使然，不胜浩叹！……然及此未亡，弟仍不信无可以图有之术。此其责，唯吾民矣。”也许，他将希望寄予一种民族危亡所唤起的东 西，那就是潜涵在历史底层的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那是精神和人格的力量，赖其支撑，一个民族将不会在灾难中倒下。

一九三七年五月，战争已山雨欲来，张元济编写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出版。这本书既是先生校辑《史记》等古籍的副产品，亦是对时世有所感而发。这本书写到的志士仁人故事，实际上诠释了人格在人生历史上的价值意义，亦代表了中华民族所尊奉的人格标准，即孔子所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这样一种人格追求，一个民族便还不失去可以通过炼狱的精神原动力，否则它必定要堕落。张元济并未探讨人性与人格的复杂性问题以及历史的悲剧性，他只是想强调，无论什么时候，忽视或丧失人格，都是不可原谅的耻辱，尤其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这种提醒与弘扬，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非廉顽立懦，激人奋发。他说：

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他们的境遇车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年间，《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共印行了六版。是书在日本占领区被禁止发行。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为是书再作题辞：“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圣训昭垂，愿吾国人守之毋。”

---

1937年7月10日《大公报》。

1937年8月3日张元济复黄齐生书，《年谱》447页。

《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本意》，《诗文》274页。

见《年谱》512页。

斯时斯世，张元济格外弘发人格的价值，弘发传统的“仁”的价值，并不大合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潮流。因为自海通以来，“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价值系统，似乎已经难以落到实处，而功利主义偕物质科学文明而浸染社会、人心，渐如漫漫水流。这种变化值得从两方面去评价，一方面，传统的儒家的思想指导曾经被过分地引申到所有的生活领域，一旦无法应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因而形成诸如“体用”、“道器”之间的那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影响到传统信仰的崩坏；另一方面，新的世界观的建立是匆忙而不稳定的。譬如将现代化理解为对传统的全面彻底的批判，从表面上解释西方强大的原因，尤其不了解仍然需要汲收传统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而规范打破之后，私欲横行，社会混乱有增无已。人格问题与其它更为紧迫的社会问题相比，渐为被忽视。

张元济显然也不能澄清近代以来的历史困局症结在哪儿，他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感同身受，对那一番不理想的景象有着自己的忧虑与关切。换句话说，他不会认为讲人格便能把国家社会整理好，但强调这一点十分必要，至少是良心的呼吁，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社会上多一点正气，以免民族的堕落与败亡。其思路缘起于忧患，眼看令人亟思拯救而又难以拯救的现实，回思多年奋斗，阙失所在，此时心有证悟。也可以说，张元济从“人格修养”、“民族精神”两点发凡立论，开始反思中国近代以来追求富强的历史过程。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致张君劢书中，张元济反思道：

数十年来，我国日日言富强，而其结果乃至于此，宁不悲痛！前半期吾辈未之及，后半期之责，吾辈不能不分任之。甲午战争战败，竟言新学。于是设学校，遣派留学生，唯以外国学术为尚，而于己国所以律身行己之道，毫不措意。黉舍必仿洋式，所需器具亦非洋货不可。学生耳濡目染，恶根已深，甫经毕业，年仅弱冠，全不知本国社会是何情状，即亟亟焉派至外洋。平日教育即极浮浅，又当血气未定之时，一至彼邦，睹其物质之享用，未有不为所摇夺者。即幸而学成归国，习染既深，几离租界不能度日。……而国家之大政与夫私人之事业，无不败坏于若辈之手。以言富强，富于其一家之储蓄已耳，强于其个人之权势已耳，于国家何有乎？新学之害一至于此……

作为几十年新学及新式教育的推行者，张元济的反省特别沉痛。尽管人们对此始料不及且无可奈何，更乏救治之方，但张元济则坚信，惟有从人格修养入手，方是经权利害之间的适当选择，他在同一封信中说：

今之大患，在于贪黷，贪黷之源，在于奢逸。此于沃土已所当戒，况于贫国；此于治平扰属可危，况于乱世。鄙见异日开院讲学之光，必先标明勤劳节俭之旨。凡饮食起居之微，亦惟以锻炼其体肤，淬厉其精神为务，而后一切学术可以听受，而后可以造成有用之才。

这样，便把道德精神的树立视为“有用”的前提。民族救亡的大背景，正是与张元济申论其说相契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显然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使张元济感到慰藉，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惭余亦学深宵舞，起视星河泪满衣。

## 风雨鸡鸣，孤岛四年

---

《年谱》461页。

《年谱》462页。

《和沫若先生归国书怀并步原韵》，《诗文》26页。

对日战争全面爆发，战场上的形势十分不利，随着上海失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守，政府西迁，第二年，广州、武汉亦告沦陷，华北及东南沿海之地入于敌手。这种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张元济不免忧愤不已，其寄往长沙的两首诗写道：

是何时世大难名，瞎马盲人夜半行，  
入学儿童争爱国，满朝髻御尽知兵，  
开关相诱宁无获，焦土能拼恁未成，  
看编流民图万幅，欲呼天听又吞声。

一身轻便我无官，忍说春池事不干，  
尽见甘罗诩年少，微闻魏绛立朝端，  
卧薪尝胆犹非晚，烂额焦头后更难，  
遥望桂林好山水，愿君留与策孳安。

世事如此，弥增浩叹，如果民族国家还有希望，确乎到了卧薪尝胆的时候了。

国难难纾，商务印书馆亦随之进入战时困难时期，体制和业务重心开始由上海转往内地。据总经理王云五之安排，“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商务在闸北及租界东区的工厂皆陷入战线，无法再工作，办法第一步，即在炮声中，于一个月内在上海租界中区设立一所临时工场，暂行维持工作。第二步在国军未撤退以前，将原设于香港的工厂扩充，使相当规模之业务得以继续。第三步即于沪战发生后三个月内在长沙设一工场，以期将出版重心转入内地。但不久因长沙大火，湘厂被毁，抢救出来的部分机器西迁重庆，又添购若干小机器，于重庆设厂。辗转播迁，商务总管理处先迁长沙，再迁香港，立足初定，又因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陷于停顿，王云五便在重庆设立总理处和编审部。商务董事会未迁，仍由留在上海的张元济主持。

抗战爆发后，商务总馆以及各地分支机构也遭到不少损失，但比起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之难，尚堪称幸。上海总馆势不能不收缩，局处“孤岛”一隅，略能维持。在此情况下，张元济认为，“欲维持公司之生命，开源非易，唯有节流而已。……盖此后情形，全国人民及本公司均非穷干苦干不可，目前公司尚有微力，若不及早绸缪，待至消耗已甚之时，再图挽救，恐已无及。公司能早日节省一分，即可多一息之生存，亦即可维持同人一息之职务。元济亦知同人薪水被减，已大为难，然过此以往，欲图生存，唯有节衣缩食之一策。”在张元济提议下，电灯、电话、包车费均力行裁减。

至一九三九年初，张元济亦感经济拮据，原居住已二十余年的极司非而路住宅，不得已而售去，改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沙法花园新建楼房。他本来是买书的人，现在也开始出售藏书。如郑振铎在一封信中说：“菊老病后需款，其宋本《荀子》已交来，谈妥价值洋四千元。”至一九四二年，日军已占领租界，更难苟安，物价日昂，生计日绌，张元济开始卖字，以资衣食。如其致孙乾三书云：“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日。闻友人言，津门商界中人，寄件来上海托书者亦颇不少，兹另寄润格十纸，

---

《任之自长沙以七律二首见寄依韵奉答》，《诗文》26页。

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349页。

《年谱》455—456页。

1941年3月24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书，《年谱》487页。

能否转托当地笺扇店代为招徕……。”

当时，商务在上海的货栈、印刷厂皆已遭日军劫持征用，困难至极。一九四三年七月张元济的老友伍光建，北平分馆经理孙壮相继去世，先生更增感慨，“最痛知交零落尽，相将携手赴泉台”，然而处此晦暗时节，也只有勉自排抑：“天既生才胡不用，士唯有品乃能贫。”“能贫”意味着有人格和精神上的支撑。

在沦陷区，有人为避免贫贱而求生害仁，张元济往昔的友人，如汤尔和、董康在北方出任了日伪的职务，如温宗尧、陈锦涛在南京下水，分任南京汪伪政权的立法院长和财政部长，但彼此间已不再往来。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多年间，张元济曾与汪精卫有交谊，一九三六年张还拜访过汪，但是汪精卫终于作了汉奸，走了另一条路。一九四一年汪还特意将其与陈璧君合撰的《双照楼诗集》，托人带沪赠予张元济，并嘱其复函，张没有理睬。汪当年也是才子，清末时还是志士（谋刺摄政王未遂，被逮），如果当初牺牲，岂不是青史留英名了么？可惜终是遗臭万年。张元济有诗说得不错：“更阅一二三十载，事难思议尤纷纷，天地为炉万物铜，朝夕煎炼何艰辛。”抗战的艰难困苦，对人也是磨砺，是人格的检验。叶景葵曾有两句诗写到先生——“人与百虫争旦暮，天留一老试艰难”，是很切当的。

一九四二年初，正是日伪统治更为严酷的时候，上海出版业皆被封闭，人心惶惶。在张元济看来，“情形日趋窘迫”，已想到“迫不得已时，拟将涵芬藏本售出若干，以解燃眉之急”。不过，处境虽难，张元济却绝不与日伪方面打交道，据《年谱》载，当时，“两名日军军官驱车抵先生寓所，送上名片求见。先生拒不晤见，挥毫书日‘两国交兵，不便接谈’八字……”

应该说，已逾七旬的张元济蛰居上海八年，是其一生中最为孤闷的时期：

斜阳欲瞑迷归路，望断天涯去不还，  
我亦安仁余旧恨，当前生意忍同看。  
举目山河泪几行，茫茫尘海一身藏，  
世人竟叹锄当户，独抱孤情自信芳。

此亦不免抱膝孤吟，但他毕竟不惯做闲散人，因而读书养志之外，亦仍为文化的保存尽其心力，可述者，兹有几项。

一是关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又名《也是园古今杂剧》）在抗战期间的影印出版。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六月初，傅增湘致信张元济，告以闻沪肆有元曲六十四册，约二百种，“皆《元曲选》所遗，索值三千元”，托张氏代为商购，“务以必得为幸”。

几天后，张元济复函傅增湘，告以探得元曲情况，友人潘博山得一半，

---

1943年3月4日致孙乾三书，《年谱》497页。

《挽孙伯恒》，《诗文》43页。

《挽伍光建》，《年谱》499页。

《叶揆初七十生日》，《诗文》14页。

1942年4月10日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384页。

《年谱》496页。

《题绿遍池塘草》，《诗文》82页。

《香草居主人喜芝兰，因以所嗜名其园，绘图征题，率成二绝》，《诗文》83页。



另一半为某古玩店主所得，全书已见，“不能不谓为奇书”，然古玩店主非万元不售，且云已有购主。

这部古本杂剧“奇书”，郑振铎言之甚详。他说这部书的出现如同发现了一个元明杂剧的宝库，在种数（二百四十二种）上，较之明人臧晋叔编《元曲选》多到一倍半，更足以补臧选及他书之未及。此书为明人赵琦美的钞校本，“脉望馆”为其室名，亦自署“清常道人”。约在天启、崇祯之间，书散出，后归钱谦益。钱谦益又将清常道人钞校本的书全部赠给了钱曾（遵王），所以古今杂剧也被收于“也是园书目”。钱遵王藏书，多半归于泰兴季沧苇，此书亦在其中，后辗转经何焯、黄丕烈、江闾源之手，归赵氏旧山楼，又转入丁祖荫湘素楼，抗战后苏州沦陷，始散出，前后历三百多年。

但是，关于此书出现的情况，郑振铎的叙述与张元济的说法有些出入。不同处有二，一是郑说书的一半在唐某处，后以九百金归孙伯渊，而张说他在友人潘承厚处见到此书一半。二是，郑说五月三十日已同孙伯渊签定以九千元购下全部书的契约，而张说他六月四日还在潘承厚处获见此书。但不论究竟如何，这部奇书还是由郑振铎代表教育部购得，其间苦心费尽，经过具载于郑跋。

此后，郑张二人多次往复商量“孤本杂剧”的出版问题，并请词曲专家王季烈校订，在张元济的积极组织下，精选《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百四十四种的《孤本元明杂剧》终于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版。此外，张元济还推动出版了《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宋本《宛陵集》、影宋本《稼轩词》，以及由叶恭绰编选的《广东丛书》等。

第二件事为参与敌后保存文献古籍的行动。行动由郑振铎发起，一九三九年未由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等联名致电重庆有关部门，请求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这一组织即文献保存同志会。重庆方面闻讯，派中央图书馆蒋复璁秘密来沪，商定抢救散出之古籍办法，以“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最后商定，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行收下。几个人任事，郑振铎、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版本，何炳松、张寿镛负责保管经费。

此次搜购古书，当为民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计划拨出经费四十万元，三分之二用于上海，三分之一用于香港。上海方面最先购到的，是刘世珩“玉海堂”一批善本书，刘氏字聚卿，为清季广东巡抚，曾出使英、俄等国的刘瑞霖之子，为遗老之一，珍藏甚多，最著名的有宋代王应麟撰的《玉海》两部，与唐代留传下来名为大、小“忽雷”的两具琵琶。故“玉海堂”门口有联曰：“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刘氏死后，书散出，同志会以一万七千元所得的第一批书中，便有一部元刊本《玉海》和一部宋刊本《魏书》，都是“玉海堂”镇库之宝。

彼时沪上成为各方搜购江南文籍的角逐场所，文献保存同志会不得不采取找藏书家直接买卖的方式，通过努力，先后购得江宁邓氏“群碧楼”、嘉

---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364页。

见郑振铎《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西谛书话》422—437页。

郑振铎《求书目录》。

兴沈氏义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吴兴刘氏“嘉业堂”与吴兴张氏“适园”等旧藏。购得之书，一部分经香港运抵重庆，一部分拟从香港转运美国，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书未及运出，被日寇掠走，至战后方得索还，还有一部分藏匿于上海。

有一说法认为，搜购古籍的工作，张元济未参与。事实上张元济确曾声明过“不与于办事之列”，不过，除了他开始曾参与筹划并接待过蒋复璁之外，很长时间并未置身事外，仅看一九四一年郑振铎与张氏往来的记载，便说明他关于顺书情况多有咨询，不遑一一列举。又譬如，一九四一年四月中旬，郑振铎托施韵秋送嘉业堂藏钞校书三十六种，请张元济估价。张覆函谓“如今法市价值跌落，书价当可涨至原价十倍”，力主速购，经郑振铎努力，嘉业堂藏明刊本一千二百余种，连同此项钞校本，终以二十五万元成交。这批书后来成了台湾中央图书馆引以为骄傲的藏本。由此可见张元济默默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件事，是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与叶景葵、陈陶遗一道在沪发起创设合众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植立的东方日书馆毁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炮火，此后虽经张元济等人努力恢复，值抗战爆发，恢复之心终付惘然。叶景葵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为张元济早年办通艺学堂时的学生，后从事实业，亦爱藏书，与张元济交谊非浅。自战祸袭来，叶氏不忍目睹“公私书藏，流转散佚”。于是有发起创设合众图书馆之愿。叶氏为此捐出几乎所有家财和藏书，按顾廷龙之意见，“建设一专门国学之图书馆”。此事得到许多人支持和响应，张元济作为发起人之一，捐入了所藏嘉兴、海盐地方文献及张氏先人遗著和其它旧藏书籍，共九百多种约三千八百册，古道热肠，众人抬薪，合众图书馆竟于抗战中充实发展，成为一家大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实现了叶氏“独乐不如众乐”之言。张元济亦有诗述怀：“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

### 望断无涯（1945—1949）

时至一九四五年，已是抗日战争第八个年头。张元济蛰居沪上，以一个七十九岁老翁，不知是否熬得过艰难时期——“沪上物价飞涨，有发发不可终日之势，人人均不知命在何时……”一两年内，张元济明显地看重鬻书卖字之事，倒也不一定是指望以此糊口，多少仍是一种安慰，可以借笔墨度日月，等待破晓。虽然是“回天无术”，只能“百卷书成岁月长”，依然为念“有薪不尽争传火，无米还量惯唱筹，……只今一鬓中原望，任溃吾痛且抉疣”。

好在为期不远。这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光复的日子终于到来。

此时距张元济退休已近二十年，这些年来尤其是抗战的八年中，张元济

---

详情见苏精：《抗战时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1979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五期。

1941年4月13日、15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书，《年谱》488页。

《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诗文》82页。

1945年1月18日复孔乾三书，《年谱》507页。

《揆初七十生日余有寿诗，揆翁有和作余复步原韵一首》，《诗文》27页。

难得悠闲过，可谓与商务印书馆同患难，历久不能息肩。胜利之后，复兴商务，很快又提上日程。由于总经理王云五几年来在后方主持，商务的运转情况保持良好，张元济对王云五一直是很信赖的。但复员后，王云五有意脱离商务进入政界，这使商务在人事上又发生新问题。另外使张元济感到难堪的是，王云五要求调查沦陷期内商务参加“五联”承印教科书一事，并坚持免去代经理韦傅卿的职务。这使张感到不安。

关于日伪时期的“五联”，据曹冰严回忆，一九四二年初各家书局启封后，日方“兴亚院”两次召集商务等书局负责人谈话，胁迫与日本书商合营，合并成立所谓“中国出版配给会社”。经各书店设法拖延，直至六月方始成立一有名无实之“中国出版公司筹备委员会”，做过两季伪教科书的发行业务。一九四三年六月，商务上海办事处与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五家书店出资并向同业招募一部分股金另行发起组织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它与日方所计划的所谓“会社”不同，（一）是纯粹营业机构，（二）没有日股。除承印、发售汪伪制定教科书外，另外出了一种名叫《学术界》的期刊与五种有现成纸型的图书。

上述情况，比较实际地反映在沦陷区受到胁迫之下为求生存而不得不有限地妥协的状态。另一方面，张元济主持商务董事会，基本上采取谨慎行事的方式，以避免更多的压力和麻烦，这与“附逆”完全是两回事，但王云五的看法则是严重的：“……沦陷期内上海商务印书馆竟与数家出版业合组所谓‘五联出版公司’，承印伪组织核定之教科书，有协助敌伪散布毒素之嫌……董事会却仍留在上海，决定与敌伪同流合污……”王云五这种过分的说法，可能是因不满于战争开始时沪、港两处员工不愿年迁而来的反应，也可能是表明其原则性，因而一面要求调查此事，一面要求免去代经理韦傅卿的职务。张元济这几年深味个中苦辛，不得不出来分责。他给王云五写信说，“傅卿情事：如此严重，实出意料之外。联合出版，本系庆林任内之事，傅卿不过继承，庆林确曾报告董事会，具载议案，此时若由董事会开除傅卿代理经理，明是委过于人，弟于心殊觉不安，故与伯嘉再三斟酌。”在这封信里，张元济还对光复后的情况感到不安：“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至一二借，凡属新贵，几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

看来，国家与商务印书馆的复兴，都不是容易事。城郭依旧，人事已非。经过动难而调敝的社会经济及浮扰纷乱的人心，都影响到抗战后的中国仍是步履维艰。

在商务内部，张元济作为董事长，一直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信任总经理王云五的领导和管理。但因王氏在抗战中作为参政员已涉足政界，旋又以将任经济部长辞职，挽留不果，终于离开商务，后由朱经农继任。朱经农曾进商务做过编辑，后当过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次长，算是老资格的人选。只是管理措置均不甚得力，且仍兼仕光华大学校长，半心半意，造成商务景况日渐不佳。张元济就此致信胡适道：“吾知经农于商业非所素谙，自云不

---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王云五先生年谱》76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鲍庆林 1939年9月代理经理，1944年7月病逝。

《年谱》511页。

能得门而入，亦是实话。自去夏以来，默察馆事日非，且大局尤见危险。数十载之经营，不忍听其倾覆，遂不得不插身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

后来朱经农因奉派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拟请长假，张元济以为此时如出国，不能不易人，遂使朱经农辞职，另议选举夏瑞芳之于夏鹏为总经理。后夏鹏亦坚辞，改举谢仁冰，不成一又举陈夙之，到一九四八年末，商务人事上的这种困难，也可见彼时局面的善处匪易了。

显然，由于国内战争的不断加剧，和平恢复无望，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巨大的财政赤字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猛涨，工商业也陷于困境。譬如一九四八年上海有三千余家工厂，开工卒仅有百分之二十。经济衰退对商务这家大公司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原材料价格飞涨、货币贬值、营业萎缩，使商务多年间虽迫不断打击而仍复积累的实力迅速趋向崩塌。这一点，虽无明确的统计数字，却可从张元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窥知消息。张元济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致胡适的信中言及拟出售商务所有的一部藏文经集：“二十余年前商务印书馆曾在北平购得藏文经集……寄存北平图书馆，汇为九十二包。……是书为洮州杨氏土司所辖卓尼禅寺印本，民国十七年全寺被毁，经板无存。闻北平只此一部，此后恐更不易得。东方图书馆恢复无期，且此间亦无要求阅读之人，如能得价颇拟售去，以疗商务目前之贫。”衰退也体现在董事会议程上，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董事会第四七六次会议上议及：“公司现在出版新书印制费用过昂，成本收回不易，嗣后凡销路较滞或份量过重者，可暂勿出版。”又，经理李拔可说：“闻公司年终负债已经达三百亿……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至于普通人的生活，亦因生活必需品价格直线上升，极不安定。国民政府的整顿和市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法币）亦归于失败，翁文灏内阁因此倒台。张元济也感到生计日绌，自述：“入不敷出，弟垂暮之年尚须鬻书以助日用，凄凉身世真不堪为知我者告也。”这种牢骚语，过去是没有的。

由此或可了解，张元济在八十岁之后何以对时世每多悲怀和愤嫉之情。抗战后的社会状况使他感到的不仅是困难重重，而且是不愉快，甚至反感。这样有时就会打破沉默，出之以公开的社会批评。譬如一九四七年六月他与唐文治等十位老人联署致上海市长吴国桢的信，信的开端说他们年纪很大，早已退休，不愿涉足政治，然而学潮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置不论，近因则不过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齿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这封信较为严厉地批评了政府的做法。又譬如他以“涉园主人”名义在《大公报》上发表《丁亥岁杪时事杂咏》诗一组，也是针对时弊种种加以讽刺，兼抒愤懑。其一云：

州官放火原依例，百姓如何可点灯，  
一样葫芦重画出，而今遍地是田登。

诗后有注解：“国行副总裁本月十一日发表谈话，如有藉机反动、抬高

---

1948年8月1日致胡适函，《年谱》534页。

《书札》166页。

《年谱》531页。

1948年2月6日李拔可致张元济书，《年谱》529页。

1948年6月4日复萧瑞尧书，《年谱》533页。

《营救被捕学生函》，《书札》275页。

物价者，决于从严惩处，而邮龟两项，即于同日加价，电报电话，各增加二倍——参见十一月《大公报》和《新闻报》。”这些诗反映出张元济对社会问题的敏感，亦如彼时寒灯下自吟：“漫无风雨太漂摇，牖户齐推竟压销，更听鸡鸣声不已，愿同起舞度深宵。”一时之忧也是一世之忧。毕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眼边耳畔已经八十年了。

许多年来，张元济一直比较超脱或者谨慎地避免参与政治，不入党派，甚至不参加社会活动。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包括其人思想性格和方式上的一贯平稳。而到了一九四八年那多事时节，却像他以前劝过的胡适那样“忍不住”要说话。这变化确实很大。如果证之他一年前说的话，更可见这一年里外界刺激所引起的心理推移。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张元济致胡适信中云：

来书云在此天翻地覆之时，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此真所谓天下愈乱吾心愈治。正惟撕人有治之心，故能救天下之乱，否则与之俱乱，不知伊于胡底矣。

不久他便感到这很不容易做到，如果天下不太平，不仅无以复兴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也不可能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张元济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第一届院士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胡适、赵元任、陈寅恪、陈垣、冯友兰等，先生为最长者。当年九月，张元济赴南京，出席第一届院士会议开幕式。在会上他继蒋介石、朱家骅、翁文灏之后致词——“元济因此有一种感想，要把这半个世纪的经历和当前的时事，向诸位贡献一些意见。”

抚今思昔，作为好几个历史时代的见证者，他讲的话格外真诚、沉重。

由甲午、戊戌、庚子讲到辛亥、军阀混战，以至八年抗战，是一部“伤心史”，“回想起来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虫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中心意思，就是“要和平”。张元济否认“以为战争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他说：“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竭，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是肺腑之言，也是逆耳之言。说了些实在话，是人心所向，但在政治上的敌对双方看来又是不实际的。所谓“伤心史”，伤心就伤心在历史，并不按张元济这样的开明知识分子的愿望发展。张的发言后以《刍莛之言》为题发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但战争并未休止。

费孝通曾就此评论说：“没有任例颜色的帽子加得上张老先生的头上，他的苍苍白发保证了他除了悲天悯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需要

---

引自《从翰林到出版家》271页。

《为商藻亭题寒冷听雨图》之二，《诗文》48页。

《书札》166页。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诗文》226—228页。

读张菊先生《刍莛之言》，《中国建设》第一卷第八期。

补充的是；张元济对政治的批评，仍然出自他多年来望治的渴望以及抗战以来的切肤感受。他从来都不是政治家，所能努力的，也只是本着良心说话而已。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共和谈破裂。五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

### 归路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以后仍张元济仍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该年九月，新政协开会，因病谢辞不果，由于树年侍陪北上出席会议，曾会晤毛泽东、周恩来及文化界诸人士。同年被任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出席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旋因在商务工会大会上演说时突然跌倒中风，致半身瘫痪。在此前后，故交叶景葵、傅增湘、高凤池、李拔可先后谢世。

时代转换之交，经营已五十余年之商务印书馆亦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张元济曾出面要求救济、申请贷款不果。经陈叔通联系，商务与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联合组织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编审部、出版部先后迁往北京。一九五四年实行公私合营，商务的产权被国家接管，股东得到百分之四的定息。同时商务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分工专门出版大专院校教材和工具参考书（一九五九年两家分开，商务印书馆的业务缩小为翻译出版外国古典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以及词典、外语教材等）。至此，如陈叔通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致张元济书所云：“五十七年事业可有交代，实即有了结束，股东在某一时间仍有利可图。以后公以文史馆馆长例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之例切勿过问。”最后两年商务出版的书有《药典》、《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神话》等。

一九五三年东方图书馆亦告解散，书籍四百五十二箱又二百零四包，均捐献政府。此外涵芬楼所藏《永乐大典》二十一册，及张元济早年收得的翁心存手书日记二十五册亦捐献于北京图书馆。

张元济自偏瘫后常年卧床，自状“偃仰绳床一病翁”。病中残年，他编校了《涵芬楼烬余书录》一书，这是“一·二八”劫难后了余的珍本古籍的目录。该书共分四章，列举当时被移藏于银行保险库中的数百卷善本书的目录。此时重溯十九年前旧景，诚无异“如谈天宝，如录永贞”。

一九五一年夏，张元济还在病中为新发现的三十卷本《金石录》（宋代赵明诚著）做了审核鉴定，并写就跋文。之后他自撰一“讣告”：

前岁冬日矣患偏中，卧病有年。今已于本年×月×日（子树年填制）逝去，遗骸即付火葬，不敢举行丧礼，敬辞唱赙，追悼纪念尤不敢当，生前辱荷知爱，从此长辞，瞻念何极。

此外又分别给友人写了留别诗，其中一首写道：

形体积成泡沫耳，一朝化去更空虚，  
世人幻说辽阳鹤，魂梦不能相见无。

心情可谓澹定达观。但先生的生命亦如其性格，有韧性。昔年患前列腺症，经手术后痊愈，患心脏病，亦得康复。这一次的“讣告”，也未发出，

---

《年谱》575页。陈叔通时任政协副主席。

《年谱》562页。

《留别绝句》（一九五二年初），《诗文》53页。

尽管自觉大限不远。“微躯撑拄又三年，弹指光阴境屡迁，为报亲朋勤问讯，夕阳红好尚依然。”一九五六年张元济度过了九十岁寿辰。当年曾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雁冰祝辞道：

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百，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纪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先生寿如松柏，先生之风亦山高水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张元济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得年九十三岁。逝后，骨灰安葬于上海联义山庄公墓。

## 后记 张元济与中国近代文化变迁

伏案把笔，并不轻松地叙述了张元济一生的经历，暂时搁置，不免犹有所思，就随记在这里。

我想，“百卷书成岁月长”这句话，或可为这样一位尽瘁于出版事业的人物作写照。书，似乎积累了他的人生，也消耗了他的岁月，同时使岁月变得比平常意义上的岁月更长远了些。

过去，李清照词有句：“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那是一种悠然自得的读书意味。赵师秀诗云：“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水，檐依柳树荫，每留名士饮。屢索老夫吟，最感春烧尽，时容借检寻。”他写的是卖书人的景况。而吴文英词写道：“……长安人海，避影繁华，结庐深寂，灯窗雪户，光映夜寒东壁，心雕鬓改，楼冰刻水，缥筒离离，凤纤索索……”大概可谓对藏书人校书人极尽形神词笔了。不过这些似乎都已云隔往昔，只是古代书林韵事流传而已。如果说张元济也是个读书人、卖书人、藏书人、校书人，其人生或可谓“书卷人生”，其岁月的撙刻，显然沉重得多，艰难得多。笔头追随着他的岁月，因而不能轻松。从翰林成为出版家，变动的时代本身原是沉重艰难的。

寿而未必多福，张元济所生历的九十余年，恰逢天翻地覆的时代。就政治鼎革而言，他的活动期赶上晚清、民国、军阀时代、国民党时代、日伪时期、共产党时代。就民族历史而言，内忧外患引起彼时人生格外动荡。而就社会文化及心理意识变迁而言，以传统士大夫的出身，经历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与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巨大转变，不得不寻找自身的文化位置。这种寻找亦处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夹缝中间。也处于许多年来不易解决的“传统与现代化”的紧张关系中间。

也许可以说，张元济适宜地找到了他的位置，包括世俗生活与精神寄托，即所谓“一身立命”。由末代王朝的进士、翰林，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家，为文化事业朴实而兢业地做些事情，张元济的此一选择，未始不是明智的，脱俗的。这使他得以避免历史的种种是非恩怨，既非庸碌无为又非风云人物，既未陷身于历史的某种虚幻之境，又不像“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这样一种“存在”的意义，似乎很令人思味。当然回过头去看，也是人生不易到之处。还是叶景葵那两句诗说得好，“人与百虫争旦暮，天留一老试艰难”，令人会心。

话说回来，也许，张元济的“存在”意义，更在于其选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关系。

中国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不仅有时序上的传承关系。它的内容还包含一个非常大的变动。这个变动，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由晚清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引起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打了败仗而丧权辱国的事情，史书上已说得很多了仍原来自以为先进的文明，挡不住西洋文明的冲击，这个刺激是很大的。包括张元济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这历史表象下面的原因，思考如何使中国富强。

不论怎样，传统文化确实遇到了变局。

如果说，文化是一种社会性的实体形态，那么大约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是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资料和工艺技术的体系；第二是社会组织



形式，人和人的关系网络，它们通过制度化形式组织和整合，第三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精神产品，如宗教、艺术、科学等，它构成社会的精神人格，第四是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产生人们在内心中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观念以及作为社会道德要求的伦理规范。大体上，所谓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变动，都涉及了这几个层面，也就是所谓现代化之进程。但进程的最大困难在于，欲达到现代化目标，需要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变动，却又难以下手仍而且内含与旧结构的很大冲突并带来变革的代价。同时，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其理想的实现又受到外在和内在的种种限制，并仍然带有不自觉的或盲目的特点。

洋务运动企图“师夷长技”，搞些“器用”、“技艺”层面上的变革，不触及体制，搞不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包括光绪皇帝企图实行变法维新，触及了体制，结果是戊戌政变发生，也失败了。直到辛亥以后，清王朝垮台，系统变革仍很艰难。便有“五四”前后对传统峻批判，是着重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的层面把新的观念、精神推向社会，表现出以“启蒙”带动现代化，以思想文化革命推动社会改造的趋向。

中国近代文化变迁史，显然遭遇了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诸如民族文化本位与西方影响的矛盾（由于西方文化的到来带有侵略的烙印，因而使矛盾更形复杂），应着重制度变革（自上而下）还是着重国民教育改良国民素质（由下而上）的矛盾，变革应取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的矛盾，等等，自然，变革与反对变革的矛盾冲突也曾经十分尖锐。由此可以说明，变迁具有怎样的深刻住与复杂性。

作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参与者，张元济曾是士大夫中的新人物，他与许多主张“变法”主张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渴望以此来追求中国的富强。但他并不热衷于政治，性格上又非发扬踔厉一流，因而不具有激进的色彩。同时，在他的意识中，输入新知培养人才亦是实行变革的基础。在他看来，这种准备还是不充分的，因为社会变革行动必然要受到影响社会结构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诱导和约束。而只有改进和扩展国民教育、开辟启蒙与新知的渠道，才能为变革和发展提供适宜的文化环境与精神人格。戊戌政变后，张元济离开北京，选择“扶助教育、文化”为终生事业，正是切实地走上了一条实践其社会变革主张的道路，也不妨说，有着深远的文化史意义。

从事功上说，“文教兴邦”俯途径并不是最有效的，而且做起来有许多困难，几十年并不理想的现实也使张元济难以遂其抱负，使“开启民智”的事业走上正轨。但第一，耕耘总有收获，实际上张元济在出版事业上的努力，对于中国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之大，是很难估计的。第二，这条道路的坚持仍然为文化思想史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线索，即不得不考虑到社会文化变革系统中，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忽视这种建设性的努力，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尽管改朝换代或实行某种“主义”的社会改造蓝图）将不可能成功。这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教训永远留在那里。

如果说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始终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域，那么很可能被视为“保守”的看法。关于“问题”，有一种比较激进的、简化的思维方式，以为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革命可以迅速地使社会转型，可以救国、强国。在中国近代以来紧迫的历史情境中，这种思路越来越占上风。同时，主张渐进改革即“改良”的思路，作为一种可能性，在反对改革与激进改革之间难以生长。换句话说，高调子的社会变革观总是压倒低调子的社会变革观。在此中间，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

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还在会上说，“倘然没有戊戌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凯觐，一步一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当然是说得合乎情理。可惜，历史并不能“假设”并按“假设”去演变，无情的斗争，使渐进的、改良的主张变得不切实际，只有“退场”。

不过，张元济的思想倾向仍然是有意义的。譬如，首先，透过他的经历，至少表明了“和平的改革”并非维护旧的秩序，而是为了减少现代化的代价。这一点，仍然值得后人深思明辨。再者，由于张元济有鉴于此，始终持有低调的文化变革观，从而促使他去投身于长期具体的有价值的文化建设工作。通过扶植商务印书馆这一负有盛名的现代出版机构，与近代文化变革建立了积极的联系，通过这一渠道，服务教育、传播新知，引进西方科学、学术，保存中国古代典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为文化事业做踏实的贡献。诚如太史公所言，“欲徒托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此所谓于变乱纷扰中有所建立的典型。

如前所述，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一直交织着一些悲剧性的矛盾，悲剧性即在于，合理的选择往往不可能，而可能的选择又往往并不合理，这使得现代化的目标追求，难以在最低的成本和最小的代价上进行。而且矛盾使人们的文化态度趋于对抗，不得不陷于激烈的斗争，甚至非此即彼，不可妥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张元济虽然也处于矛盾中间，却并未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作为一位旧式儒家学者，当他面临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挑战时，可以越过定见的保守藩篱，开放自我，他渴望中国的进步，同时意识到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意识形态向两个极端分化时，他从不退向保守亦不趋于激进；人们惯于认为知识分子不是选择“全盘西化”，就是顽固地坚持“国粹”，而张元济的一生否定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在文化变革到来之际，保持了一贯的开明姿态，并帮助了不同思想体系的活跃和发展，他曾经积极地推动“新学”的传播，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传统文化典籍，或者还可以说，他曾积极鼓吹变革许多既有的风俗制度，同时又极为谨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弘扬人格的价值，他始终超脱于政党、派别之争，相信只有靠文化建设，通过启发民智的途径，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源泉。不论怎样去评价，张元济的一生都散发出仁智的气息。这是一种独特性，也是令人思悟的历史遗音。

文化新陈有代谢，整齐流略忆斯人。

## 附录

### 张元济年表

- 1867 一岁  
10月25日生于广州。
- 1873 七岁  
入塾就读。
- 1880 十四岁  
随家迁返浙江海盐。
- 1881 十五岁  
父张森玉病歿海南任上，奔丧。
- 1884 十八岁  
始应科举，中秀才，入学。
- 1889 二十三岁  
应浙江乡试，中举人，与国学家吾乃昌女吾氏结婚。
- 1892 二十六岁  
赴京会试，中进士，授职翰林院庶吉士，妻吾氏病故。
- 1894 二十八岁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任六品衔刑部贵州司主事。
- 1895 二十九岁  
受甲午战败刺激，自此倾向维新。与许夫人结缡。
- 1896 三十岁  
攻读英文，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 1897 三十一岁  
创设通艺学堂。
- 1898 三十二岁  
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受徐致靖保荐，得光绪皇帝召见。戊戌政变发生后，被“革职永不叙用”。
- 1899 三十三岁  
离京赴沪，进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主持排印严复译《原富》等书。
- 1900 三十四岁  
庚子事变发生，八国联军占北京，曾参与自立会活动。
- 1901 三十五岁  
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开办附属小学、公学特班，后辞代总理职。与蔡元培筹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应夏瑞芳邀，入股商务印书馆。
- 1902 三十六岁  
辞南洋公学职，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开始组织编定教科书。
- 1903 三十七岁  
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
- 1904 三十八岁  
《东方杂志》创刊，《最新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编订《最新修身教科书》，始创编译所国书室。

1905 三十九岁

开办商务印书馆小学师范讲习班，出版严复译《天演论》，任浙江铁路公司董事。

1906 四十岁

清政府“预备立宪”，被学部奏请开复原官，调任学部参事厅参事，又充外务部储才馆提调，后请假南归。加入预备立宪公会。商务出版严复译《法意》。

1907 四十一岁

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代表浙江铁路公司赴京谈判拒借英款事。商务印书馆出版伍光建译白话翻译小说，成立尚公小学。首次当选商务董事。1908 四十二岁

辞浙江铁路公司各事，赴日本参观考察。商务出版《英华大字典》，开始编纂《辞源》。

1909 四十三岁

设立图书馆，名为“涵芬楼”，设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创办《教育杂志》，出版蔡元培译《伦理学原理》。

1910 四十四岁

赴欧、美游历考察。商务印书馆开办师范讲习社，幼稚园，创刊《小说月报》。

1911 四十五岁

任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入京赴会。辛亥革命爆发。商务印书馆创刊《少年杂志》、《政法杂志》。

1912 四十六岁

民国成立，中华书局创办并参与教科书竞争，商务编印《共和国教科书》，出版《新字典》、《英华会话合璧》等。本年起，先生开始锐意收集全国方志。

1913 四十七岁

熊希龄内阁拟请先生出任教育总长，辞谢。商务出版《高等小学女子新国文教科书》。

1914 四十八岁

商务印书馆收回日资股份，总经理夏瑞芳遇刺身亡。印有模任总经理。《学生杂志》创刊。

1915 四十九岁

参与编校的《辞源》出版，拟议出版《四部丛刊》。商务内部协调编译、发行、印刷三所工作的总务处成立。创刊《妇女杂志》、《英文杂志》。

1916 五十岁

任商务印书馆经理，在总经理高凤池之下，负责实际馆务。出版《涵芬楼秘笈》第一集。梁启超南下助蔡锷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寓先生处，编印《饮冰室文集》等书。

1917 五十一岁

拟编“言文一致”之新教科书。商务发生罢工事件，参与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拟变通《小说月报》之办刊方针、拟速编新类书。

1918 五十二岁

主编《戊戌六君子遗集》出版，筹划尽快出版《汉英辞典》、《植物学

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等工具书。拟出版《百衲本资治通鉴》。为夏瑞芳 1910 年投机橡皮股票亏空公款一事。筹措解决办法。与高凤池就公司经营宗旨发生分歧，拟辞经理职，后提出改革公司计划。夏季，两赴北京，与北京大学诸君接洽新书出版事宜，并商借印《道藏》事。1919 五十三岁

筹备出版《四部丛刊》初编、《续古逸丛书》，编印《新体国语教科书》、《国音字典》等书。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高涨，由于商务杂志受到社会批评，销量减少，先生与同人商议改进办法，决定改进《教育杂志》、《东方杂志》，更动主编人事。本年，第一部汉字打字机、机雕字模在商务印书馆诞生。

1920 五十四岁

筹编小本新知识丛书。因购地产事与高凤池意见冲突，宣布辞经理职，同人挽留不果，与高同迟，改任监理职。赴北京商讨影印《四库全书》事并访求古书。本年内，《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改组，开始革新面貌。

1921 五十五岁

拟邀北京大学胡适任编译所长。胡南下考察，未就职，荐王云五以自代，后王云五继高梦旦任编译所长。为保存嘉兴乡邦文献，参与辑《樵李文系》。商务出版《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共学社丛书》等。严复病逝。

1922 五十六岁

为设厂事赴香港、广州。又赴京、津访书购书。创议设立流动图书馆，赴浙江江苏各县、镇。商务推出赵元任主持灌制的国语留声机唱片，出版新文学著作、译作。

1923 五十七岁

主持校阅的《续古逸丛书》出版，《道藏》、《百科小丛书》亦开始出版。与梁启超、丁文江等人发起成立古物研究会。为减轻排字工人劳动强度，撰《拟制新式排字机议》一文。

1924 五十八岁

与北洋政府交涉借印《四库全书》，多生波折。筹办东方图书馆。

1925 五十九岁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上海部分日资纱厂工人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商务印书馆发生两次罢工风潮，经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先生受此刺激，请辞监理职。并力主改革公司组织。

1926 六十岁

涵芬楼改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因反对董事会分派股息公积金，愤然宣布辞职，表示退休后仍为公司尽力。改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北伐战争开始。拟续编《四部丛刊》。

1927 六十一岁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进入上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年初，东吴大学授予先生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致力于校辑二十四史。十月，遭绑票，历六日始赎出。

1928 六十二岁

以中华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与郑贞文赴日本访求古书。计一月半。

1929 六十三岁

梁启超逝世，上海各界公祭时，先生与陈三立主祭。撰《重印（四部丛

刊)刊成记》，述重印中各种版本之变更。拟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开始编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1930 六十四岁

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设总管理处。《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辑印，并发函预约，撰写《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商务设立校史处，由先生领导。曾因病住院治疗。

1931 六十五岁

校阅诸史并撰写跋语，为水灾赈济、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时疫医院及林纤遗族教育经费捐款。

1932 六十六岁

“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军轰炸闸北，商务印书馆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均遭轰炸焚毁，多年积累之书籍善本，除小部分因藏于银行保险库内，幸免于难外，均被毁。商务被迫停业。先生投入善后工作。八月复业，实行日出新书一种。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先生反对，称：“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推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1933 六十七岁

编撰《涵芬楼烬余书录》，成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任主席。筹备辑影《四库全书珍本》。

1934 六十八岁

许夫人病故，丧事简办。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建成。开始出版《四部丛刊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拟编《丛书集成》。

1935 六十九岁

旅行陕西、河南，《四部丛刊三编》开始印行。

1936 七十岁

友人丁文江病逝。章太炎、鲁迅逝世。致力于校阅古籍。旅行四川成都、重庆等地。友人高梦旦病逝。编印《中国文化史丛书》。“西安事变”发生。

1937 七十一岁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齐，编著之《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出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长沙，在上海、香港设办事处，先生留沪主持董事会。

1938 七十二岁

排印所撰《校史随笔》一书。商务出版《抗战小丛书》。拟出版《孤本元明杂剧》。

1939 七十三岁

与叶景葵、陈陶遗等发起筹组合众图书馆。

1940 七十四岁

参与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协助郑振铎等在沪抢救散出之古籍。曾赴香港。因患前列腺症，入院手术。蔡元培病逝。

1941 七十五岁

太平洋战争爆发。沪、港货栈和印刷厂被日军劫持，《东方杂志》停刊，将大量藏书捐赠合众图书馆。

1942 七十六岁

因生计日绌，拟卖墨以资衣食。

1943 七十七岁

蛰居上海，开始卖字，老友伍光建、孙伯恒逝世。

1945 七十九岁

抗战胜利，商务复员。撰写《中华民族的人格》题辞，

1946 八十岁

王云五辞总经理职，朱经农继任。

1947 八十一岁

与陈叔通起草致上海市长吴国桢书，抗议当局派警特镇压学生。筹编《辞源简编》。

1948 八十二岁

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发表反对内战的讲话，后以《刍尧之言》为题，刊于《中建》杂志。

1949 八十三岁

李宗仁代总统欲请先生赴北平参加与中共方面的和谈，先生拜辞。胡适离沪赴美，先生劝以“研究学术”。五月上海解放。节选之《节本康熙字典》出版。友人叶景葵病逝。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会晤毛泽东、周恩来及文化界人士。参加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委员。年底参加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演说时突然跌倒，因脑血栓症致半身瘫痪。

1950 八十四岁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仍选举先生为董事长，病中开始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

1951 八十五岁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迁京，捐献馆藏《永乐大典》二十一册于国家。

1952 八十六岁

商务印书馆出版部迁京。老友李拔可逝世。撰《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十八首。

1953 八十七岁

东方图书馆解散，图书捐赠合众图书馆（后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出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捐赠庐山旧居。

1954 八十八岁

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京，实行公私合营。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 九十岁

撰致蒋介石书，寄望于和平统一。文化界为其贺寿。

1957 九十一岁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先生《涉园序跋集录》一书。病重，撰《自挽联》。

1958 九十二岁

商务印书馆改为以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社。被聘请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员。周恩来曾赴医院探望。

1959 九十三岁

8月14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上海各界举行公祭仪式。遗体火化后安葬于联义山庄公墓。





